

唐宋

八大家

人品·文品·诗品

赵维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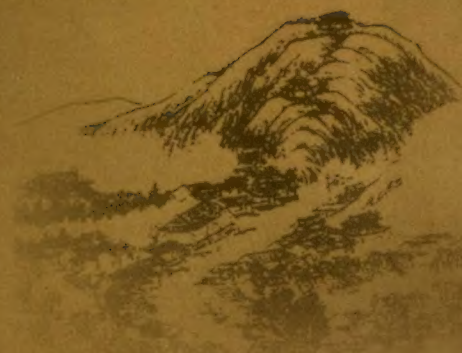
河海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文渊
封面设计.. 杭永鸿

唐宋

八大家人品·文品·诗品



ISBN 7-5630-2307-0



9 787563 023073 >

ISBN 7-5630-2307-0(1-58)

定价: 25.00元

唐宋八大家 人品·文品·诗品

赵维平 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人品·文品·诗品/赵维平著.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630-2307-0

I. 唐... II. 赵... III. ①唐宋八大家—人物研究
②唐宋八大家—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606 号

书 名/唐宋八大人品·文品·诗品

书 号/ISBN 7-5630-2307-0/I·58

责任编辑/杜文渊

责任校对/杨 丽

封面设计/杭永鸿

出 版/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电 话/(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发行部)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赵维平，1956年生，河南获嘉县人。1978年3月赴豫东名城开封求学，在七朝古都学满四年，1982年3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东坡词的出世倾向浅析》、《晚清山水诗四题》、《论谭嗣同诗歌创作》、《〈聊斋志异〉常人体作品述评》、《素质教育的实质性目标浅见》、《“三言二拍”运河商贾文化探析》等20余篇；参编学术著作《苏东坡全集》、《天下第一策》、《中国人书信大系（隋唐卷）》、《淇河古诗三百首》等；出版学术专著《古代文学专题与作家研究》。

坚持文本研究与人文研究并重 (代序)

文学研究必须首先坚持以文本为本位,以话语性的文学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过去时态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心态、审美心理等等,本身已经不能再现,也无法还原。作为历史活动的遗留物留存下来,并且为研究者的意识所能直接把握的,仅仅是历史上的文学活动的结果。而在所有的结果中最可信赖、最贴近文学活动的本来面目的,则是现在尚能看到的作家作品集,这是用文学话语构成的历史文本。

古代文学研究重视文本,至少包括四个方面:文学文本的定位、文学文本的定性、文学文本的细读和文学文体的解析。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细读精读他们的诗文,从中发现作者的本义甚至微言大义,发明其文学价值,这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辅之以作家研究、背景研究,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和西方的“接受美学”相参照。既要研究此文本与作家的关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作家的生产产品的独特性,又要研究此文本与时代的关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时代的生产产品的独特性,还要研究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关系,即研究此文本的相关文本,使自己对此文本的文意的把握更准确。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研究中唐社会情况和北宋中期社会情况,这是“论世”的功夫;研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生平,这是“知人”功夫;研究当代学者对

唐宋八大家的人文需求,这是“接受”的功夫。

其次要坚持人文研究为导向。人文精神,指人类的文化精神。《易·贲·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所谓人文。”其中的“人文”概念是相对“天文”而言。天之文表现为阴阳、刚柔,一雨一霁,一温一凉,交轮代错,此是自然之饰,体现了天之美德;而人之文则是天德的世俗化,体现为礼法仪则等人伦,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相互制约、补充和依存,此是人之饰,体现了人之美德。观天之文,即把握自然界寒暑、阴晴、昼夜变化的规律性,以审时度变,节宣政令;观人之文,效法天地自然之道,化性起伪,以成就天下人的美德。这是中国“人文”的本来意义。

人文精神是诸文化要素的复合体,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处世哲学、道德意识、审美情趣、人格理想、价值观念、政治信念、爱国主义等等,都是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系统的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强调人在对天道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进退、存亡、死生、荣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进行取舍和追求,以美化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价值,强调所谓“舍诸天运而征乎人文”。

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挖掘作家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阐发其对于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作用,是古代文学研究保持长久生命活力的必然要求。唐宋八大家,无疑是唐、宋两代造诣最深的文学家和人格高尚社会活动家,是当时文学成就和成功人生的代表者,其作品和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即使在今天也光华宜人。

古代文学研究坚持文本与人文并重,以文本研究的深厚功力为人文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以人文研究的创新眼光为文本研究开拓广阔视野,这样就能使古代文学研究既具学术价值,又对当代社

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我的同事赵维平教授的新作《唐宋八大家人品·文品·诗品》，既重视文本解读又重视人文研究，创新了唐宋八大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此书问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可喜可贺的事。

周桂峰

2006年10月于淮阴师范学院

人品·文品·诗品



目 录

坚持文本研究与人文研究并重(代序)

周桂峰

绪 论

第一章 韩愈

- 第一节 韩愈的人品/7
- 第二节 韩愈的文品/11
- 第三节 韩愈的诗品/24
- 第四节 韩愈散文名作精鉴/32

第二章 柳宗元

- 第一节 柳宗元的人品/44
- 第二节 柳宗元的文品/46
- 第三节 柳宗元的诗品/61
- 第四节 柳宗元散文名作精鉴/68

第三章 欧阳修

- 第一节 欧阳修的人品/76
- 第二节 欧阳修的文品/86
-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品/94
- 第四节 欧阳修散文名作精鉴/100

第四章 王安石

- 第一节 王安石的人品/108
- 第二节 王安石的文品/114

第五章 苏洵

- 第三节 王安石的诗品/124
- 第四节 王安石散文名作精鉴/130

- 第一节 苏洵的人品/140
- 第二节 苏洵的文品诗品/142
- 第三节 苏洵散文名篇精鉴/158

第六章 曾巩

- 第一节 曾巩的人品/170
- 第二节 曾巩的文品/173
- 第三节 曾巩的诗品/178
- 第四节 曾巩散文名作精鉴/182

第七章 苏轼

- 第一节 苏轼的人品/196
- 第二节 苏轼的文品/203
- 第三节 苏轼的诗品/212
- 第四节 苏轼散文名作精鉴/218

第八章 苏辙

- 第一节 苏辙的人品/226
- 第二节 苏辙的文品/229
- 第三节 苏辙的诗品/234
- 第四节 苏辙散文名作精鉴/239

后 记 /248

绪 论

一、唐宋八大家的由来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唐、宋两代八个著名文学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明初朱右最早编《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茅坤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搜集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由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一部集中体现唐宋派文学理论，并给学习古文的人提供范例的文章总集。全书 164 卷，计收韩愈文 16 卷、柳宗元文 12 卷、欧阳修文 32 卷附《五代史抄》20 卷、王安石文 16 卷、曾巩文 10 卷、苏洵文 10 卷、苏轼文 28 卷、苏辙文 20 卷。卷首有《总序》、《论例》，各家文章前有小引和本传。

唐宋派是明代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所建立的一个文学流派。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称雄文坛。他们提倡“文宗秦汉”，主张勿读西京以后书，一时士人纷起附和，以模拟剽袭秦汉文章为时尚。唐宋派针对这一复古思潮，标榜唐宋散文，提出学习古文应从“唐宋八大家”入门，然后上溯秦汉，以求得古人之神气。他们继承了由韩愈、欧阳修发起的唐宋古文起动传统，重申文道合一，强调文章的载道和事功作用；提倡本色，主张文章应直抒胸臆，推崇质朴简洁的风格；总结了古文的创

作现律,创建“开阖首尾,经纬错综”的文章法度。唐宋派的文学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嘉靖初,王道思、唐应德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在唐宋派四家中,王慎中有倡导之功,唐顺之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归有光侧重于创作实践,而茅坤则是唐宋派的集大成者。

嘉靖 23 年,茅坤被谪判广平,在广平更加发愤为文辞,上采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下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诸家,悉心揣摩他们文章的旨意,认识到诸家之文“调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觉悟到往昔一味刻意模仿司马迁的文章,仅得其毛发而未能得其神理。茅坤的这些意见,均见于《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此书作于嘉靖 25 年,可以看作茅坤转变为唐宋派的标志。茅坤于嘉靖 34 年在大名副使任上遭劾辞归,隐居 40 余年,以授徒讲学为业。为指示子侄及生徒学习古文的具体途径,他特地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后由茅坤侄茅一桂刊刻于杭州,销售于金陵等地。

提倡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和文风,这在明中叶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以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复古的道路。影响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学者在散文创作中一味以模拟秦汉古人为能事,其作品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强调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学习和继承秦汉古文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通过编选和刊印唐宋作家的散文选集,大力推广八大家文风。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散文,反对骈体,主张实用,反对浮华,他们的散文创作又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这是明中叶茅坤等人的一大贡献。

总之,唐宋八大家之称,由茅坤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定

鼎;《唐宋八大家文钞》因茅坤转变为唐宋派而生发,因教授子弟之需而成形。

二、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和为人价值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一去不返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中唐社会,他们在政治上积极探讨振兴唐王朝之道,以不同方式参加了社会变革活动;在文学上发起古文运动,解决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未能扭转的骈俪文风。所以这两个人在唐代是成功人生的代表人物,最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韩愈的古文,对骈文有摧陷廓清的功效。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高度评价了韩愈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的历史性贡献。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价韩愈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阐明了韩愈文的风格特点和杰出成就。宋林光明《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的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如韩愈的散文,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韩愈称柳宗元文:“深雄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又称他贬永州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刻画山水,有杰出成就;寓言小品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传记文工于塑造人物。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

黄子思诗集后》中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奇至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宋代六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最为才华横溢、勇于作为而又善于作为的文人、才子和官员。在他们当中，欧阳修、王安石官至参知政事；欧阳修、苏轼主持过礼部取士；曾巩、苏轼、王安石为官地方，有能吏循吏之风；欧阳修、苏洵、苏轼和王安石长于史论、政论与哲论，有史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之称。

欧阳修是宋代六家的领袖，《宋史》本传称：“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为必显于世。”苏轼评价他的一生成就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序）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他的文章风格：“执事之文，纤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轼是六家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者，其散文创作尊重艺术表现规律，融精美形象与精辟哲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炉，既给读者以形象感染，又给读者以思想震撼和心灵点拨，“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苏轼《自评文》）其诗清新精美，自然洒脱，虽有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倾向但在宋代又最具形象性。欧苏之外，王安石散文政治色彩浓厚，写景小诗清新峻峭；苏洵散文有战国策士风范，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智慧；曾巩诗文平和委婉，有文人和循吏气质；苏轼诗文才气不及大苏，锐气不及荆公，但得中正之旨。

唐宋八大家在为人处世方面，各有特长，各有短处；各有成功之处，各有人生败笔。韩愈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舍我其谁的自尊自尊，加上其百折不回的坚韧，使他成为唐以后“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语）的文化名人；但韩愈也有与人相处

过于较真、不够灵活的毛病，得罪过不少人。柳宗元以正人君子情怀，处中唐多事之秋，“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政治上过早地崭露头角，招来普遍的嫉妒；所依明主过早禅位，使他失去政治依靠。这两方面原因促成柳宗元终生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只以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称名后世。

宋代六家，生当升平盛世，但人生之路并不平坦。欧阳修德高望重，最得人心；惠眼识才，乐于助人。创造了为政以简而民不怠，为政以宽而事不废的为官风范；能说能做还能写，领导了北宋诗文书革新运动取得圆满成功，撰《新唐书》、《新五代史》，立德、立功又立言。但在政治斗争中不耐对手算计，晚年消极颓废，未免虎头蛇尾。王安石性格刚毅，心如铁石；果于任事，操刀必割。但遇事操之过急，做事魄力有余而灵活不足，最后众叛亲离，变法难以为继，“有济世之心而无济世之术”。曾巩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仁政惠民思想，既清廉勤政又有惠民之术，可谓宋代循吏。首先推荐王安石于欧阳修，但也首先发现王安石气量狭小，虽不得王安石提携但也避免王安石迫害，可谓知人善处、明哲保身。但做事魄力不大，自己埋没了自己之才。苏洵大器晚成，27岁始发奋读书，未免蹉跎岁月过多，好在虽后发能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自己成为文化名人，而且指导二子成才，所以不失成功人士。苏轼一秉忠君爱民之心，在北宋中期党争中奉行独立不倚人格，但也因此吃尽苦头，又能以平常心对待政治灾难。由于出身寒微，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在党争中脆而不坚、缺乏韧劲，遇到麻烦总是急流勇退、全身远害，善于自保而难当大任。苏辙天生配角角色，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政治上才有限、作为不大，文学上略逊于其兄而不亚于王、曾，一生无大灾难也无大作为，与其才具相称。

三、本书特色所在

世纪之交，国内以唐宋八大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层出不

穷。但绝大多数是唐宋八大家散文作品选注或鉴赏,如方笑一著《唐宋八大家散文选》,侯琪选译《唐宋八大家散文对读》,全彦芳、王增学主编《唐宋八大家名作精品鉴赏》,宋晶如注释《唐宋八大家古文(上、下册)》,韩兆琦等著《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刘禹昌、熊礼汇译注《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邹霄鸣编《唐宋八大家文选》。少数成果是作家作品研究,如朱世英、郭景春《唐宋八大家散文技法》分别论述了八位散文大家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吴小林《唐宋八大家》介绍了“八大家”称呼的由来、唐宋两朝的古文运动、八位散文大家各自的文学贡献。

本书作为唐宋八大家研究学术专著,内容上以八大家的人品、文品和诗品为重点,彰显作家的文学价值与挖掘其为人处世造诣并重,较之他书深度或广度过之;作为师范院校选修课教材而编,选取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深入探讨其文学和人生光彩夺目原因所在,体现选修课既加深或拓宽必修课所学,又侧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材开发要求。

本书所引八大家诗文,以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为蓝本。

第一章

韩 愈

在中唐,韩愈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这样,他与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都有建树。

第一节 韩愈的人品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任过吏部侍郎,有韩吏部之称;死后谥“文”,人称韩文公。有《昌黎先生集》。韩愈生活中唐社会,历仕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四朝,以文人师友、正直臣子的面目为时人后人敬重。

1. 不幸少年,磨砺成才

韩愈出生在一个下层正直官员之家,他三岁时父亲死去,成了孤儿。“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本传,下同)勤奋好学,加上喜欢与名人切磋,自然萌发大志,“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在与当时名儒独孤及、梁肃的交往中,韩愈锐意钻研学问,萌发了做振兴儒学的一代大家的志向。

2. 初入仕途，崭露头角

韩愈为进入仕途，大张旗鼓地以文会友，“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这样，韩愈就比较轻易地中了进士。早年的韩愈先从幕僚做起，做过汴梁守官董晋的“巡官”、徐州主官张建封的“宾佐”，而且他不因官微言轻而掉以轻心，事事处处都举轻若重、严肃对待，很快就做出了成绩，创出了个人风范，“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由地方幕僚“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成了朝中官员。入朝为官的韩愈仍然仗义执言，“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但不幸的是，唐德宗不仅不纳忠言，反而“怒贬为连州山阳令”，使韩愈初尝直言苦头。

3. 因言得祸，以文自解

元和初年，韩愈入朝为国子博士，后升任都官员外郎。长安近畿发生了华州刺史阎济美罢停华阴令柳涧县务的事，数月后阎刺史职满离任时，柳涧鼓动百姓遮道索要“前年军顿役直”，后任刺史赵昌追查柳涧替前任出气。韩愈听到这件事，便以“刺史相党”的罪名弹劾阎济美、赵昌。监察御史李宗爽在调查中，却发现柳涧“赃状”，韩愈以所奏不实，又降官国子博士。韩愈好心不得好报，满腹郁闷无法排解，就创作了《进学解》。这篇赋假借国子先生与诸生的对话，写韩愈本人内心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只要有德有才，就能兼济天下、施展抱负，另一方面也对自己“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的现实遭遇而困惑；一方面庆幸自己“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另一方面对“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也有兔死狐悲的伤感。此赋文情并茂，“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韩愈在长安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4. 文官从戎，立功还朝

一般人只知道韩愈是文人，领导过中唐古文运动，不知道韩愈还有一段从戎经历。中唐藩镇割据是一大社会问题，当时盘据在淮西的军阀吴元济与中央政府对抗，威胁着唐王朝漕运生命线，给唐王朝造成很大麻烦。宪宗派御史中丞裴度考察淮西前线，裴度回复宪宗淮西可平，但宰相反对用兵。韩愈上书宪宗支持裴度，理由是连年“淮西修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给赏。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餉于其后，得不偿费。”他主张快刀斩乱麻，“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论淮西事宜状》）。经过一番争论，主战派占了上风，韩愈得以上战场效命，“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旧唐书》本传）关于韩愈在平定吴元济之战中所起的作用，新旧唐书语焉不详，但他被裴度任命为行军司马，职在执行赏罚、整肃军纪，当然也少不了草定文书、参谋军机之类的事。因为功不可没，凯旋后韩愈被提拔为二品高官刑部侍郎。这是韩愈政治生涯一个高峰。

5. 遭遇弊政，不能不言

正在韩愈有职有权兼济天下的时候，朝中发生了宪宗皇帝崇佛劳民的事。《旧唐书》本传中载：“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睹此荒唐弊政，毅然上书谏阻，“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

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此书激怒了并非明君的宪宗，“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幸亏裴度、崔群等人说情，最后贬韩愈为潮州刺史。上书谏迎佛骨，是韩愈政治生涯中辉煌浓重的一笔，但也结束了韩愈与宪宗的政治蜜月，使此后的韩愈难于再对朝政有大作为。

6. 为官一方，去害兴利

潮州濒临南海，唐时为荒远之地。“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洄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韩愈到任后“询吏民疾苦”，得知潮州鳄鱼猖狂，祸害人畜无数，韩愈一面“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旧唐书》本传）一面自诵所作祭文，警告鳄鱼“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韩愈《祭鳄鱼文》）史载韩愈此举大有成效，“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水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旧唐书》本传）。后由潮州转任袁州刺史，袁州时兴将子女抵押出去，借人钱财，超过还钱期限不能还钱，子女便成为债主的奴隶，韩愈上任后，“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旧唐书》本传）此举移风易俗，泽及百代。

考察韩愈一生，发起古文运动是其主在成就，“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

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旧唐书》本传,下同)以弘扬儒学和振兴文学为己任,“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建立了不世功业。凡事认真、敢做敢当是其长处,与人交游不因穷通厚此薄彼为人称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大有长者之风。“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诔辨》,令举进士”。在我下者提携而上,在我上者不卑躬屈膝,接济后进,助人为乐,千古想闻其为人风采。恃才肆意,轻易伤人,小不忍而乱大谋是其褊狭之处,穆宗年间“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期间,“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弄得两败俱伤。

第二节 韩愈的文体

一、韩愈的散文创作主张

第一,强调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他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答侯生问论语书》）。在另一篇文论中，这个意思说得更充分：

……将薪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答李翊书》）

第一段要求李翊达到古代以文立言者的境界，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暂时势利所诱，而要扑下身子砺志苦学，打牢学识和道德的根基。第二段现身说法，以自己“养根俟实、加膏希光”三个阶段的实践，启迪李翊没有二十来年埋头苦学的功夫，就不要希望做到

“惠中秀外”。韩愈说他自己第一阶段非夏商周和两汉之书不观，非圣人思想不敢存，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一定程度说明潜心苦学、不求速成的重要性。第二阶段参看“正伪”，辨识黑白，应用时得心应手，这实际上是由约之博，即“正伪”两种文风都能分辨得明白清晰阶段；第三阶段再由博返约，只按照“正”体散文风格进行创作，真正达到了“宏中肆外”的境界。第三段打比方，以水大能漂起浮物为喻，说明修养深厚才能发言为文，触处生春。这样，韩愈就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把“文本于道”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地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气不盛言难宜，“不平则鸣”是“一鸣惊人”的重要条件，没有“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就没有文情并茂文章。

第二，散文创作继承是手段，创新是目的。韩愈提倡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精神，认为不充分继承便不能打好基础，所以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等值得潜心学习的古文传统，但他也指出古文传统中有“虽正而不至焉者”，非创新不能造就优于古文的散文。把握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最后才能达到“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的境界；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臻于出神入化，方可自由自在地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心。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

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

二、韩愈散文的思想品质

1. 用散文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对比了三种人生,一是兼济天下的达官贵人,“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名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峻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二是远离红尘、全身远害者,“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三是厚黑无耻蝇营狗苟的小人,“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微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作者借肯定李愿的选择而肯定了第二种人生,而反对第三种人生,向往第一种人生。

在《圯者王承福传》中,韩愈借王承福之口,阐明了自己对社会分工的看法,“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耒以嬉。夫耒,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

者取焉。”此虽本于《孟子》的观点，然以劳动者之口道出，很有新意。文中还阐明了世间富贵穷通的变化规律及常人应有态度，“嘻！吾操屨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揭示了人不常富、贵不定人和天道酬勤、穷则思变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些观点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2. 用散文述评各种人生

韩愈的记叙文写人叙事取材不拘一格，既有叱咤风云的功臣名将，也有平凡普通的手工业劳动者。《张中丞传后叙》写坚守睢阳的张巡、许远、南霁云英雄业绩。在安史之乱中，叛军攻下汴梁、洛阳后，集中兵力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张巡、许远合兵一处坚守睢阳，使叛军无法越过睢阳南侵江淮，保障了唐王朝的财赋供给，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韩愈在文中高度评价了张、许之功，“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并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张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抽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

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许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南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众多可歌可泣人物中的三个，可谓光照千秋、彪炳史册。

《圯者王承福传》为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工匠立传。王承福经历坎坷，“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钁衣食，馀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圯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他为国家打仗十三年，有战功但不居功，原来的家业田产已归他人，他就租房而住，靠泥墙做工吃饭。为人泥墙索要工钱多少，完全看当时房租和饮食价位，房价、食物便宜，他要的工钱就少；房价、食物昂贵，他要的工钱就多一些。如果所挣工钱多于吃住所需，他就把多余的钱施舍给有残疾或饥饿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

3. 用散文阐明政治主张和做人道理

韩愈议论文章往往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论佛骨表》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写下的政论文字，体现着常人绝难达到的勇气和胆魄。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当满朝上下如醉如狂、奉佛

骨如神明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观之表示“耻之”，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李贺的父亲名晋肃，与“进士”谐音，有人以此为由不许李贺参与科举。韩愈气愤之下写《讳辩》为李贺声张正义，“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运用归谬法反驳敌论，一发置论敌于死地。

韩愈的一些论说文阐述了做人的道理。如《原毁》要求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先从正面立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这几句话实际上阐发了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思想，说明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的好处。接着从反面列举反其道而行的恶果：

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对别人要求多，对自己要求少，必然自己稍有成绩、长处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对别人成绩、优势心存嫉妒，势必夜郎自大、目中无人。

4. 用散文创作激励后进，点拨人生

韩愈的赠序文里，无处不流露着对朋友的深情，对后生的期待。太学生陈密入学以来习“明经”但久不获选，认为自己不适宜

“明经”专业，改习“三礼”。在回乡探亲的前夜，请韩愈指导一下如何学好新专业。韩愈在《送陈密序》中首先承认回答不好这个问题，对学生问心有愧；然后告诫陈密不必心急，指出专业无所谓好坏，只要诚心正意、学以致用，就不愁没有发达的一天，“子诵其文则思其义；习其仪则行其道，则将谓子君子也。爵禄之来也不可辞矣，科宁有利不利邪？”可谓语重心长、关爱备至。董邵南中进士后，一再碰壁于权贵之门，于是想离开长安到燕赵去碰碰运气，韩愈得知后就写了《送董邵南序》，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既有对董生怀抱利器而不遇于时的惋惜，又有对他前往燕赵谋出路的理解，也有对燕赵未必有爱才之人的担心，最后以请董生好自为之作结。

三、韩愈散文的艺术品质

韩愈散文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1. 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

讲究起笔。他有时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关注点，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有

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穷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相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徜徉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墓志比较庄重,但韩愈有时有意起得轻灵,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写道:“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这种写法,与先叙墓主姓名籍贯谱系的碑志惯例截然不同,而是着意于出奇变化,很有些破空而来的味道。

讲究正文。或体式严整,行文规范,《平淮西碑》从大处着眼,居高临下,紧紧把握战前、战中、战后这一中心线索,把事情叙述得井井有条,充分显示了韩愈把握全局的能力。战前先写宪宗皇帝即位,立下中兴之志和“群臣震慑,奔走率职”。次写吴元济造反,“蔡将死,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接着写宪宗皇帝决策武力讨伐,调兵遣将,任命裴度率领各路大军进讨不臣,“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表明国家纳入战争轨道,进入临战状态。战中写各路军征讨的进展,李愬从文城雪夜奔袭百二十里,“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战后写处置战俘“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吴元济于京师。皇帝论功行赏,命韩愈写平淮西之役的碑文。或摇曳多姿、不拘格套。不搞生平事迹的平铺直叙,抓住历史人物一生的闪光点,只需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风采,文字不多却给人以浓墨重彩的印象。《张中丞传后叙》记述许远、张巡、南霁云死守睢阳,抗击安史叛军的事迹,只写了张巡就义时的从容、许远对张巡的厚道和南霁云搬救兵时的悲壮等几个片断,挖掘

人物的闪光点,代替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这是文学表现手法的一大进步,这样的写法更能有效地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2. 情感充沛,气势盛大,体现“气盛言宜”的创作要求

韩愈的论说文基于对所论述问题的深思熟虑,在抓住事情的核心和要害、有真知灼见的基础上,阐述起来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如《原道》阐述辟佛道理,指出古之民有四:士、农、工、贾。今之民有六:外加佛教僧侣和道教道士。“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来士农工贾之间维持着一种互为供应对象的平衡,现在僧侣和道士大增,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农民破产,社会动乱。最后慷慨激昂地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几可也。”要让僧侣道士还俗于民,要焚烧佛教书籍,要把寺庙道观改成民居,用先王之道引导他们从事生计。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说理!

他的记叙文,总是着力于事情和人物的激动人心之处,然后用合适的语言把自己对人事的情感表达出来,感人至深。《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十二郎是韩愈的亲侄子,韩愈小时候靠十二郎父母哺育成人,叔侄二人从小在一块长大。韩愈中进士后长期宦游在外,叔婶去世很早未能尽孝,现在惊闻十二郎噩耗,怎能不触动哀思呢?文章抓住名虽叔侄、实如兄弟这一点行文: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用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哀叔侄二人少小的手足之情，哀十二郎年岁小于作者而先作者而去，哀作者想接十二郎团圆而未能，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然后抒发愧疚之情，“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文创作的气盛言宜特征。

3. 叙事生动，描写如画，有小说笔法

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的心理变化。先写轩辕弥明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反衬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但三人联诗后，彼此心理上的高傲和自卑开始发生变化：一听写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袖手竦肩倚北墙坐”，吟出“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侯、刘二人开始吃惊，还想倚多取胜，却“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

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直到三更，刘、侯二人心理被彻底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章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外愚内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韩愈善长描写事物。《画记》中描述画中之人，“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一百二十三人三十二种姿态；“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等八十三马二十七种马姿写得栩栩如生。

在人物刻画上，韩愈注重以外貌传神。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记传主幼时相貌：“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幼子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宛然一幅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张中丞传后叙》中“长七尺余，须髯若神”的张巡肖像，表现了人物的精明强干。注重通过行动描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选取薛公达一生的三件突出事例予以描述，力状传主“气高”、“务出于奇”和“不同俗”的性格特征。其中写他以竞射而技冠全军一段最为精彩：“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类似这文字在韩愈散文中并不鲜见，《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就是较突出的一篇：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齬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姬：“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姬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姬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

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叙写骗婚经过极形象生动，充满戏剧色彩。侯翁的迂直、媒姬的狡猾、王适的违俗不羁，都借助灵动的文字跳出纸外。这种写法，在韩愈之前从未有过，在韩愈之后也甚罕见，它只能出现在韩愈笔下，成为对墓志的一大创造。

4. 熔铸百家，提炼口语，语言精练而富有活力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此外，《送孟东野序》连

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第三节 韩愈的诗品

一、韩愈诗歌的思想品格

1. 描写祖国雄奇壮丽的山水景观，表现骇世惊俗的情怀

韩愈的《山石》选用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暮色苍茫中的“暗”，而“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则是天亮时的山岚弥漫，“山红涧碧纷烂漫”又写日出后的豁然明朗。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自然。《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描写盘谷壮观的山水：

昔寻李愿向盘谷，正见高崖巨壁争开张。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东蹈燕川食旷野，有馈木蕨芽满筐。马头溪深不可厉，借车载过水入箱。平沙绿浪榜方口，雁鸭飞起穿垂杨。穷探极览颇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眇茫。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慨慷。旁无壮士遣属和，远忆卢老诗颠狂。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又知李侯意不顾，方冬独入崔嵬藏。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家请官供不报答，何异雀鼠偷太仓。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弹劾还耕桑。

盘谷在今河南济源境内,天井是盘谷一道泉水,《水经》上说:“天井溪出天井关,北流注白水,世谓之北流泉。”开篇即豪兴遄飞,格局阔大。以“长剑倚太行”比喻从天井关飞流而下的瀑布,而这飞瀑被狂风吹拂,竟直洒洛阳!其势其景,迅捷壮观,遣词造句,远超凡俗,用诗中的话来说,就是“字向纸上皆轩昂”。

2. 抒写宦海沉浮的情感经历,表达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韩愈一生中两次遭贬,贞元末年,翰愈官监察御史,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遭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第二年春天作的《答张十一》写道:“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筇筰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张十一即张署,德宗贞元十九年与韩愈同为监察御史,一起被贬。张署被贬郴州临武令,曾有诗赠韩愈,韩愈写此诗作答。诗的前半先写阳山景物,“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勾画出阳山地区的全景。春山明净,春江空阔,还传递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淡淡几笔,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筇筰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是两组近景镜头,筇筰是一种粗大的竹子,羊踯躅是开红黄色花的植物,为前面一联的冷落景象又点缀了一些鲜艳、明快的色彩,增添了些许春天的生气。景物描写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静,二是闲。静从空旷少人烟而生,闲由处境遭遇而来。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悠闲超脱,没有羁绊,然而不免使人触景生情。后半抒写情怀,“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意谓皇帝的深恩我尚未报答,死所也未可得知,但求不要在南方炎热的瘴气中虚度余生而已。这两句是全诗的关键,蕴含着诗人内心深处许多矛盾隐微之情:有无辜被贬的愤怨与悲愁,又有对自己从此消沉下去的担心;有自己被贬南荒回归无望的叹息,又有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憧憬。最后两句以肖像描写,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凄苦。第二次被贬潮州时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韩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元和十四年，韩愈为刑部侍郎，上表极谏佛骨事。宪宗大怒，赖宰相崔群、裴度力言，宪宗才贬他为潮州刺史。诗题意为，贬官潮州行至蓝关写诗赠侄子韩湘。左迁，贬官。汉时依上古法，朝列以右为尊，故谓降秩为左迁。蓝关，在今蓝田县。《青瑣高议》云：“湘字清夫，公侄也。……公后贬潮阳，途有一人冒雪而来，乃湘也。”此诗贯穿一股抑郁不平之气，首联气贯长虹，颌联气壮山河，颈联英雄气短，尾联亲友情长。

3. 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

如《归彭城》表现对战乱和天灾中人民的同情，“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訔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絷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城，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赍。归来戎马间，惊顾似羁雌，连日或不语，终朝见相欺。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彭城，今徐州。作者《欧阳詹哀词》云：“贞元十五年冬，某为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而此诗曰《归彭城》，明年自京归徐也。天下兵又动，谓十五年秋起诸道兵讨吴少诚。前年关中旱，谓十四年冬京师饥。去岁东郡水，谓十五年秋郑滑水灾。诗中写人民的水深火热和作者内心矛盾心情十分动人，反映了正直臣子侧隐民瘼的情愫。《县斋有怀》写于诗人被贬阳山县后期，叙述了自己被贬阳山前后的思想经历：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事业窥泉稷，文章蔑曹谢。濯纓起江湖，缀佩杂兰麝。悠悠指长道，去去策高驾。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初随计吏贡，屡入泽官射。虽免十上劳，何能一战霸。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髀。军书既频召，戎马乃连跨。大梁从相公，彭城赴仆射。弓箭围狐兔，丝竹罗酒炙。两府变荒凉，三年就休假。求官去东洛，犯雪过西华。尘埃紫陌春，风雨灵台夜。名声荷朋友，援引乏姻娅。虽陪彤庭臣，讵纵青冥靶。寒空耸危阙，晓色曜修架。捐躯辰在丁，铄翮时方措。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睚眦互猜訝。只缘恩未报，岂谓生足藉。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涖瑕垢，长去事桑柘。劓蒿开云扇，压颖抗风榭。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吓。官租日输纳，村酒时邀迓。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姪。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

此诗主要抒写个人不幸，反映封建社会为官的不易。“悲咤”二字为全诗之眼，前半追述诗人中进士前后的学业、才器、抱负和遭遇，韩愈贞元八年中进士，贡于京城，至贞元十年，屡试博学宏词科不中，贞元十一年东归河阳，同年从汴州董晋做幕僚，贞元十五年从徐州张建封做幕僚，董晋、张建封相继去世，只好再赴洛阳求官，至贞元十九年才做了朝廷正式官员——监察御史，因上《天旱人饥疏》，被贬阳山。后半写至阳山后事，先写阳山恶劣的天气和环境，接着写对顺宗登基的憧憬，表明自己希望得到起用，报效君恩。最后写公务之余的农事和家庭之乐。

4. 咏物写景，表现某种寄托

“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

无穷求福人。”这首《题木居士二首》其一描写耒阳(今属湖南)的“木居士”庙,诗人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点拨地方陋俗与官场弊政的关联,有一定喜剧效果。头两句写“木居士”的形成,枫树老而生癭,形状类人,被巫师取作偶像,借施骗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树木,曾遭“火透”(雷殛),又被“波穿”(雨打水淹),经磨历劫,伤痕累累,被扭曲得“根如头面干如身”这样一种扭曲的形状。后两句则写其意外的发迹,被人视为神的化身,备受顶礼膜拜。前后形成鲜明对照。“木居士”固然可笑,而“求福人”更可笑亦复可悲。“求福人”急于求福,利令智昏,错抱佛脚。“木居士”尚且自身难保,怎么可能反过来赐福于人呢?联系官场中忙于找后台、靠山,不少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此诗以咏物寓言方式,取讽刺鞭挞之意的构思昭然若揭。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韩愈《春雪》奇思妙想,前两句写见草芽的欣喜,新年没有芬芳的鲜花,二月才见春色的使者——草芽,“惊”字状出摆脱冬寒后新奇、惊讶、欣喜的感受,“初”字含有春来过晚、花开太迟的遗憾、惋惜和不满的情绪。韩愈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曾写道:“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诗人对“草芽”似乎特别多情,也就是因为他从草芽看到了春的消息吧。后两句表面上是说有雪而无花,实际感情却是:人倒还能等待来迟的春色,从二月的草芽中看到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竟然纷纷扬扬,穿树飞花,自己装点出了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未来,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不也照样给人以春的气息吗!这两句可谓神来之笔。

二、韩愈诗歌的艺术品格

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在这一方面,他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叶燮

《原诗》所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这话不无见地。

1. 富有气势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瀑布想象得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鼉龟鱼与鼃，鸦鸥雕鹰雉鹄鹑，燂炆煨燼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韩

愈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2. 避熟求生,奇崛峥嵘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惕睠跳踉”、“火齐磊落”、“蛊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宰”、“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其他诗中“夬夬”、“闻闻”、“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等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对后来的李贺等人有重大影响。

3. 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规范整齐、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七、三言的句式,开头“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雉”,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属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韩愈是奇崛诗风的开拓者。

三、正确评价韩诗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

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公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赭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二三道士席其间,灵液屡进玻黎碗。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有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韩愈诗歌也给后世开启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虽有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但过分

使用则破坏诗歌阅读的连贯性,造成整体意境的割裂支离。像《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的“呀豁疾掎掘”,《征蜀联句》的“熬堞煇歊熇,抉门呀拗阇”之类,不仅“徒聱牙傅舌,而实无意义”(赵翼《瓠北诗话》),而且也使后世诗人把诗当炫耀奥博的工具而忽视表达情感的功能,形成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由于他太过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恶怪诞的意象,这毕竟与人们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去太远,有时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像写拉肚子、写牙齿豁落等,又如写寒冷以“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苦寒》),写月亮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昼月》),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诗人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由于他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以文为诗,有时便忽略了诗歌本身的韵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茧自缚,但完全不顾语言的节奏却会使诗失去音乐性的美;诗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议论,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则会使诗没有诗味。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影响。

第四节 韩愈散文名作精鉴

一、论说文

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顓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

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
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
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①。惟梁武帝
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
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
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②。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
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
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
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
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
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
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
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
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
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③
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
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
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
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
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
以桃茢^④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
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

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⑤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第2页）

注释：

① 促：短促。

②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四月，诏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但没有得到切实执行。

③ 脍：肉片。此处作动词，意为自残。

④ 桃：桃符，古人以为桃木能驱鬼镇邪；茆：扫帚，可扫除不详。《礼记》：“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茆执戈，恶之也。”注：“桃，鬼所恶。茆，苇苕可扫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亲禭；公使巫以桃茆先祓殡，楚人悔之。”

⑤ 悃：诚恳。

分析：

1. 写作背景

《旧唐书》本传：“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2. 此文效果

《旧唐书》本传：“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

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闻见录》云:“宪宗元和十四年,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韩退之以谏逐。十五年,有陈洪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不数月崩,送佛骨还法门寺。愈之谏云:‘奉佛以求,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3. 佛教危害

据《资治通鉴》:武则天时,天下寺院数量已达 44 600 所,僧人达 265 500 人。寺院恶性膨胀,佛寺用铜铸像,朝廷铸钱无铜;僧人免赋税徭役,农民便弃农为僧;佛教的发展致使国库收入减少,农业凋弊,也在思想领域动摇了封建纲常伦理。

4. 论证层次

此文逻辑层次,第一层举史实说明佛教无关帝王寿夭。力证佛教传入中国前帝王普遍高寿,佛教传入中国后信佛的帝王多短命,两相对比见出信佛并不能带来长寿。第二层指出宪宗迎佛骨违背先帝禁佛精神,且影响极坏。第三层指出佛祖即使活着来华,于治也无益,也不宜让他留住宫中,何况是佛祖遗骨;帝王行吊,为避免邪祟近身,尚且桃茢先行,何况让一段朽骨入宫禁。提出处置办法,收束全文。

争臣论(节选)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①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

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②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谏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谏斯猷，惟我后之德。’^③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④。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讪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

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⑤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第192页）

注释：

① 阳城：定州人，中进士后隐居中条山，德宗时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当时诸谏官纷纷言事，德宗苦之，而阳城日夜痛饮，五年未尝一言。

② 委吏：管理粮仓的小官；乘田，管理牲畜的小官。

③ 引文意为，你有佳谋良策，当入宫告君王，而在公开场合，还应随声附和，说君王的决策合于仁义。

④ 意为，孔子忠于王事忙碌得无片刻休息，墨子奔走在外无暇在家烧火做饭，烟囱都烧不黑。

⑤ 见《国语》：“柯陵之会，单襄公见国武子，其言尽。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鲁成公十八年，齐人杀武子。”

分析：

1. 本文效应

阳城拜谏议大夫，闻得失熟，犹未肯言，公作此论讥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龄诬逐陆贽等，城乃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帝欲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庭。”帝不相延龄，城之力也。公作此论时，城居位五年矣。后三年而能排击延龄，或谓城盖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欤？

2. 韩愈的言人与己行

林少颖曰：“退之讥阳城固善矣。及退之为史官，不敢褒贬，而柳子厚作书以责之。子厚之责退之，亦犹退之之责阳城也。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是

之谓乎？”

3. 论辩艺术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从对方用过的论据引申出符合自己的结论，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本文最后两段，对国武子一事，韩愈引出的结论与论敌大相径庭，说明他有过人的思辩能力。

4. 现实意义

本文提出多种截然不同的为人处世准则，有些看起来是水火不容的。如阳城处是非之地而能做到难得糊涂，与韩愈力倡的言官遇事必言，很难说哪一个绝对正确。对同一人事的评价，如阳城做官后仍坚持隐士操守可嘉，阳城在谏议大夫职上遇事不言是尸位素餐。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人应开动脑筋，取是去非。

二、记叙文

顺宗实录(节选)

二月甲子，上御丹凤门，大赦天下^①。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②已前，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③之。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于理体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于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参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精加访择，具名闻奏，仍优礼发遣^④。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官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官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官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

肯，我有死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官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又贞元中要乳母，皆令选寺观婢以充之，而给与其直。例多不中选。寺观次^⑤当出者，卖产业割与地买之，贵有姿貌者以进，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

贞元末，五坊^⑥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官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乙丑，停盐铁使进献。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一助经费。其后主此务者，稍以时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羨余”。而经入益少。至贞元末，遂月有献焉，谓之“月进”。至是乃罢。命右金吾将军兼中丞田景度持节告哀于吐蕃，以库部员外熊执易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罗，且册立新罗嗣王，主客员外郎兼殿中监马于为副。

三月庚午朔，出后官三百人。

（见《全唐文新编》卷五六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① 德宗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驾崩，顺宗二月继承大宝；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是惯例。

② 昧爽：古代一天十二时辰之一，略等于现在拂晓。

③ 原：宽恕，赦免。二句意为：一般赦免不宽恕的，这次也一概赦免。

④ 发遣：向中央选送。

⑤ 次：按顺序轮到。

⑥ 五坊：唐玄宗所设斗鸡坊等娱乐消遣衙门，以小宦官充任。

分析：

1. 著作权

《旧唐书》本传：“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2. 节选缘由

唐顺宗，讳诵，德宗长子。建中元年，立为皇太子。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即位太极殿。顺宗李诵在位时间虽短，却是中唐少有的明君，永贞二年他重用王叔文，发起“永贞革新”，试图振兴唐王朝。节选部分写他废除弊政、图新惠民的几件事，反映了“永贞革新”的基本精神。

3. 思想价值

第一自然段写顺宗继位后大赦天下和锐意征选人才；第二自然段写停罢宫市，可与白居易《卖炭翁》对读；第三自然段写停罢向寺院索要乳母；第四自然段写停罢五坊小儿；第五自然段写停罢“羨余”“月进”；第五自然段写遣出宫女。

4. 艺术特色

“宫市”和“五坊小儿”两段，叙事生动，描写如画。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①，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

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②，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③。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⑤。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诌诌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

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第346～347页）

注释：

① 形容议论时言辞奋发，滔滔不绝。

② 水的边际。

③ 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

④ 几句意为：令将被质押男女的劳役工资数额记下，到了工资数额足以抵消借款本息时，就算债务还清。

⑤ 播州，今贵州遵义。

分析：

1. 柳宗元与永贞革新

中唐代表腐朽势力的宦官专权，他们手握兵权，擅自废立皇帝。王叔文是当时大臣中有心清除宦官势力的人物。顺宗继位后，王叔文受到重用，引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发起永贞革新。同时，谋划从宦官手中夺取神策军的指挥权，终因敌对面过大，特别是顺宗多病禅位而失败。

2. 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柳宗元追随王叔文推行永贞革新时，韩愈正贬官阳山，加上他平生不喜王叔文、韦执谊，所以对永贞革新不以为然、常有微词。比如本文中說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是“不自贵重顾藉”，其实永贞革新与韩愈本人“欲为圣明除弊事”精神是一致的。

3. 本文思想精华

一是对柳宗元高尚品质的肯定,柳宗元在政治灾难中,依然不忘顾全朋友之情,宁愿替刘禹锡去条件最差的播州,让刘禹锡携老母去条件较好的柳州,被韩愈盛赞为“士穷乃见节义”,这是今人应当发扬的;二是柳宗元政治上的不幸造就他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被韩愈用来阐“文章穷而后工”的观点,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4. 本文艺术品位

本文对后代影响很大,从“落井下石”、“崭露头角”、“踔厉风发”和“反目成仇”等成语的流传便知一二。柳宗元一生言行浩如烟海,作者仅抓住他最具闪光点的几个片断,一是“屈其座人”,二是“自肆于山水间”,三是“是岂不足为政邪”,四是“愿以柳易播”,写出了一位品格高尚的文化名人的光辉形象。由此可见,本文的叙述是非常简练的。

第二章 柳宗元

由于柳宗元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他的文学创作对中唐文学繁荣有其独特的贡献。

第一节 柳宗元的人品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直到元和十四年,他还没有摆脱贬斥的厄运,而当唐宪宗因裴度的请求下诏召回他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七岁。有《柳河东集》。他短暂一生政治生涯中,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有以下几点:

1. 凭才干早登要位

《旧唐书》本传说柳宗元“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也就是说他靠雄厚的才学功底,一路绿灯,从拥挤不堪的科举独木桥顺利过关。轻取进士后,再应宏辞科中试,被授官校书郎,迁京畿蓝田县尉。可以说,柳宗元青年时期人生的顺利,为同时代韩愈等人所不及。

柳宗元在近畿地方为官数年后,因才干突出“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两年后遇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

礼部员外郎。”(《旧唐书》本传)柳宗元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在中唐是进步的。但由于支持他们的顺宗皇帝疾病缠身、很快禅位,所以革新以失败而告终。

2. 形势陡变,随遇而安

“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同上)随着永贞革新败北,柳宗元每况愈下。唐代州刺史是实职,有职有权;而州司马是虚衔,有位无权。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在唐时为偏远荒寂之地。到永州后,韩愈说他“自放于山水间”,即到自然风景中排解内心的郁闷;《旧唐书》说他靠埋头著述排解内心郁闷。永州之贬,一贬就是十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永州十年,是他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在散文创作方面,他在永州创作了“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等名篇。

3. 患难见真情,事久心不易

《旧唐书》本传记载了柳宗元一段千古流芳的文苑佳话,“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

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外放。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艰苦，刘禹锡还有 80 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4. 不嫌柳州穷远，只求为民造福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旧唐书》所记柳宗元在柳州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移风易俗，改变了以子女质钱的恶俗。他甚至拿出自己的钱赎人，归还其父母。二是虚怀若谷，接待和指点前来请教的岭南学子，甘愿做人梯，提携后进，造就人才。自己是病树，却愿浇灌出万木繁荣的春天；自己是沉船，却愿意看到千帆竞发的江流。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 47 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第二节 柳宗元的文品

一、柳宗元文学主张

1. 创作目的论：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认为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

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要求文章起辅时及物的作用,“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於今,则宜垂於后。”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2. 创作关键论:求道及物

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提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的观点,揭示了他“文者以明道”的实施要领。柳宗元的文章,从《封建论》的议论,到《段太尉逸事状》的写人;从《永州八记》的记山水,到《三戒》寓意,都是通过对各种事物的研究来明道的。要明道先要认识道,先要认识与道相关的各种事物。他用严肃的态度,深入了解各种事物,掌握它的本质,观察它的变化,再借鉴前人的各种艺术手法,创作出杰出的古文。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所说“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的调查、积累素材的过程就是求道及物。

3. 创作态度论:慎重其事

“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反对仓促求快,主张慢工好活;反对漫不经心,主张一气呵成;反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主张思路清晰,思维敏捷;反对盛气凌人,主张谦虚谨慎。总之,创

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得到深沉含蓄地表现。

4. 创作参照论:旁推交通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同上)他主张广泛学习前人散文创作的长处,融会贯通百家优长以成一家之风。

5. 创作风格论:含蓄蕴藉

柳宗元主张散文创作感情不可过分外露,“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馀,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来,他的作品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柳宗元相对地更重视内涵的表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畅而义美”。而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可见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调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功夫。

二、柳宗元散文思想品格

1. 阐述哲学思想,表达政治主张

柳宗元是中唐一位朴素唯物哲学家,哲学论文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

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他同时又是中唐一位改革家。他的社会政治的散文,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社会历史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主张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

2. 记述仕途甘苦,抒写内心愤懑

《新唐书》本传收传主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写给朋友的书信两封。第一封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题为《与萧翰林俛书》,论述自己政治悲剧不可避免,“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秩,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少年得志,为人嫉恨,革新失败后成为众矢之的,“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器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置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当时的小人把竞相攻击新党作为进身之阶,作为“八司马”之一的柳宗元思想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文中描述了对贬居地恶劣生活条件的感受,“居蛮夷中久,惯

习炎毒，昏眊重腿，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瘳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最后表明期望北返的心愿，“然居理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倘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馀润，虽朽枿腐败，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氓，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人矣。”足见流放永州期间柳宗元的思想状况。

第二封书信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题为《寄许京兆孟容书》。信中追述了二王八司马志同道合而参与永贞革新，“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表达贬居永州四年来后对故土的思念，“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虽然引古人穷而后通先例自解，心存起复重用之想，“倪宽摈厄，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但又认为“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他唯一的信念是，“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希望于文学创作，不朽于后世。此信充满了思想矛盾，说明当时内心的凄苦。

3. 为烈士循吏立传，弘扬为官正道

传记文《段太尉逸事状》截取了段秀实治理乱军、孤身入营劝谕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写活了这位德高望重、果敢机敏的老臣。《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详细生动地记叙了南雾云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与张巡、许远英勇守卫要地睢阳、以身殉国的事迹，谱写了气

壮山河的正气之歌。指出南霁云是在国家大乱的情况下“不阶王命”，出于捍卫国家统一的意愿而奋起抵御叛军进攻的，体现了“图国忘死”的高尚精神。在《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督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中，柳宗元以饱满的热情，赞颂了柳载拒绝叛军利诱，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行动。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发起泾源兵变，擅称国号为秦，德宗皇帝被迫离开长安。时为银青光禄大夫的柳载带领家人徒步出都，藏匿于终南山谷。朱泚久闻柳载贤名，用授予宰相的手段拉拢他。叛军追上柳载进行查问，柳载机智地报了一个假姓名；叛军打断柳载爱子胳膊，柳载强忍痛楚，头也不回地独自步入穷谷。最后奔赴行宫朝见皇帝，为平定叛乱“累陈计划”，得到德宗皇帝的嘉许和朝臣的赞誉。诚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4. 记述平民人生，表现民本思想

柳宗元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为下层平民立传的。《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梓人传》是这些散文中的代表作品。《种树郭橐驼传》通过种树能手郭橐驼的口，阐明了种树与治国相通的道理，批评了那些繁苛扰民的现象，“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勸尔植，督尔获。蚤缯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有较强现实意义。《宋清传》为一位医药郎中立传，宋清开药铺乐于赠药于人，“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这是一位以诚待人，而能换人以诚待己者，“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文章讴歌了“居市不为市之道”的精神，抨击了“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的丑恶现象。《梓人传》为一位木工立传，他“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字”而“其床阙足而不能

理”，作者从中发现了量才用人的为相之道，“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迹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材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见常人所未见，道人人意中皆有而难以言明之意，令人叫绝。另外，《捕蛇者说》记述捕蛇人的危险生涯，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希望当权者减轻赋税、救民水火的主题，甚有趣。

5. 寓言故事，以小见大

《三戒》寓言三则用笔精到而细节刻画非常生动，其意在于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迫于祸”（《三戒·序》）者，但作为人生哲理，它的意义还要广泛得多。借麋、驴、鼠的故事，写为人处世最应警戒的三件事。一是有了后台便恣意妄为，《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二是受人宠爱，不识外物真面目，《临江之麋》写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三是没有真实本领而虚张声势，《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象征，而“黔驴之技”、“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

《黑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虽吹出虎、黑的声音吓退了猫和虎，但当最凶猛的黑到来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只好被

黑所食。故事有力地讽刺了那些无真实本领、靠左右逢源而终于败灭者。《蝜蝂传》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蝜蝂的形象：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蹶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将讽刺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贪得无厌而自掘坟墓者，用语精警，立意深刻，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

6. 山水游记，皆有人性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身世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意在渲泻悲情却艺术地表现自然，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的特色。

柳宗元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越却不为世用的悲剧命运，如《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於此者。”或曰：

“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流露自己的身世之感。另外，柳宗元善于选取深奥幽美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画，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如《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鉤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茱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栝石楠榧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轆轳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郁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画细致而不琐碎，语言精炼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峭而不乏参差舒缓。

三、柳宗元散文艺术品格

1. 总体风格：沉郁凝敛，冷峻峭拔

作为唐代杰出的散文家，柳宗元的作品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

格。前人对他的散文风格曾发表过不少看法,韩愈说“雄深雅健”,《旧唐书》本传说他“精裁密致,灿若珠贝”,李涂认为“柳如泉”,明人杨慎认为“谓‘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刘熙载又认为“柳州之文如山”,茅坤则比喻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清人魏禧又说:“子厚如幽岩怪壑,乌叫猿啼”。这些评论只指出了他风格的某一方面,并不确切。应该论柳文总的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

2. 创新文体:游记和寓言

柳宗元以他与众不同的创作实践,为散文题材开拓了一条新路。尤其是他的山水游记,突破了过去散体文偏重实用、以政治和哲理议论为主的局限,改变了散体文以先秦两汉诰誓典谟、史传书奏为典范的观念,创造了一种更文学化、抒情化的散文类型。他的寓言也是具有创造性的。在此之前,寓言大抵只是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用做论说的例证,柳宗元的寓言则摆脱了这种依附性质,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3. 语言特色:峻洁省净

柳宗元散文的语言以“峻洁”著称,文字准确而简洁有力,又兼省净之长,体现出孤高脱俗的情调,是一种与人格相统一的散文风格。其散文创作与韩愈奇崛雄放为特征的创作一道,为号为“古文”而实为新体散文成功地奠定了基础。所谓“峻洁”,除了包括内容剪裁精当,风格洗炼强悍外,在语言上不拖沓,不含糊,无赘语,无泛笔,言约事丰,干脆简劲。柳宗元的散文就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散文篇幅都不长,一般只有几百字,较长的也只一二千。但内容深刻,表现出言简意赅、语短意长、精悍无匹的特点。

4. 结构特点:严密有致

柳宗元散文结构的严谨,表现在段落层次的安排上合理恰当,井然有序;在篇幅的处理上则中心突出,主次分明;同时还善于过渡呼应,使散文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融为一体。他的记叙文善于

以文眼提携全篇，如《童区寄传》抓住一个“奇”字行文，区寄杀一贼，已奇；又杀一贼，更奇；大声喊叫，借助四邻通知官府，三奇。他的议论文逻辑性强，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如《桐叶封弟辨》文章以“古之作者有言”起首，简练地交待了桐叶封弟的传说，作为下文辨析的靶子。接着用“吾意不然”一句，转入正文，开始进行辨正。明知周王是不审之言却促其落实，用二难推理显示周公在促使“桐叶封弟”问题上的进退失据，荒谬可笑，然后从桐叶封弟故事引出正确的见解，“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反映了作者的民主精神。

分文体而论，柳宗元各体散文成就各异：

1.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的特色散文，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钴鉞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清冷之状与目谋，潏潏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心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钴鉞潭西小丘、小石城山、愚溪，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觉得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为他对山水抱有这种感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才写出如此细腻、优美、动情的山水游记。

同时，柳宗元又以极其优美、凝炼、精致的语言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把景物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极善于用各种传神的辞句来写各种各样的山林溪石，如写水的幽深平静，则用“黛蓄膏渟”（《游黄溪记》）；写水的清澈浅平，则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跳动轻快，则用“流若织纹，响若操琴”（《石涧

记》；写水流动曲折，则用“曲行纡徐，睨若无穷”（《石渠记》）；写石，则有“嵌然相累而下者”、“冲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之石（《钴鉭潭西小丘记》）；有“为坻为屿为碁为岩”的岸边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穹穴透邃，堆阜突怒”的园中之石（《永州新堂记》）；又有“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丰富的语汇和精微的观察，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他的山水游记也汲取了骈文的长处，多用短句，节奏明快并且富于变化。像《袁家渴记》写风，连用八个四字句：“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濺，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以急促的节奏烘托了风的气势。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鱼：“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俛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则在参差舒畅中略有紧促，使鱼的静与动极生动地随节奏而生。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地方，却凝聚了柳宗元精心锤炼的功夫。

他又极善于运用虚实相生、忽叙忽议的方法布局谋篇，使文章开阖变化，意趣无穷。如《游黄溪记》先从全国范围来说永州山水最善，逐渐集中到黄溪，然后依游览登临的次序呈现黄溪景色，有如从空中俯瞰，从远而近，由外而内，最后转到黄溪的传说戛然而止，不囿入半点主观感受，用自己的眼光观赏，而让读者如历其境；而《始得西山宴游记》则从每日登临转入具体的西山之行，先描写登高远眺山水大势，以作者自身“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感受收束，又充满了主观情感色彩，令读者在这种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神游山水；《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在水中的怡然之乐和作者坐潭上的凄清悄怆相映，以日照潭水的明与竹树环合的暗互衬，显出一种鲜明的对比感；而《袁家渴记》则在匆匆记叙袁家渴的幽丽之后，转过来写风来时“纷红骇绿”、“冲涛旋濺”，使单纯的登临游览又横生出一种动态的奇异情状。

2. 寓言散文描述生动,寓意深刻。柳宗元的寓言善于创设故事,生动形象,呼之欲出。如《谪龙说》全文不到 240 字,却写了六个画面,群儿戏郊亭上,奇女自天而降,贵游少年复杂情态,奇女叙来历表态度,入居佛寺讲室,化龙和升天。而重点放在奇女刻画上,为她创设三个情景:自天而降的情景,“有奇女坠地,有光晔然,被緌裘白纹之里,首步摇之冠。”自述来历的情景,“吾故居钧天帝宫,上下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变化升天的情景,“取杯水饮之,嘘成云气,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终。”三个情景皆叙事如画,给人以丰富想象。其次是善于寄寓思想,《谪龙说》的寓意全在末句“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即谪者来自天下,地上的俗子欺辱不得。实际上表达了作者被贬谪生涯的最大愿望,不受欺辱,短暂而归。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表现手法多样。写实式如《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捕蛇者说》,寓言式如《永某氏之鼠》、《谪龙说》。表达方式有的夹叙夹议,如《种树郭橐驼传》、《李赤传》等;有的卒章显志,如《谪龙说》、《三戒》。从人物讲,有写鬼,如《李赤传》,开狐鬼小说之先河;有写淫妇,如《河间传》,是狭斜小说之滥觞。他通过寓言对现实世界进行肯定与否定,每篇小说都蕴含某种对社会人生的理解、爱憎和评价,在以作品的形象吸引和感染读者的同时,也以蕴含在形象中的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影响读者。

3. 论说文:逻辑谨严,文笔犀利。柳宗元论说文思想深刻,论证充分,分析透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柳宗元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头脑灵敏,观察社会敏锐细致,发表见解鞭辟入里,所以他的论说文往往选题巧,文意新,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不道,常常起到振聋发聩、开顽启愚的作用。《伊尹五就桀赞》就是一篇说理杂文。伊尹是商汤的贤臣,帮助汤灭夏开商。在这过程中,他曾五次投奔到夏朝末代暴君桀那里,又五次回到汤的身边。有人对伊尹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指责伊尹不能果断、坚决地择贤主而从。但柳宗

元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指出伊尹并不把夏朝或商朝那一个朝代系在心上，而只考虑人民的利益。伊尹之所以投奔桀，是想如果他能纳谏，就利用他掌握王权，迅速改善人民生存状况；后来看到桀无可救药才帮助汤推翻夏朝，这是为百姓谋福利。同样新颖独到的观点还表现在《敌戒》中：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施施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祇益为瘡。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毫。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所谓“敌戒”，就是以敌对事物为警戒，旨在阐明强大对手对自己的益处。早在《孟子·告子下》中就有“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论述，《敌戒》对此加以发挥，指出人们都知道敌人有危害自己的一面，却不知道它还有对自己有益的一面。论点更为鲜明突出。举出秦国有六国为敌，便励精图治日益强大；而在消灭六国后，却肆意妄为二世而亡，证明强敌压境能激发自己生存潜力，而“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失去强大对手和敌对势力，反而志得意满，无所作为。文章揭示敌我相反相成的关系，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4. 传记文：写实精神与文体变格。柳宗元的大臣人物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国子司业阳城遣爱碣》，实地调查搜集素材，有很强的真实性。这些人物传记，没有把国家图书馆和官方现有文献资料抄一通了事，而是融会贯通，对所记人事的时间、地点、人

物、起因、经过、结果做到无不言之凿凿。如《段太尉逸事状》环绕段秀实与跋扈军阀、不法军卒作斗争的中心线索，写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写领行营节度使郭晞纵容悍兵横行不法，段秀实不忍人无寇而死，自告奋勇镇压不法乱兵，并只身入军营做说服工作，最后终于消祸弥乱，为民除害。第二件叙焦令谌强占民田，大旱之年还强收佃农租粮，段秀实卖掉自己的马，代民还债，表现他的宽仁爱民。第三件记军阀朱泚瞒着段秀实给他送礼，段秀实知道后把礼物原封不动地置于官署的屋梁上，朱泚败死后人们从小吏口中得知其相，无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作者只把事情叙写清楚，不作任何议论而褒贬之意自明。

小人物传记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豪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河间传》、《捕蛇者说》不同于以往传记文的体式，而是一种兼具史传、寓言、小说、政论特点的特殊散文，是柳宗元传记文学形式的一个独特创造。这些传记多取材于当时社会下层，其传主大都为市井细民或普通百姓，而不是那些“有功名者”。这些小传，大都短小精悍，没有史传文那些程式，也不像史传文那样详实全面。在叙写过程中，又往往借题发挥，以各种方式明讽暗刺。有的传记通过一个故事反映一个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从选材立意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有的抓住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来描写，如《童区寄传》只写其被豪贼劫缚之后的机智反抗；有的就传主智慧品德的某一个侧面来加以渲染，如《梓人传》只突出其统帅众匠、知人善任的才能；有的完全是借传立说，借题发挥，人物的事迹只是作为作者借以发挥政见的引子，如《种树郭豪驼传》人物行迹仅仅一段文字，文章的主体是郭豪驼的两大段谈话，名为传记，却重在说理，把一番治国养民的大道理，寄寓在一个种树人谈吐之中。

第三节 柳宗元的诗品

柳宗元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历来评价很高。宋代大诗人苏轼曾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又说，柳宗元、韦应物的诗是“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一、柳诗思想品质

1. 现实抒情诗

柳宗元少有大志，他的《冉溪》写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縲囚。”此诗的第二句就是他参与永贞革新的“壮怀激烈”的写照。但是中唐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改革者碰得头破血流。柳宗元情绪一落千丈，只好用诗歌表达内心的伤痛：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别舍弟宗一》）

第一首写于被贬柳州的当年。元和十年，“八司马”在遭受长期流放之后被召进京，再次外放州郡为官，虽说这次实授刺史，但任职地更为荒远。柳宗元到了广西柳州城，马上意识到这里的荒凉，就给漳州的韩泰，汀州的韩晔，封州的陈谏，连州的刘禹锡写诗

致意。诗中的“愁思”，通过登楼所见景物的渲染更加感人。“惊风”“密雨”，显然有政治风雨之意，“芙蓉”“薜荔”，则更有理由理解为象征“八司马”。岭树遮目，江流回肠，形象地表现了对积毁销骨的畏惧与对友情深的赞叹。

第二首作于到柳州的第二年。堂弟柳宗一要到江陵去，柳宗元用此诗送别。春天的景物，本来是山青水秀，百花争妍，而在送别者的眼里，却已是“零落残红”，青山被瘴气黑云缠绕，碧水有远行者和送行者的泪水，前途未卜，似有无形的险恶。尤其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两句之意，将自己后半生的坎坷遭遇作了极其沉痛的概括，成为当时和后代政治失意者百写不厌的共同语言，既是伤感之笔，更是神来之笔。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苏东坡“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黄山谷“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说的不都是贬谪生涯荒废人有为之年的伤感么？

2. 咏史诗

诗是心灵的窗口，真正震撼人心的诗作必定具备强烈的批判意识，真正深刻的历史观照也应反映人的现实精神。将强烈的孤愤融入对历史的观照、反思之中，既使得咏史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又赋予史事以丰厚的现实内蕴和情感深度，这是柳宗元为数不多的咏史之作的一大特点。

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嗟嗟事强怨，三岁有奇勋。悠哉辟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煊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蠹蠕群。风波歟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咏史》）

这首诗以战国名将乐毅为歌咏对象，而又暗自关合诗人的身世遭际：乐毅先事燕昭王，颇受重用，为燕拔齐七十余城，立下卓越

战功。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乐毅灭齐之功未成，就有朝臣说他坏话，燕昭王把诋毁乐毅的奏章封存起来交给他，尚能表示对他无保留的信任；后来新君继位，乐毅成为众矢之的，只得交出兵权，避祸于他国。这与诗人参与的永贞革新革除弊政，使得“市里欢呼”、“人情大悦”（《顺宗实录》卷一、卷二），而顺宗刚禅位即遭灭顶之灾，悲剧性是惊人相似的。同样的主题更突出地表现在《咏三良》中。三良即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左传》文公六年载有秦伯任好卒，三良皆被殉葬的事件，《咏三良》即取材于此。历史故事本极简略，但到了柳宗元手上却得到了情感上的渲染和丰富：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诗的前半部分从具体参政到殉葬身亡，三良的悲剧写得有声有色；后半部分议论情感奔腾澎湃，联系到革新派首领王叔文被赐死，成员王伾、凌准相继贬死的事件，那么，此处对三良殉死的咏叹，又何尝不可视作是对王叔文等惨死的悲悼？对八司马所受政治迫害的鸣冤叫屈？

3. 山水诗

柳宗元的山水诗大都写于南方贬谪地。永州有着关中所少见的原始山林，流水飞瀑，这种独特的山水环境，给了他莫大的感官刺激，使他在短暂时间内忘却被贬的痛苦。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一诗中，景物描写让读者神往：

……虚馆背山郭，前轩面江皋。重叠间浦溆，逶迤驱岩嶮。积

翠浮澹滟，始疑负灵鳌。丛林留冲飏，石砾迎飞涛。旷朗天景霁，樵苏远相号。澄潭涌沉鸥，半壁跳悬猱。鹿鸣验食野，鱼乐知观濠。……

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同样也写了一些山水诗。这类山水诗着力描绘岭南山水的特异。他的《岭南江行》一诗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此诗所述蛮荒之景，不仅与中原相异，也与永州时期所写山川景物不同，它是岭南所特有的。明人廖文炳解此诗云：“此叙岭南风物异于中国，寓迁谪之愁也。言瘴江向南，直抵云烟之际，一望尽是海边矣。雨晴则象出，日暖则蛟游，射工之伺影，飓母之惊人，皆南方风物之异者。”指出了柳宗元写“南方风物之异”、“善蛮荒之景”的特点，也正是柳宗元山水诗所开辟的新的境界。对中国山水诗发展有开拓之功。

柳宗元在柳州所写的山水诗，不仅善写柳州蛮荒之景，而且他还把岭南独特的风俗习惯特征融入诗中。山水诗自产生以来，其描写的中心，多在山川自然的山容水貌，而对于一个地域的风俗习惯的描写尚不多见，柳宗元在山水诗中织入风俗习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其《柳州峒氓》一诗：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

明人廖文炳曾云：“子厚见柳州人异俗乖，风土浅陋，故寓自伤之意。”且不论诗中所寄寓的感情，就其中所写的“人异俗乖，风土浅陋”，作为山水诗而言，其开拓的山水新境是不言而喻的。

4. 闲适诗

柳宗元并非所有的诗都那么冷峻，贬谪生涯中也写了一些轻松愉快的诗。如《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大概是从永州奉诏进京时所写，格调就带有喜气，“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可谓诗人为数不多光亮之作。另外，贬谪生涯中柳宗元喜种树，种树给他带来不少快乐。如《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为官造福当地的惠政太少，所以种树给当地人留下念想。又如《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手种黄柑二百株，春秋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门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更堪养老夫。”表达了种树自喜喜人的高尚情怀。贬谪生涯中，柳宗元较多地接触了农居和农民。他的《首春逢耕者》写道：

南楚春候早，馀寒已滋荣。土膏释原野，百蛰竞所营。缀景未及郊，穠人先偶耕。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农事诚素务，羁囚阻平生。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

此诗写了农人春耕，与农人的谈话，流露出对故乡故土的思念和对归隐田园的向往。又如《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此诗表现了半谪半隐生活的惬意，与农圃为邻，与山林隐士无异，早晨下田耕耘，傍晚划船返家。真是难得贬中之乐。

二、柳诗艺术品质

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

自然、朴实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

1. 意境空寂

柳诗中常常出现的是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月是寒的，露是寒的，远处微渺的泉声和山鸟偶尔的一鸣，映衬出寒夜的清冷静寂，在寒夜中呈现了诗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又如著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广袤的雪原上，没有人迹，在茫茫的天空中，没有鸟影，只有一叶孤舟载孤零零一个渔人，在雪漫漫中独自垂钓。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全诗表现的也是一种空旷悠远的感受，只是孤独感不是那么浓厚罢了。这些诗，都有幽深清远的意境，都包含了空旷孤寂的感受，又都是以经过精心锤炼而又不显得做作的语言和清丽朗洁而又平凡朴素的意象来表现的。

形成空寂特色的原因很多，第一，他与僧侣的交往。柳宗元崇信佛教由来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说，“吾自幼好佛”（《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而他的诗大都作于被贬之后，他所贬谪的永州、柳州又是禅风极盛的地方。在永、柳二州期间，他常与禅僧往来，从禅僧那里，他接受了“乐山水而嗜闲安”、对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巽公院五咏·禅堂》一诗中说，“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晨诣超禅师院读禅经》又说：“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都表现了对超越尘世

而无所滞累、空灵淡泊的心境的追求,因此,他写诗也就要努力表现这种心境。第二,永州、柳州秀丽山水的影响。十余年间,他在这种美丽而又荒疏的自然山水中生活,“悦荡其心,倡佯其形”(《对贺者》),使他对自然山水有亲切的感受;特别是在政治上受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他更感到山水对心灵的安慰。他把这些山水景色融入诗中,如“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蝓鳞”(《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岭南江行》),“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乱莺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这些富有南方风味的自然景象给柳宗元的诗增添了一种新颖绮丽的美感。同时,这些景象在柳宗元主观心理的作用下,呈现出静谧旷远的意趣,成为构成柳诗独特意境的重要因素。

2. 情调清冷

柳宗元不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遇,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心情常常与恬静闲适的追求纠缠在一起,流露在诗中,使诗在闲适中有寂寞,在恬静中有孤独,在平和中有悲伤。如《夏初雨后寻愚溪》:“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被称为“愚溪”的“荒泉”自具美质而不为人理解和重视,却成为诗人自况自慰的对象。柳宗元在诗中说“寂寞固所欲”,自称要“息营营”、“静炎燠”,心里却是一腔无可奈何、只得如此的苦衷。这种闲旷与忧郁的交织,使柳宗元的诗中出现了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都没有的清峻。尽管他的很多诗写得很淡泊,但透过去一层看,那空灵淡泊往往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而悲凉却是不自觉的内心呈露。而当这种悲凉侵入心头而不能自己时,那闲适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悲愤之气,而当激愤到了极点时,他也会写出《笼鹰词》、《行路难》这样借困在笼里的雄鹰和追日而死的夸父来比喻自己的悲壮诗歌。

第四节 柳宗元散文名作精鉴

一、论说文

送薛存义之任^①序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②，崇酒^③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④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⑤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⑥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第76页）

注释：

① 薛存义：河东人，柳宗元同乡。作此序时，薛已代理零陵县令两年。

② 俎：这里指放肉的托盘。

③ 崇酒：斟酒。语出《仪礼》。

④ 吏于土：在地方做官，为官一方。

⑤ 食于土：靠土地维持生活。

⑥ 的：确定无疑。

分析：

1. 写作背景

当时柳宗元已被贬官永州司马，但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治理想，还有一股从政热情，所以当同乡薛存义将要实掌县令时，写此序送行。作品以元和初期永州零陵县发生官吏渎职、农民暴动为借鉴，对薛存义先前的治绩表示肯定。并对当时统治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官吏是父母、人民是子民的观念予以否定，反对把治民理解为役民，要求官吏从根本上改变收受人民的俸禄又祸害人民的做法。是有进步意义的。

2. 柳宗元的官民观

柳宗元认为：官吏的俸禄是从人民所交的租税中提取的，应该对人民施行公平的政治，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官吏是受雇于人民的；国家的主人不是官吏和衙门，而是人民。官吏与百姓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官吏管理百姓，但本质上是百姓委托官吏替自己服务。官吏公仆论，也就是主权在民论。

愚 溪 对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见梦曰：“子何辱予，使予为愚耶？有其实者，名固从之，今予固若是耶？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呕泄；藏石走濊，连舻糜解。有鱼^①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恶溪^②。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其名曰弱水^③。秦有水，猗汨泥淖，挠混沙砾，视之分寸，眇若睨壁，浅深险易，昧昧不覩，乃合泾渭，以自彰秽迹，故其名曰浊泾^④。雍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⑤。夫恶弱，六极^⑥也；浊黑，贱名也。彼得之而不辞，穷万世而不变者，有其实也。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⑦，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卒不见

德而肆其诬，岂终不可革耶？”

柳子对曰：“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见贪泉^②乎。有饮而南者，见交趾^③宝货之多，光溢于目，思以两手左右攫而怀之，岂泉之实耶？过而往贪焉犹以为名，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迹，伏者宜远。今汝之托也，远王都三千余里，仄僻回隐，蒸郁之与曹，螺蚌之与居。唯触罪挨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闾闾以守汝^④。汝欲为智乎？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经于汝，而唯我独处？汝既不能得彼而见获于我，是则汝之实也。当汝为愚而犹以为诬，宁有说耶？”

曰：“是则然矣。敢问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

柳子曰：“汝欲穷我之愚说耶？虽极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①。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②，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愿以是污汝可乎？”

于是溪神深思而叹曰：“嘻！有余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遂书其对。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散文钞·柳州文钞》，第 180 页）

注释：

- ① 鱼，指鳄鱼。
- ② 恶溪，地在潮州。一说在浙江丽水县。
- ③ 《山海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环之。注云：其水不胜鸿毛。
- ④ 实际上是泾清渭浊，柳宗元这里说反了。

⑤ 酈道元《水经》：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

⑥ 六极：古称六种极端不幸的事。

⑦ 方舟：两条相并而行的船。

⑧ 贪泉：广州城外二十里，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

⑨ 汉武帝设交趾郡，在今广东广西。

⑩ 侵侵，连续不断；闯闯，日复一日。

⑪ 意为，无论你怎么都想象不出。

⑫ 荡，放，都是任意的意思。吕梁，大水。《庄子》曰：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

分析：

1. 论辩性质

本文虽然有故事情节，而且局部有生动描写，但实际上是一篇论说文。通过愚溪之神与作者的问答，阐明了作者“愚”的程度和改名冉溪为愚溪的原因。冉溪不能招来达官贵人为之增光生色，只有贬官索居，所以称为愚溪名副其实；柳宗元众人皆醉己独醒，众人皆东己独西，被碰得头破血流而不知。本文运用类比推理，诙谐幽默，嬉笑怒骂，在自嘲中反说社会的黑暗，可称为艺术性论说文。

2. 文体源流

利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表现作者仕途感受和思想矛盾，始于东方朔《答客难》，而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所写《进学解》为此文近源。这类文章，实际上是把作者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主客的辩难写出来，并且往往主说服客，表现作者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占上风的思想。

3. 艺术造诣

一是构思巧妙，化抽象为形象，变枯燥说理为生动论辩。二是修辞丰富而贴切，排比句式铺陈全面，富有气势；反问句式表达有力，富有激情；比喻句子，想象丰富，富于表现力。三是一反凄苦冷清而为豁达诙谐之语，让人嬉笑之余流下心灵之泪。

二、记叙文

宋 清 传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①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②，咸誉清。疾病^③痼者。亦皆乐就请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④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賒死者千百^⑤，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⑥乎！吾见蚩之有在也^⑦。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⑧”。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⑨，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第 88～89 页）

注释:

- ① 居:积存。
 ② 雋:卖。
 ③ 疮:头疮。疡,身上溃烂。
 ④ 蚩妄:愚蠢。
 ⑤ 此句意为,讨不回的死账成千上百。
 ⑥ 翦翦:狭隘。
 ⑦ 此句意为,我认为这才是愚蠢。
 ⑧ 市道交:以做买卖的方式结交别人。
 ⑨ 此句意为,假如宋清做买卖的方式能遍及天下。

分析:

1. 本文主题

本文的主题是呼唤厚道待人,反对趋炎附势,以利交人。文中高度肯定宋清“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和“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的做买卖之道,严厉抨击“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而竞相以利交人的现象。虽然是由自己被贬后识尽世态炎凉有感而发,但在封建社会有普遍意义,并且在当代有借鉴意义。

2. 本文表现艺术

本文采用以小见大、由具体生发抽象的表现方法。宋清不过是药铺生意人,他做生意不斤斤计较,赊出去的账人不主动还他也不讨要,人发达后加倍还他也不拒绝,这种经营方式固然有不少死账,但相比之下还是加倍偿还得到的多。作者由此联想官场上用做买卖的方式与人相处,有利则来、利尽则去的恶行,表现了普遍的主题。以小见大,是柳宗元常用的写作手法,除了本文,还有《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都是如此表达主题的杰作。

愚溪^①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

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断断^②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专得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③，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④，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⑤，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⑥，纪于溪石上。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第 73～74 页）

注释：

- ① 愚溪：在作者贬谪地永州零陵县。是潇水的一条小支流。
- ② 断断：争夺不休的样子。
- ③ 三句意为，水清得可以映照各种物类的影子，水声铿锵如同金石之声。
- ④ 二句意为，留意各种事物，捕捉各种形态。
- ⑤ 二句意为，要忘记自我，与自然一体。
- ⑥ 八愚：即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八愚诗，已佚。

分析:

1. 柳宗元定居愚溪说明什么

柳宗元原住永州城河东,那个地方人居稠密,表明他在盼望返京,而现在搬到了河西的冉溪,这里偏僻冷清,向世人表明自己要归隐山水,过“甘终为永之民”的日子。然而,这只不过是柳宗元对世俗之人的无奈表白,而在他与友人的书信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心底的真情,“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因此,他的迁居是向世人宣布要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要重新构筑自己的心灵家园,用埋头著述实现个人价值。

2. 柳宗元“愚”内涵何在

其一,是对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过于乐观地估计时事的反悔,“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与裴埙书》);其二,是指贬居永州后,不能韬光养晦,而天真地以为东山再起之时指日可待。前几年他给别人写了很多书信,乞求朝中的故旧大臣援手相救,希望将心中的悔意与忠心闻达于皇上,无奈竟无人“肯以书见及”。面对现实,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遭人嫉恨,官场是何等的冷漠,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官场人际交往中的“愚者”;其三,是指自己不能“以文墨自慰”而蹉跎了岁月。在移居愚溪之前,柳宗元也写下了许多文字,由于“刑部囚籍”身份,由于对朝廷“复为士列”的期望,所以不敢“即文以求其志”(《寄许京兆孟容书》),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建树。他感觉自己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走进了迷途,所以以愚自居,自称愚者。

3. 愚溪的象征意义

“愚溪”是贯穿全文的线索,是作者刻意构建的一个寄托了自己全部情感的“意象”。首先,柳宗元将愚溪与愚谷并列,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将如愚公谷中的老翁,不再期待朝廷对自己的“罪状”重新作处置。把冉溪“更之为愚溪”,暗示自己将隐居溪边,慢慢消化自己因愚而酿成的苦果;其次,愚溪与另外七愚“丘、泉、沟、池、堂、亭、岛”相互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愚”起到了强化的作用,表达了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愚”;再次,柳宗元通过对愚溪的描写与议论,向世人宣告自己对未来的追求。在政治上,作者知道自己如同“愚溪”已经“无以利世”了。但他决心用“文墨自慰”,相信自己可以像愚溪一样“善鉴万类”,可以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实现个人价值。

第三章 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是北宋诗文风格的奠基人，同时又是北宋中期成功的社会活动家。

第一节 欧阳修的人品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中期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青年时期锐意进取，中年时期持重务实，晚年时期保守逍遥三个阶段，在文学改革、为人处世和为官理政等方面都广有建树。

1. 出身君子之家，深得正统教育

欧阳修《泷冈阡表》介绍自己父母说：“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推官，判官，都是州郡佐理司法的官员；江南名族，可见欧母文化修养之深。在这样家庭影响之下的欧阳修，从小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美德长大成人的：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垆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父亲的清正自持，忠于职守，慎重官务；母亲的勤俭持家，安贫乐道，轻利重义，作为欧阳修的第一任老师，给了他正直忠诚的灵魂。

2. 家境贫寒，苦学成才

《宋史》本传说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

声。”欧父早死，其母郑氏发誓要把欧阳修抚养成人，家里穷得买不起笔墨纸砚，就用芦苇在地上写字教子。由于欧阳修聪明好学，到二十岁已经小有文名。

青年时期的欧阳修，第一个宏愿是要在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领域拨乱反正，恢复中唐韩柳古文传统。《宋史》本传说：“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镂刻骈偶，澶忍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轡绝驰而追与之并。”他以韩愈为标榜，以复兴古文为己任，以继承柳开、穆修的诗文革新衣钵为荣，以容忍骈文泛滥为耻，通过研读韩愈的散文旧稿揣摩古文精髓，“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人生有了良好的开端。

3. 政坛新秀，见义勇为

欧阳修任职馆阁校勘，正是范仲淹政坛锋芒毕露之际，“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宋史》本传，下同）虽然被贬地方，但欧阳修因仗义执言而声誉大振，他的名字与人望极高的范仲淹联在了一起。后来“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谢绝范仲淹提携的好意，表明了他超凡脱俗的政治品质，政治上得分更多，“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这样，欧阳修就进入仁宗后期政治核心。

当时范仲淹正在大刀阔斧地推行庆历新政，“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

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欧阳修利用自己言官的身份尽最大可能地帮助范仲淹，平时有机会就向仁宗陈述新政的好处，并在范仲淹被贬官的关键时刻为他说话，在自己受到牵连的情况下还为庆历新政鸣冤叫屈。他的《朋党论》写道：

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指出像范仲淹这样的朋党于国于民有利，明君应该大力提倡，而不应该疑忌迫害。此文把朋党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进而阐明小人无朋的道理，理论上极有创新精神。

4. 关注河北，兴利除害

经过怀疑和比较，仁宗皇帝还是觉得欧阳修忠心可嘉，于是又把他作为近臣使用。《宋史》本传载：“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修起居注，就是记录皇帝的言行，作为史料保存；知制诰，就是代皇帝起草诏书。这两种职务，都是十分要害的岗位。仁宗不试而用，说明他对欧阳修的高度信任。有了皇帝的信任，欧阳修得以参与重大朝政决策。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

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於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於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於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这里所写两件大事，一是出使河东，力排众议，保留了麟州边防要地，分其兵驻河内诸堡，加强了防御纵深，力主由民开垦边疆荒地，岁得粟数百万斛；二是出任河北都转运使，说服富弼放弃尽杀降卒的企图，保持了河北的安定。

5. 才高气正，佞臣所忌

欧阳修为官，不以自己受宠为足，而以天下惜才为任。“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於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

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宋史》本传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表现欧阳修的见识远大，正气凛然。一是通过详写佞臣小人陷害欧阳修的细节，反衬了传主才高气正；二是通过欧阳修力主重新起用范仲淹、韩琦，表现了他的大公无私。欧阳修在滁州、扬州、颍州、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宋南京）如何为官，此处虽没写及，但《宋史》本传篇末有补叙内容：

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可想而知，欧阳修主政地方，对政事的慎重程度。他从父母哪里接受了爱民思想，在实践中创造出“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的理政风格。

6. 发起诗文革新，开创宋文基业

宋初王禹偁、穆修、石介等虽一再呼唤诗文革新，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造成天下风气。到了欧阳修主盟文坛，利用行政手段压

制骈体时文,才真正有了实效,“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这是对骈体文风的一次致命打击,此后散文风行起来,宋代诗文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欧阳修功莫大焉。北宋诗文革新在欧阳修手中完成,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既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场文学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从而更便于推行他的主张。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评价;苏轼以一无名之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

再次,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

词的创作方面有突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制约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得到强化,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行,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7. 位至参政,系国安危

仁宗末年,欧阳修成为朝中谋主。宰相陈执中尸位素餐,“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这些足以说明此时的欧阳修已成为朝政大计的核心人物,所以不久他便登上权力高峰。在参知政事任上,欧阳修开启了北宋军政高层管理数据化、规范化的阶段,“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促使管理高效化,作用非小。



8. 晚年厌恶政事，趋于保守

仁宗死后，后宫矛盾重重，欧阳修平衡政局的难度加大。再加上他主持朝政经验欠缺，遇事表态过多，使得自己日渐孤立，“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最后竟出现了众叛亲离之势，而离开了决策中心。《宋史》本传载：“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说明欧阳修晚年对政事厌倦。文学史上称他以“六一”自号，源于他的散文《六一居士传》：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谓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

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

本文把作者对政事的厌倦、心灰意冷的晚年心态表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可能正确对待方兴未艾的熙丰变法了。

9. 治国有理论，为官有特色

欧阳修属稳健的政治家。仁宗朝名臣无过包拯，但欧阳修治理都城汴梁能与包拯异曲同工。《宋史》本传载：“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如此政绩，来源于他独到治国理论的指导，“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纵观欧阳修一生，不难发现其为政基本原则是顺时应势、事半功倍，如他关于治理黄河的意见，“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垆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垆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顺应潮流、顺应时势、顺应民心，按照客观规律稍加人事作为，当然事半功倍。

10. 文化名人，学者巨擘

欧阳修诗文俱佳，“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

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他乐于提携后进，也为人所推重，成为仁宗朝公认的文坛领袖。

在学术史上，二十四史中《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与欧阳修有关，“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除此之外，欧阳修还撰有《六一诗话》，总结了北宋诗学，也为文学理论之一家言。

总之，欧阳修一生，立言，立德，立功，无不建树颇巨。

第二节 欧阳修的文品

一、欧阳修的散文理论

1. 文道关系论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针对宋初西昆派文人重文轻道的弊端，他大声疾呼：“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与此同时，欧阳修摆脱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偏颇观点，注意到文道区别，肯定“文”的独立价值，认为道不可以取代文，道与文二者缺一不可。他的《代人上枢密求先集序书》，赞同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论断，并且指出：“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强调文学作品既要内容充实，又要讲究文采，达到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2. 文学与现实关系论

欧阳修主张文学经世致用,面向社会,接触现实生活;作家要关心百事,针贬时弊。他的《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君子为学,必须“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反对作家“终日不出于轩序”、“弃百事不关于心”,主张不溺于文。他还提出“文章系乎治乱”,倡导“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主张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服务于现实政治。也正是基于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深刻认识,欧阳修提出了著名的诗文“穷而后工”的理论。

3. 继承创新论

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欧阳修主张在批判继承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他重创造也重继承,既反对一味因袭模仿,也反对刻意标新立异。他的古文创作,继承韩愈的“文从字顺”,摒弃其尚奇好险,提倡平易自然。欧阳修提倡并领导诗文革新运动,是从批判西昆体揭开帷幕的。然而,他以冷静的客观分析态度,扬弃西昆体浮薄空洞、晦涩难懂的文弊,而吸收西昆诗人自觉的艺术性追求。他改造骈文,使四六对偶的骈文走上散文化的道路;在散文创作中,则吸收骈文的句式、章法,讲究文章的立意和情韵,开创宋代散文的新风格。鉴于唐代古文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欧阳修在创新的旗帜下,既反对浮艳纤弱文风,也反对艰涩怪僻倾向。欧阳修力排流俗,利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的机会,采取断然措施,把文风平易的举子拔在高第,将写作险怪奇涩文章者尽情黜落,保证了北宋古文运动健康发展。

4. 平易自然论

欧阳修主张“文出自然”,他在论文时,多次提到这一点。如在《后汉修孔子庙器碑》中说:“前汉文章之盛,庶几三代之纯深。自建武以后,顿尔衰薄。崔、蔡之徒,擅名当世,然其笔力辞气非出自

然，与夫扬、马之言，醇醪异味矣。”猛烈抨击了不“自然”的文风。欧阳修“自然”一词总的看来是指文章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说：“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发，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金玉光灿灿，不是出于雕琢，而是由于质朴自然。

二、欧阳修散文的思想品格

欧阳修不仅为北宋诗文革新提供了理论，而且创作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散文作品。他的散文作品，数量巨大，以《欧阳文忠公集》统计，有二千三百余篇，尚不包括《诗本义》、《新五代史》以及《新唐书》“本纪”、“志”的有关篇目。欧阳修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分论说、记叙、书简、序跋、赠序、传记、赋颂、奏议、诏册、墓志、祭吊、杂体等十二类，前人誉为“文备众体”、“各极其工”。

1. 论说天下大事，表明政治主张

欧阳修以天下为己任。在《原弊论》一文中，指出天下大弊有三：“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诱民之弊主要是僧侣、兵卒日众，他们不劳而食，引诱农夫背离田亩，“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兼并之弊主要是种地者无地，有地者不种，田租剥削使农民日益穷困，“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力役之弊指官府徭役繁多，“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他认为总此三弊，造成北宋积贫积弱之势，“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贵者，化粗粝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为兵者，养父母妻子，而计其馈运之费，是一兵常食五农之食也。为僧者，养子弟而

自丰食，是一僧常食五农之食也。贫民举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几何其不乏也！”他所开振兴北宋的良方，一是停止国家需要什么就向百姓征取什么，需要多少就向百姓征取多少的做法，而要根据民力大小决定国家的开支，“量入以为出，一岁之物三分之，一以给公上，一以给民食，一以备凶荒。”入少，就要减出。这样，势必要裁减冗兵、冗官。二是讲究“丰年补救之术”，改变目前“有司之调度，用足一岁而已，是期天岁岁不水旱也”的状况，实现国家财用计划以三年为期，“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岁，期一岁以必灾也”。这样，必然要开源节流。三是改变种田者饥不择食，不种田者浪费粮食的现状，实现田农与国家共富，“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这样，势必要压缩不劳而食者的数量，壮大田农队伍。

2. 描述社会百态，表明激扬精神

欧阳修记叙文主要是两类。一类记述亭台楼阁，一类记述亲历人事。他的亭台楼阁记突破前人单纯表现客体的藩篱，不写亭园楼阁的废兴；即便有一些亭台、风光描写，也决非文章重点，只是作为媒介物，由此生发议论，引出抒情，表现作者自我形象，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如《丰乐亭记》写景叙事文字很少，“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滢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记亭写景，引发出下面的议论，“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今滁介于

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文章旨在歌唱太平气象，称颂丰乐世道，表现作者与民同乐的情怀，并告诫人们珍惜和平安乐生活，感怀大宋王朝恩德。

欧阳修也善于抓住亭园楼阁的命名大做文章，抒写作者的思想情趣。如《非非堂记》：

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纪于壁末。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

全文紧扣“非非”堂名发表议论，阐述了自己的是非观，表明肯定正确否定错误时宁愿否定别人致错也不盲目苟同的做人原则。作者处事为人之大节，在此文当中自表无遗。

欧阳修另外一些寓言小品式的记叙文，记叙作者亲身经历的或是虚构假托的一件小事，说明某种深刻道理，多为感时伤事而作，篇幅短小，耐人寻味，兼具形象性、现实性和哲理趣味。如《伐树记》，以修治东园伐樗留杏写起，感悟事物的幸运与不幸取决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表达自己锐意进取的人生观。《养鱼记》借大鱼“不得其养”，小鱼“有若自足”的描写，讽刺有才反难以进用的现实社会，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

3. 人物传记文表现各色人生

欧阳修的人物传记包括墓志铭、行状,写活了同时代一些人物。如《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的苏洵,“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闾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恣,故得之精。自来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号老苏以别之。”是大器晚成的形象。而《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中的苏舜钦,“君状貌奇伟、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师,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范文正公荐君,召试得集贤校理。自元昊反,兵出无功,而天下殆于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奋然用三四大臣,欲尽革众弊以纾民。于是时,范文正公与今富丞相多所设施,而小人不便。顾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动,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荐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监进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纸钱会客为自盗除名。君名重天下,所会客皆一时贤俊,悉坐贬逐。然后中君者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其后三四大臣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却是一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形象。

4. 状物文赋文情并茂

欧阳修在文赋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非小。他的《黄杨树子赋》因“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江行过绝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独念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受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而作,通过“岂知绿藓青苔,苍崖翠壁,枝

蓊郁以含雾，根屈盘而带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涧断无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江已转而犹见，峰渐回而稍隔。嗟乎！日薄云昏，烟霏露滴，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的描写，表现对“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精神气质的赞颂，表现自己坚定不移的政治节操，可谓托物言志的杰作。

他的《杂说三首》乃“夏六月，暑雨既止，欧阳子坐于树间，仰视天与月星行度，见星有殒者。……其感于耳目者，有动乎其中”而作。把陨石落地前后境遇和人的生死结合起来描写，说明生命的价值在于不停运动、自强不息。

星殒于地，腥矿顽丑，化为恶石。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精气之聚尔。及其毙也，瓦砾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蝼蚁之食尔。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其二）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东行。日一岁而一周。月疾于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星有迟有速，有逆有顺。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为谋，其动而不劳，运而不已，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是何为哉？夫四者，所以相须而成昼夜、四时、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则四时不得其平，万物不得其生，盖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于是乎有感。（其三）

日月星辰停止运行便落地为顽丑，人停止奋斗便为行尸走肉。这就是作者通过状物告诉读者的生命真言。

三、欧阳修散文艺术品格

1. 具有诗之美

欧阳修散文具有浓郁的诗味,它虽然没有采取诗歌的形式,却有诗歌的境界、诗歌的意韵,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语言的诗化和意境的诗化。语言的诗化就是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具有声韵之美。如《醉翁亭记》用语气词“也”构成的朗诵节奏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中的“也”字就相当于韵脚。意境的诗化,就是用优美的语言描述美好的事物。欧文语言秀美清丽如诗,王安石评价欧阳修散文的特点说:“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阔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欧阳修笔下常写的园林、亭堂、台阁、幽谷清泉、野芳佳木、苍烟白露等,本身就是极美丽的,他运用的词语也是典雅秀丽的,这一切无疑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使散文的语言像诗一样美丽。《真州东园记》中穿插诗句,如“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前四句去掉的虚字就是五言诗,后三句也颇有诗意。

2. 史家的笔法

欧阳修的写人文章,往往用史家的眼光,精心选择典型事例,突出人物大节,尽管着墨不多但能传神。在《尹师鲁墓志铭》中,尹师鲁文学、学问可写的很多,但作者一笔带过,只选取尹师鲁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这两件事,尽管所写文字不多,但尹师鲁刚正无私、天下为公的形象却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

前。在《黄梦升墓志铭》中，作者写了与黄梦升的三次交往，而且在这三次交往中，欧阳修都写到了黄梦升饮酒，并紧紧抓住这一情节，深化黄梦升的性格。他或饮酒谈笑，意志自豪；或颜色憔悴，借酒消愁；或起舞歌呼，临筵悲歌，都没有离开酒。饮酒不辍，似是黄的嗜好；而一次比一次潦倒的细节，暗示主人公命运的不济。文章通过对自己与黄梦升的三次交往的追述，塑造了黄梦升才高运低、穷愁而死的下层文人形象。

欧阳修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求传神不求形似，这与他采用史笔手法有关。首先，欧阳修注重文笔简练，文约事丰。他写人物，往往采用史笔的手法，粗线条的勾勒；其次，抓住人物最突出的性格特点进行渲染，着墨不多而神态毕现；再次，史家注重“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功用，欧阳修叙述人物则“期于久远”，有相同之处。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品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强调了求变；重视韩愈诗歌“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重人情物态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历览遗编，研味前作”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

一、欧阳修诗歌思想品格

1. 表现自己仕途沉浮，抒发人生感慨

被贬夷陵，是欧阳修仕途第一个坎坷经历。在夷陵他写很多抒发宦海沉浮的诗篇，如《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非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此诗于凄凉处故作豁达语，表现对待人生磨难的超脱精神。欧阳修家乡江西，江西古属楚国，所以首联实写被贬心情。颌联写夷陵之景，使人想起郢道元描写三峡的名句，“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和“自非亭午夜不见曦月”。颈联点事体，诗人在岁末来到远离都城和家乡的夷陵，只好以酒浇愁。尾联表达以乐观情怀对待命运不公的情愫。

庆历六年，欧阳修又被贬到滁州为官，写下了《题滁州醉翁亭》：“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雨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远步就潺湲。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大概是这一次被贬有先前的经验，已经没有刻骨铭心的作痛，从字面看到的只是一幅悠然乐哉之态。

2. 描写山水景色，寄托复杂情怀

欧阳修写山水诗，有几个高产期。一是欧阳修 25 岁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写了不少游览洛阳山水的诗歌，如《游龙门分题十五首》；二是被贬夷陵期间，写了一些描写三峡山水的诗歌，如《三游洞》、《黄牛峡祠》；三是被贬滁州及后来扬州等地任知州期间，写了相当数量描写江淮山水的诗，如《游琅琊山》、《飞盖桥玩月》。

“滁山高绝滁水深，空岩悲风夜吹林。山溜白玉悬青岑，一泻万仞源莫寻。醉翁每来喜登临，醉倒石上遗其簪。……”这首《赠沈博士歌》表达诗人对贬谪地的深厚情感。而《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写赴滁路上所见之景，“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

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别滁》则写离别滁州所见与感受，“花光浓艳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从眼前景色引出事件、人物，再引出人物的心情，是流动而连贯的笔法；以景物为衬托，把情绪托向高潮，可以看出欧诗含意深婉、脉络细密的特点。

3. 反映现实生活，激扬善恶美丑

欧阳修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与民共忧乐。他的民本思想反映在诗歌中，就是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流露对民众困苦的同情。如《食糟民》写道：“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滃滃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累累罍与瓶，惟恐不得尝。官沽味浓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种糯米的农夫交租于官府，官府用之酿酒。农夫不仅喝不到酿出的美酒，而且要买酿酒剩余的酒糟充饥。目睹此情此景，诗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官吏不劳而食，吃了穿了百姓贡献的衣食，却不能为百姓兴利除弊，每念及此诗人忧心如焚。反之，遇到百姓高兴的事他也跟着高兴，《喜雨》展示了及时雨带来的一片喜气，“宿麦已登实，新禾未抽秧。及时一日雨，终岁饱丰穰。……川原净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谁云田家苦，此乐殊未央。”并对此展开议论：“大雨虽滂沛，隔辙分晴阴。小雨散浸淫，为润广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泽何穷已。无言雨大小，小雨农尤喜。”这种对大雨小雨加以区别，并突出小雨利民尤大的看法，流露出一片仁爱之心，表现了诗人宽缓便民的施政原则。

4. 咏物诗托物寓意，富有情趣

欧阳修咏宝剑，表达去除天下奸佞、安国靖边的思想，“宝剑匣

中藏，暗室夜常明。欲知天将雨，铮尔剑有声。神龙本一物，气类感则鸣。常恐跃匣去，有时暂开局。煌煌七星文，照曜三尺冰。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试以向星月，飞光射搀枪。藏之武库中，可息天下兵。奈何狂胡儿，尚敢邀金缯。”（《宝剑》）此诗前十句虚实结合写宝剑，剑藏匣中尚能夜照卧室，天将雨则剑有声，开匣则光耀人眼。后十句由实生虚，写诗人借利剑报国安民的理想，他要杀尽朝中奸佞，雪年年输辽夏绢银之耻。可谓壮怀激烈，气壮山河。而《菱溪大石》描摹了大石的珍奇，“新霜夜落秋水浅，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蚀禽鸟啄，出没溪水秋复春。溪边老翁生长见，疑我来视何殷勤。爱之远徙向幽谷，曳以三犊载两轮。行穿城中罢市看，但惊可怪谁复珍。荒烟野草埋没久，洗以石窦清泠泉。朱兰绿竹相掩映，选致佳处当南轩。南轩旁列千万峰，曾未有此奇嶙峋。”在此基础上，想象此石的生成和来源，“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精纯。仰视苍苍补其缺，染此紺碧莹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苟非神圣亲手迹，不尔孔窍谁雕剜。又云汉使把汉节，西北万里穷昆仑。行经于阗得宝玉，流入中国随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镌凿无瑕疵。”表现了诗人崇尚自然、尊重历史的情怀。

二、欧阳修诗歌艺术品质

1. 以诗说理，讲求立意

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欧阳修与苏舜钦、梅尧臣都注重以诗说理、讲求诗歌的立意。欧阳修提出“诗以意义为主，文词次之”（《诗话总龟》卷五引《古今诗话》）。梅尧臣提出“意新语工”（《六一诗话》引）。苏舜钦提出“笔下趋古风，直趣圣所存”（《夏热昼寝感咏》）。他们在诗中所表现的“意”，最引人注目的是关心现实的政治志向，包括对社会人生、世态人情的种种认识，既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又有宽广的人生思考。在讲求立意的目的下，他们着重

继承韩愈以议论才学入诗,自由挥洒的特点,通过议论表现了许多真知灼见。讲求立意,尤以欧阳修为甚。

山水诗写景中不忘议论。如《晋祠》,“古城南出十里间,鸣渠夹路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马谒,退即祠下窥水源。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写景文字之后,接以大量议论笔墨,抒写承平时代的宽松和乐的心情:“并儿自古事豪侠,战争五代几百年。天开地辟真主出,犹须再驾方凯旋。顽民尽迁高垒削,秋草自绿埋空垣。并人昔游晋水上,清镜照耀涵朱颜。晋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废兴仿佛无旧老,气象寂寞余山川。惟存祖宗圣功业,干戈像舞被管弦。我来览登为叹息,暂照白发临清泉。鸟啼人去庙门阖,还有山月来娟娟。”当然,这些议论伴随着形象,并不枯燥。叙事诗侧重写感受。如《大热二首》其一,“四时成万物,寒暑迭钧陶。壮阳当用事,大夏蒸炎歊。造化本无情,怨咨徒尔劳。身微天地阔,四顾无由逃。九门阊阖开,万仞昆仑高。积雪寒凜凜,清风吹寥寥。嗟我虽欲往,而身无羽毛。”抒写暑热中欲逃无门,想至昆仑避暑而无飞去之翼的感受。

2. 以诗叙事,务合“物理”

欧阳修提出诗歌要合“物理”,求准确。他曾仔细辨析韩愈《听颖师弹琴》,指出“非听琴,乃听琵琶耳”(苏轼《水调歌头·自序》)。他反对肤浅的描述,认为韩愈《雪》诗中的“随车翻编带,逐马散银盆”用词虽美,却不如“凹中初盖底,凸处遂成堆”更准确地道出雪天特有的景色(《贡父诗话》)。他认为诗歌要有想象、虚构、夸张等主观创造,但不能逾越“物理”所规定的尺度。事实上,所谓“物理”,特别是诗歌中所表现的“物理”,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些普遍而共同的认识,尊重“物理”就是不要过分违背人们习所共见的事实、忽略人们普遍留意的特点,使诗人的个性认识和人们的共同感受相融合。欧诗尊重“物理”,使他突破了韩诗偏好奇闻异事的选材局限,使叙事对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欧诗叙事重

视“物理”，是要做到“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或“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即既客观描摹物态，又自然引申意义。

将此认识付诸实践，欧阳修早年与梅尧臣等几位诗友的往来投赠，就不乏叙事如画、议论畅达的长篇古诗。如《巩县初见黄河》七言七十句，前十二句抓住特征写黄河水大势险，“河决三门合四水，径流万里东输海。巩洛之山夹而峙，河来啖山作沙嘴。山形迤逦若奔避，河益汹汹怒而罨。舟师弭楫不以帆，顷刻奔过不及视。舞波渊旋投沙渚，聚沫倏忽为平地。下窥莫测浊且深，痴龙怪鱼肆凭恃。”刻画三峡的惊险壮阔，传神写照，物态毕现。后面五十八句述与黄河有关之事，从《禹贡》所记大禹治河业绩，到秦汉以来水害再起，最后突出北宋“明堂天子圣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顽不可令，至诚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趋故道，闭口不敢烦官吏。遵涂率职直东下，咫尺莫可离其次。尔来岁星行一周，民牛饱刍邦羨费。滑人居河饮河流，耕河之壤浸河溃。嗟河改凶作民福，呜呼明堂圣天子”的治河功绩，深得“叙人情、状物态”之妙。又如《盘车图》：

浅山嶙嶙，乱石磊磊，山石硣聳车碌碌。山势盘斜随涧谷，侧轍倾轆如欲覆。出乎两崖之隘口，忽见百里之平陆。坡长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杨褒忍饥官太学，得钱买此才盈幅。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见，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有数家笔，画古传多名姓失。后来见者知谓谁？乞诗梅老聊称述。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乃知杨生真好奇，此画此诗兼有之。乐能自足乃为富，岂必金玉名高资。朝看画，暮读诗，杨生得此可不饥。

先描写画面景物,接着介绍画作由来,最后评论绘画造诣,该客观的客观,该忠实的忠实,该自然的自然,深得“物理”之妙。

第四节 欧阳修散文名作精鉴

一、论说文

答吴充秀才^①书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濡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依依莫有开之使前者^②,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假誉而为重、借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③,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④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⑤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⑥,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⑦,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

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霏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散文钞·庐陵文钞》，第 210 页)

注释：

① 康定元年六月，吴充抵京试进士，向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投书献文请教，欧阳修作此书为答。

② 伥伥，迷惘而不知所措。此句为吴信中语，意为仍不自信，担心没人指点他继续进步。

③ 二句意为，光临我家，似有所求。

④ 顷，短时间内。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已经六十八岁，其后著书立说用了五年时间。

⑤ 几句意为，六经各有特色，孔子研读时善于发现各自特色，所以事半功倍。

⑥ 子云，汉扬雄；仲淹，隋王通。扬雄，著《太玄经》模仿《周易》；王通著《元经》模仿《春秋》。

⑦ 轩序：房屋。

分析：

1. 内容精华

本文作为文论名篇，论及和强调两个问题。一是“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观点。文中举孟轲、荀卿皆晚年始埋头著述，说明充分认识“道”是“文至”的先决条件；同时作为对吴充所请教问题的回答，帮助吴充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二是熟悉“百事”即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欧阳修在文中批评那种“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等舍本逐末、浅尝辄止的现象，指出“百事”与“文才”是“文至”缺一不可两翼，告诉吴充要想提高文学水平，除了道胜，就

是熟悉百事，即体察社会生活。

2. 现实意义

欧阳修在本文中，表现了他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博大情怀，而这恰好是欧阳修能够领导诗文革新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广得人和。在吾前者吾必尽心拥戴他，在吾后者吾必热心提携之，欧阳修就是这样一位长者。这一点，也是今人应该努力学习的。

投时相书^①

某不佞^②，疲软不能强筋骨与工人、田夫坐市区、服畎亩，为力役之劳，独好取古书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贤君子之所为，与古之车旗、服器、名色等数^③，以求国家之治、贤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时亦穿蠹盗取，饰为文辞，以自欣喜^④。然其为道阔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劳反甚于市区畎亩，而其所得，较之诚有不及焉。岂劳力而役业者成功易，勤心而为道者至之难欤？欲悔其所难而反就其易，则复惭圣人为山一簣止焉^⑤之言，不敢叛弃。故退失其小人之事，进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识所向，若弃车川游，漫于中流，不克攸济，回视陆者，顾瞻徨徨。

然复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怀智虑而可自肆于世者，虽圣与贤未尝不无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⑥。抱关击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战国，扬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时者矣^⑦；少焉而材，学焉而不回，贾谊之毁，仲舒之禁锢，虽有其时，有不幸其偶者矣^⑧。今以六尺可用之躯，生太平有道之世，无进身毁罪之惧，是其身、时、偶三者皆幸于古人之所有者。独不至焉，岂天之所予不两足欤，亦勉之未臻欤^⑨？

伏惟明公履道怀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计，下以理公卿百职之宜，贤者任之以能，不贤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于工商贱技，皆适其分而收其长。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

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谨以所业杂文五轴贻阁人，以俟进退之命焉。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庐陵文钞》，第 181～182 页）

注释：

① 本文作于景祐元年五月，作者试学士院之前。当时宰相为李迪和吕夷简，“时相”，当指他们中的一个。

② 不佞：不才。

③ 名色等数：礼仪、车服的名称、颜色、等级与数量。

④ 意为，发现精美有价值的车旗、服器，就用文字表述出来，以为学术成果。

⑤ 语见《论语·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簣，进，吾进也。”

⑥ 偏枯：腿脚不便；跛；瘸腿；盲：瞎子；此句言大禹、郤克、左丘明，身有残疾。

⑦ 此句言孟子生于战国，扬雄活在新朝，都不幸于时。

⑧ 此句说贾谊少有高才、董仲舒学道矢志不移，但受谗被囚，都不遇明主。

⑨ 意为，自己于身于时于偶三者优于古之圣贤，而未至圣贤之境，是天不予两者兼善，还是努力不够呢？

分析：

1. 思想价值

本文是欧阳修未发达前，向宰相投书献文请求提携之作。对于今天有志成才的青年不无启发。一是此时的欧阳修很谦虚，他甚至把自己与工人、田农并列，认为自己在文化岗位上做不出成就，还不如工人、田农活得有实用价值。他有点缺乏自信，甚至有知难而退、改行工农的想法。但并不妨碍他日后取位至参知政事、笔定天下进士、主盟天下文坛的辉煌。二是一个人才成功，需要身、时、偶三个条件。结合当今条件，身包括身体健康，更包括身怀

绝技；时包括与时俱进，观念、特长符合时代需要；偶包括遇重视自己德才的伯乐。

2. 艺术造诣

平易自然的文风，平易自然的语言，平易自然的人格，平易自然的干谒。

二、记叙文

真州东园记

真为州^①，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②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为其判官^③。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而日往游焉。

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④，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燕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渠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动摇而下上；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鼃鼃鸟兽之噪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图之所载，盖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

又曰：“真，天下之冲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树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而吾三人者有时而皆去也，岂不眷眷于是哉。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

予以谓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而又协于其职，知所后先，使

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⑤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庐陵文钞》，第 344 页）

注释：

① 真州：宋属淮南东路，治所江苏仪征市。真州在长江北岸，临运河入江口。

② 江淮：旧指江苏、安徽等地；两浙：旧称钱塘江以南为浙东，以北为浙西，合称两浙；荆湖：旧称湖南、湖北等地；发运使：宋太宗置江淮水陆发运，当时驻京师。

③ 施昌言，字正臣；许元，字子春；马遵，字仲涂。前二为正副发运使，后一为判官，三人驻真州总理江淮、两浙、荆湖漕运。

④ 许元在京师还有御史台官务，回京时给欧阳修带来一张东园图，请欧阳修根据园图写个记。

⑤ 六路，指淮东淮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

分析：

1. 北宋漕运

北宋都汴梁，紧邻汴水。汴水东南至楚州入淮扬运河，淮扬运河西接长江水道连荆湖，南下江南运河通两浙。在这条漕运线上，真州位于关键位置，所以宋仁宗时发运使驻真州。

2. 本文构思

以东园虚写为主体，以施、许、马三人通力协作为重点。作者并没有亲眼见东园之盛，只是根据许元带来的图想象出之，但他通过和许元的谈话切实体察了三人“协于其职”，并热情赞颂三人惠政所及，“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因此记园为名，记人为实。

菱溪石记^①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

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漬为《苕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②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苕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据淮南，淮人为讳其嫌名^③，以苕为菱，理或然也。

溪傍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④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肥，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氓^⑤，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反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⑥，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⑦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庐陵文钞》，第 348 页）

注释：

- ① 本文作于庆历六年作者知滁州时。
- ② 永阳岭：在今安徽平安县北；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八里。
- ③ 杨行密：五代时在淮南自立吴国。讳其嫌名，指“行”与“苕”同音，因而改“苕溪”为“菱溪”。
- ④ 刘金：杨行密部将，曾任杨吴的濠、滁二州刺史。

⑤ 编氓，指刘金的后人败落为普通百姓。

⑥ 作者诗《菱溪大石》云：“爱之远徙向幽谷，曳以三犊载两轮”。

⑦ 指丰乐亭。作者《丰乐亭记》：“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分析：

1. 本文思想震撼人心之处

本文初看若平常无奇，但细读思想震撼人心。一是从历史的长河中，看人的穷通贫富变化，有“高山为谷，深谷为陵”之感。刘金在五代杨吴为官时，“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当时“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而到欧阳修时不过百年，他的后人已经“散为编氓”，“子孙泯没而无闻”。当时的富贵烟消云散，连那怪石都保不住。二是欧阳修看透历史，把握社会规律，他拥有大石之后，不再立于自家后园，而是在滁州城南的丰山之下建立丰乐亭公园，置大小奇石于亭的南北，供百姓自由自在地观赏。“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文末此话可谓意味深长。

2. 由实生虚，细粹处见精神

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此篇记石、记菱溪，平平无奇，至记石为刘金故物，忽然发出一段兴废之感来，无限低徊，无限慨叹，正如晨钟朝发，唤醒无数梦，梦不止，作悲伤憔悴语也。”浦起龙《古文眉论》卷五十九云：“闲散收罗，最是小记高手，犹见柳州风格。”

第四章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第一节 王安石的人品

1. 年轻政客,异乎时俗

《宋史》本传所写青少年时期的王安石有三个特点:一是聪慧异常,“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好读书而过目不忘,善文章而动笔如飞;二是操行不同流俗,颇为长者称扬,“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有欧阳修的赞誉,王安石轻易中进士;在淮南判官任满,他不屑于求试馆职,而力求主政地方;三是任职州县,政

绩卓然，“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在鄞县知县任上，大搞水利工程，用贷偿手段刺激粮食储备。在当时政界小有名声后，多次被欧阳修、文彦博等人向朝廷称誉、保荐，官位一再升迁，由知县而知州，最后由提点江东刑狱入朝为度支判官，这时的王安石已经是公认的理财能员，政坛新秀。

2. 力倡变法，渐为近臣

王安石根据自己在地方任职的经验，深知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对变法振兴有着异乎常人的狂热和信心，因而在度支判官任上一有机会就鼓吹变法，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诤诤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变法纲领，论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可行性。虽不为仁宗所认可，但在当时影响不小。

宋仁宗虽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不以为然，但还认为他年青有为，是可造之才，于是多次任命他为馆阁要员，胸有大志的王安石坚决不就，“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王安石从中获得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在文人士大夫中树立了“无意于世”的良好形象，二是迫使朝廷用更高的官位来笼络他，最后才接受了知制诰这一皇帝近臣的任命，并获得了“纠察在京刑狱”的实权。

3. 标新立异,受知新帝

王安石在新的政治舞台上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识,“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人。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在今天看来,王安石驳开封府所判官司确有偏颇,但杀人少年确与一般人犯有别,所以英宗皇帝对御史弹劾王安石一事不了了之。后来王安石标新立异居然到了与宰辅大臣一争高下的地步,“时有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大概是宰辅重臣嫌舍人院不断挑剔重要文书语言毛病碍手碍脚,就用皇帝的名义加以禁止。王安石指斥宰辅有奸,但没有得到英宗的支持,于是他便借口母亲病故,挂冠而去。

一直到宋神宗登基,王安石还在家乡守孝。“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颖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维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得韩维

之助，王安石受知于新皇神宗，神宗将他请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日见亲信。“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王安石在与神宗对话时，常以尧舜期待新皇，而以皋、稷自许，如此潜移默化的结果，使神宗真的想做尧舜并认为要做尧舜非重用王安石不可；王安石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已非昔日英宗朝可比。

4. 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经过君臣长时间接触，宋神宗终于下决心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变法八大内容，经济方面的六项，军事方面两项。从北宋积贫积现状看，变法必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从王安石本人在鄞县的实践看，八项内容也是可行的。但宋朝是一个思想守旧、固步自封的王朝，整个政治机体和官吏思想状况僵化保守，范仲淹庆历新政仅及一年就失败于前便是明证。这次王安石的变法比范仲淹动

作要大得多，所以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

5. 政治生命与变法共起伏、相始终

变法还没见到明显效果，倒是引发的社会不安先表现出来，因而不少大臣开始向王安石发难，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精神回击非难，坚持推进变法。

反对变法的第一攻击波由吕海引发，韩琦、司马光等重臣推波助澜，“御史中丞吕海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海，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吕海指出王安石十大罪过，神宗看后贬吕海出京，韩琦挺身而出为吕海说话，司马光草诏指斥王安石，王安石就针对指斥上书自辩，神宗只得派人向王安石道歉，吕惠卿、韩绛趁机劝神宗挽王安石留任。改革派、守旧派斗争呈拉锯状态，但这次以斗争王安石全胜而告终。

守旧派第二攻击波由司马光首发，“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诤书反覆劝之”。王安石撰《答司马谏议书》予以回击。但司马光的非难引发了连锁反映，连王安石推荐任用的吕公著“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十二个御史、四位谏官都因不满意王安石而辞官。王安石“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遭到朝官强烈抵制，“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可以说十人九反对。

王安石非常孤立，后来甚至连神宗相劝也不听，对恩师名臣也大打出手。《宋史》本传载：“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有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对神宗意见不以为然。“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表现了变法的铁意志、铁手腕。

但是宋神宗后来也对王安石变法持怀疑态度，“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加上太后施加压力，王安石因反对者过多而第一次罢相。

6. 晚年退居江宁，以诗酒自娱

第一次罢相，因为有吕惠卿等人在朝中坚持新法，对政局影响不大。但吕惠卿有野心，想取王安石而代之；王安石再次被起用对此又耿耿于怀，新党内部发生内哄。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是众叛亲离、变法难以为继的结果，这说明王安石本人性格有不适于为相的一面，比如他遇事操之过急，对人刻薄寡恩等。熙宁九年罢相后，他居住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

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可见神宗驾崩前,王安石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变法内容还在持续中。

第二节 王安石的文品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纤折而不味薄。

一、文学主张

王安石散文美学思想与唐宋古文运动领导者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紧相承接,强调文以明道,崇尚儒家经典。他在《上邵学士书》中明确提出“文贯乎道”。在《答吴子经书》中也说:“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其文论独特之处则在于所谓“道”具有强烈的反潮流、反“俗儒”的色彩,更加强调“道”的实用性,突出“道”的政教作用,主张发挥散文有补于世的社会作用,崇尚散文的功利目的,这是王安石散文美学观点的核心。

1. 文以补世,实用为要

王安石身处积弊丛生、时势颓危、国运堪忧的时代,政治上积极推行变法,在文学上便继承并发展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的观点。他在《上人书》中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强调诗文要对时世有所补益,应以适用为根本。在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表述过类似的观点:“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答姚辟书》)他的补世、适用的具体内涵,

就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为政治改革服务,而这又与他对文的眼光有关。

王安石所谓“文”仅指政治性应用文、政治哲学论文和有一定文学色彩的论说散文。他在《上人书》中指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尔,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他认为“文”就是礼乐教化,治国政令。书写在竹简上,大体归于礼乐教化,治国政令罢了。

他明确反对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刘筠所倡导的“今时文章”(《答孙长倩书》)。在《张刑部诗序》中更把尖锐的批判矛头指向西昆体恶劣影响:“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一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有纠正西昆体重审美,轻功利偏向的意义,在北宋消除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 文外之文,情志为上

王安石认为在政治性应用文、政治哲学论文之外,还有杂文、随笔、游记一类文学作品。所以晚年他对文及其作用的想法发生变化,强调抒写情志。在《上张太傅书》中说:“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在《答王景山书》中说:“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在《先大夫集序》中也说:“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这是传统的“诗言志”说在散文美学领域中的发展。此处所说的“志”,不仅指心志怀抱、道德情操,而且包括作者的思想感情。

强调散文要言志抒情,必然肯定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发愤”说。他在《书李文公集后》中说:“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在《司马迁》一诗中也说:“成书与后世,愤徘徊自释。”揭示了创作主体、客体之间的矛盾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动力,创作主体的感情在诗文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安石持这种“发愤”说,说

明他承认散文不仅是表达治教政令的工具,而且是作者抒发感情的手段,已认识到情感是散文审美的一大要素。

3. 注重内容,轻视形式

王安石特别强调内容的实用性。他在《上人书》中说:“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将文与辞相区别,文指作文的本意,指内容;辞指文辞,指形式。认为内容要“有补于世”,要适用,而文辞、形式就像器物上“刻镂绘画”,前者是根本,后者只是一种外表修饰。如此论断,自身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把文辞形式比作为器物的“刻镂绘画”是不恰当的。“刻镂绘画”对器物来说,可以有,这样能够增强美观;也可以没有,不过素朴一点而已。而散文形式和内容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形式对内容来说决不像器物上的修饰一样可有可无。其次,由于把文辞形式比为器物的“刻镂绘画”,所以他又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不必巧且华”,把适用的内容和美的文辞形式对立起来,把两者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就和道学家排斥文辞技巧同流合污了。

王安石固然有注重内容而轻视形式的倾向,但事实上他作为散文大家之一,创作实践会告诉他形式美是不可忽视的。他在《答王景山书》中说:“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安知无有道与艺,闭匿不自见于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间接承认为文要“有道与艺”。他赞扬梅尧臣的诗作“经奇伟丽散九州”(《哭梅圣俞》),提到秦观的诗时,说“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回苏子瞻简》)认为诗要“妩丽”,也就是间接承认散文也要有形式美。

4. 提倡简练,瘦硬为文

王安石继承刘勰、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尚简的传统,而大力提倡为文简约。他主张“约而明,肆而深”(《答韩求仁书》),肯定“公所为文,庄严谨洁,类其为人”(《杨乐道文集序》)。王安石的可贵之处在于还强调“精”。所谓“精”,就是精炼、精悍、精警。

在散文美的追求上,王安石崇尚一种奇崛劲健、瘦硬峻峭之美。这种散文美,是王安石一贯提倡并竭力追求的。他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题张司业诗》),肯定张籍的乐府诗平易自然,而实际他心目中最为推崇的还是“奇崛”的审美风貌。他论欧阳修的文章说:“豪健俊伟,怪巧瑰琦”,“雄辞閎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祭欧阳文忠公文》)评曾巩云:“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赠曾子固》)欧阳修、曾巩之文以阴柔之美见长,而他却突出他们散文豪雄的一面,这与其说是在评论别人,不如说是在申明自己的爱好。

二、王安石散文思想品格

1. 论说天下大事,表明政治主张

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散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论说文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揭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此文对即将展开的熙丰变法,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

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如《读柳宗元传》：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此文采取欲扬先抑的手法，先说柳宗元等人因参与中唐“永贞革新”而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然后指出柳宗元等人“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而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则往往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最后指出攻击柳宗元的人是小人，没有资格议论别人。作者立场显然倾向于参与“永贞革新”的志士仁人们。

2. 亭台山水记，表明独到见解

王安石的“记”不同阶段有不同特色。皇祐年间的“记”比较传统，如作于皇祐初年的《扬州新园亭记》，文章首叙建园缘起，次述建园的经过、方位、规模，最后指出撰文本意，以感叹作结。叙述、描写、议论兼具，严守“记”的体制，体现了向传统学习的一面。作于皇祐五年的《芝阁记》，首先叙述了灵芝在真宗、仁宗两朝的不同遭遇，“因一时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格。”“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将灵芝遭遇同士人进退联系在一起，最后以议论感慨作结。全文以叙事为重，议论点缀其后，也属“记”之常体。作于皇祐二年的《信州兴造记》，首段简叙信州因水灾而破城，引出造城的缘由。次段叙述造城的过程，最后就此展开议论。文章叙述、描写、议论依次进行，结构上与《扬州新园亭记》异曲同工。至和元年到嘉祐八年，王安石“记”形成个人风

格。《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度支副使厅壁题记》名为题记，但全文无描写，首段仅介绍几任三司副使的姓名，二、三段都是在论述加强中央财权对巩固宋王朝的意义，作为朝廷主要理财官员的三司副使负有的责任。这两篇“记”奠定了王安石亭台记和山水游记描述简约、长于生发的特点。治平以后是王安石“记”的新变期，治平二年所作的《虔州学记》，虽因议论成分过多而被苏轼讥讽为学校制策，但与其前期所作《慈溪县学记》相比，可以看出作者行文时从容不迫，立论以经典为据，论述不枝不蔓、有条不紊，透露出平婉温醇的色彩。

3. 人物传记，品评天下人物

王安石有墓志多卷，为众多墓主一生做盖棺论定的述评，称扬他们生平品质可贵之处。如《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记述了苏安世为欧阳修洗雪耻辱的义举，“欧阳修以言事切直，为权贵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狱，诬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苏君与中贵人杂治。当是时，权贵人连内外诸怨恶修者，为恶言欲倾修，锐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脱。苏君卒白上曰：‘修无罪，言者诬之耳。’于是权贵人大怒，诬君以不直，绌使为殿中丞、泰州监税。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无恙。苏君以此名闻天下。”苏安世不屈从潮流，不惧怕承担责任，敢于仗义为蒙冤者说话，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赠太师中书令勤威冯公神道碑》中所写冯守信，贵为公侯，“公弟常欲上其子为公子，以取高荫，公对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弃躯以报久矣，顾未有所，奈何欺之？’是岁，并公子无所荫，曰：‘以明吾心，于弟非有爱也。’韦城董方廉直，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无以嫁，公为选士办装，嫁之如己子。”他谢绝亲弟过继儿子给他以博取高荫，绝情地连自己亲生儿子一概不荫；而只因韦城董方廉直，他便在韦方死后把

其二女当作亲生女儿嫁出。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

王安石还勇于为凡夫俗子立传，记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如他的《处士征君墓表》记述了为官淮南所遇三个善士，其一“杜君者，寓于医，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时时穷空，几不能以自存，而未尝有不足之色。盖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旷然无累于物。而予尝与之语，久之而不厌也。”其二“徐君，忠信笃实，遇人至谨。虽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见。寓于筮，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能为诗，亦好属文，有集若干卷。”其三“征君者，讳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乡里，恂恂恭谨，乐振人之穷急，而未尝与人校曲直。好蓄书，能为诗。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为进士。”这三人品质皆有可称道之处。他的《伤仲永》则刻画了一个更为平凡的人家：方家不过世代“隶耕”之家，仲永仅为早慧而后愚之人，但王安石对他们的事津津乐道，并通过仲永的悲剧告诫世人：先天聪明不能决定人的成功与否，后天学习、锻炼才是成才的关键所在。

4. 赠序书序，畅谈文学与人生

王安石赠序有的写临别赠言，《送陈兴之序》写于陈兴之赴任泉州晋江县主簿时，却先从相识说起，作者任淮南判官时初识时任如皋主簿的陈兴之，两年后作者入朝为官、陈兴之“得嘉庆院解”再次相遇；然后写陈兴之这次要到福建的缘故，他参加礼部考试，当今宰相是他长辈，为了避嫌而有意黜落了兴之。最后表示对兴之的同情，“兴之亦诚博学能文辞，有气节，吾意其为进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为所谓主簿者，远其亲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独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贤者，任而进之无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兴之去，知者皆怜其才之可以进焉而不得，无以慰其亲也。吾于兴之又世故，故又为之思所以慰其亲，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说，而独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情意诚恳，感人至深。《送李著作之官高邮序》通过李著作不以官职卑微而懊恼与

当朝达官贵人一遇贬谪便一蹶不振的对比,说明了一个大道理:

君之才,播绅多闻之。初,君视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试于剧,而沦于卑冗,君将优为之,曰:“孔子尝为乘田、委吏矣,会计当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下,又得调高邮关吏,人复惜君不试于剧,而沦于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

於戏!今之公卿大夫,据微乘机,钻隙抵蠹,仅不盈志,则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国家者,有戢景藏采,恬处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谟谋。今岂不若古邪?奚遂君请而弗拔也?

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只能升不能降。一遇降职特别是贬出京师,便以为世界末日来到,从此精神萎靡不振,在贬谪地寻死觅活、佯狂自诬。王安石此文塑造了一个从不因官卑而改变情绪状态的人,人物虽小,意义很大。

王安石的书序,阐发了对相关问题的独到看法。《新秦集序》是作者为杨畋文稿所作序,此序由杨畋人品而及其文品,阐述了“文如其人”和“知人论文”的文学原理。而《〈灵谷诗〉序》论及山川灵气对于诗人的陶冶之功:

吾州之东南有灵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龙蛇之神,虎豹、鸞翟之文章,榱桷、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与夫仙人、释子、恢谲之观,咸付托焉。至其淑灵和清之气,盘礴委积于天地之间。万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属之于人。而处士君实生其阯。

君姓吴氏,家于山阯,豪杰之望,临吾一州者,盖五六世,而后处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学知名于时。惜乎其老矣,不得与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榱桷、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为用

于天下，顾藏其神奇，而与龙蛇杂此土以处也。然君浩然有以自养，遨游于山川之间，啸歌讴吟，以寓其所好，终身乐之不厌；而有诗数百篇，传诵于闾里。他日，出其《灵谷》三十二篇，以属其甥曰：“为我读而序之。”

惟君之所得，盖有伏而不见者，岂特尽于此诗而已？虽然，观其镌刻万物，而接之以藻绩，非夫诗人之巧者，亦孰能至于此？

王安石舅父终生隐居灵谷，所作灵谷诗巧于用优美的语言刻画景物，自然是受灵谷自然景色陶冶所致。

三、王安石散文艺术品格

1. 论说文雄健精悍，振聋发聩

王安石所作，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如《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一文围绕“开河”一事，首先从当地的地理环境、水利情况以及历史事实等方面，论述开河之必要；然后以当地农业丰收、人心一致等物质和人为因素，论证开河的可能性；最后从职守上，强调开河是官吏应负的责任。全文结构严谨，论证翔实，极具说服力。

王安石的史论短文写得脍炙人口，评价人物，见识深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鲧说》论伯乐遇千里马之难，《读孟尝君传》论述得士在质而不在量，都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而《书〈洪范传〉后》对比古今学习态度：“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并阐明孔子启发式教学的道理，“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其道，鹜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这

些见解的确入木三分。

2. 记叙文要言不烦,不事枝叶

王安石善于运用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叙事,虽无绚丽的词藻,却“词简而精,义深而明。”如《扬州新园亭记》中对亭堂的描写:“堂南北向,袤八筵,广六筵,直北为射埒,列树八百本,以翼其旁。……作亭曰‘隶武’,南北向,袤四筵,广如之,埒如堂,列树以向。”这段描述简洁明了,文字简炼,决无浮言赘语。“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游褒禅山记》记游文字明显少于游后感文字,描写句子仅“其下平旷,有泉侧出”、“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和“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寥寥几笔,描述之简到了再简则无法引出游后感的程度。

3. 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瘦硬少文

王安石集中短文居多,除了众所周知的《读孟尝君传》外,游记短者如《万宗泉记》全文刚过百字,杂文短者如《题张忠定书》全文不足百字。即使篇幅较长的散文也多用短句,语句干净利索,章无剩句,句无剩字,毫无拖泥带水之痕。常常骈散结合,掷地有声。如《答司马谏议书》中:“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

前知其如此也。”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

第三节 王安石的诗品

王安石写诗与作文一样，也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较为丰富，所以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

一、王安石诗歌思想品格

1. 写实诗直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

前期的诗歌，大多作于任地方官时，涉及当时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鸣不平。《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描写了宋代国势的积弱、内政的腐败，揭露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发廩》等批判贪官污吏，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

其中《感事》一诗有杜甫之风。“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赍。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铁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费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竭来佐荒郡，慄慄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此诗如实地反映了北宋农夫的穷困潦倒，并且明确指出农夫的穷困潦倒是官吏盘剥勒索所致，干预生活的精神可嘉。《歌元丰》组诗共五首，讴歌

变法给百姓带来的生机。如其一“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写水利工程之兴，增加了农夫菜果收入；其五“豚栅鸡埘晡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写农夫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当然，这组诗对变法期间农民得到好处夸大其词，反映的可能只是变法发起者的良好愿望而已。

2. 咏史诗表明作者的社会人生见解

王安石咏史诗，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如《商鞅》，“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强调了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器的重要；《孟子》，“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态度；《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前人咏贾谊，多着眼于其才高位下的悲剧命运，王诗却独排众议，认为贾谊的政治主张多被汉廷采纳，其作为政治家的命运远胜于那些徒得高官厚禄者。借咏史以明志，字里行间隐约可见王安石本的人政治见识。《明妃曲》更是传诵一时的名作：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唐人咏王昭君多骂毛延寿，多写昭君顾恋君恩，而此诗却说昭君之美貌本非画像所能传达，王昭君流落异域的命运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为不幸，都体现了在唐诗之外求新求变的精神。而结尾指出王昭君的悲剧乃是古今宫嫔的共同命运，议论之精警突过前人，



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征。

王安石咏史总是透露自己有心学习古人、成就一番功业的抱负，如他的《诸葛武侯》：“汉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黄。群盗伺昏黑，联翩各飞扬。武侯当此时，龙卧独摧藏。掉头梁甫吟，羞与众争光。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竖子祖余策，犹能走强梁。”对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表示了由衷的钦佩。表明他愿意遇到明主而有所作为的志向。

3. 闲适诗偏重于抒发个人情志

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以后，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虽然这时王诗中仍有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情形，如《北陂杏花》中“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两句，无疑寓有对自己高尚情操的孤芳自赏之意。但如果与早期所作《与舍弟华藏院此君亭咏竹》中的咏竹名句“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相比，则诗风显然已从直截刻露变为深婉不迫了。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如《雪干》和《书湖阴先生壁》：

雪干云净见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东风吹柳万黄金。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

这些诗描写细致，修辞巧妙，韵味深永。如果说王安石早期的诗风显示了直露的宋诗特征，那么其晚期诗则以丰神远韵的风格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所以王诗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其艺术成就也足以列于宋诗大家的行列。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

坛上享有盛誉。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石林诗话》卷上）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

4. 咏物诗借物寓意，物如其人

咏物诗是王安石诗歌中重要的一类，集中地体现了王安石诗歌内涵和风格的演变。叶梦得《石林诗话》云：“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视初壮，虽此公，方其未至时，亦不能力强而至遽至也。”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述孙仲益信亦谓：“荆公《竹》诗‘人言竹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材’，《送李璋卜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然非佳句。公诗至知制造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绝矣。其后《再送李璋下第》、《和吴冲卿雪诗》，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叶、周评论王诗创作时所引用的诗歌，有大半属于咏物诗。王诗中所咏的题材相当广泛，既包括风、云、雪、月、梅、菊、松、柏、杏、龙、鸡、雁、驴、鱼等自然生物，又不乏棋、玉、农具、纸、砚等人文事物。

其咏物精品寄寓良深，常常托物咏志，抒发自己高远的抱负和积极用世之志。如《龙泉寺石井》其二：“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乾。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以龙自喻，虽然直抒胸臆，略显粗率，但慷慨激昂，大有揽辔澄清，舍我其谁之慨。又如《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已，得地本虚心。岁老根

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斲五弦琴。

诗中以桐树的美好品质，来比况自己的才干和德行；又借桐树可以制琴，比况自己也有献身济世、解民倒悬之志。

二、王安石诗歌艺术品格

1. 含蓄雅丽，脱去流俗

王安石诗常有谢灵运及中晚唐诗那种清丽的风致，黄庭坚谓之“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苕溪渔隐丛话》引），是非常中肯的。像《岁晚》：“月映林塘澹，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药，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诗中的景物显得清幽雅洁，呈现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美，而诗人的心也流连于此。读这样诗，我们会想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但王安石没有他那样的贵族式的孤傲；想到大历十才子或贾岛一派的写景诗，但王安石没有他们那种寒苦。

实际上，王安石这一类诗是带有某种孤独和清高意味的，只是他对此不愿强化，保持着心态的平衡，艺术表现相当含蓄。杜甫晚年的诗，常把自我的形象孤零零地置于肃杀的秋色中，表现心境的悲凉，王安石《寄蔡天启》“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与之有些相像，包括声律的顿挫也有些相似。但王安石作了些淡化的处理，譬如诗中用“谁”来代替自己，避免以广阔的背景造成情绪的扩张，同时也回避情绪的具体内涵，因而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既萧索又苍凉、不可实指的怅惘情怀。造成这种诗境原因很多。一方面，王安石个性倔强，一生历经风波，在受到挫折时，内心的不平总是要流露出来；但另一方面，不仅他的人生体验很复杂，不易说清楚，而且在宋代重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作为有过重要政治地位的大人物，诗中个人情感表现得过于强烈，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的夸张，所以他还是用了比较抑制的、

含蓄蕴藉的方式来表现。另外像《南浦》：“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也是一种不知因何而起的惘然若失的情怀。但不管怎么说，在宋代诗人中，王安石的诗歌情感，已经是比较浓厚而不偏向于平淡的了。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意境，诗人的内心隐痛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2. 字锻句炼，语言精美

王安石的诗对语言的锤炼十分讲究，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词汇和意象。传说《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其实，把形容词“绿”用为动词的写法，不但李白早已有“东风已绿瀛洲草”之句，其他人也反复使用过，但王安石这句最为亲切自然而形象鲜明，能表现出江南风光的喜人之处，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又如《暮春》诗中“雨花红半堕，烟树碧相依”，是受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一联的启发，但并不觉得是套用前人的。还有《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确实用得很巧，不显得吃力。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经常凭藉广博的书本知识方便地化用前人语汇，但他并不总是在搬弄学问，他也常常通过细腻的观察，捕捉生动的意象，以平易的语言表现自己内心的情绪、感受。像“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后二句对得很工整，读起来却很自然，“细数”、“缓寻”既烘托了萧散旷逸、从容不迫的神态，又暗涵了一种百般无聊的闲愁。一般来说，王安石不把经过仔细揣摩、推敲的个别典故、语词用得很显眼，而是把这种精巧的语言同全诗意脉的自然流动融合成一体，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看上去“见舒闲容与之态”，但“字字细考之，若经矚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第四节 王安石散文名作精鉴

一、论说文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①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設，必当其务。故能驾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②。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恻^③，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④，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

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⑤；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惠，始终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⑥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⑦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惠，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

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文钞》，第 21~22 页)

注释：

① 札子，官府上奏文书。《北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又，上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

② 逸德：失德，过错。

③ 诚恣：诚实，忠厚。

④ 仁宗在位期间，曾先后承诺岁赐西夏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增加对辽国见纳银绢。

⑤ 发：被发现，暴露。

⑥ 厕：参加，混杂。

⑦ 隆杀：升降。

分析：

1. 本文价值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四月，是王安石主持“熙丰变法”的纲领。全文三段，首段说明文章写作缘由，末段陈述作者愿望，中间段是主体段，先分析北宋前期百年无事的原因，然后指出百年无事表面现象掩盖着的懦弱无为的本质，剖析政治机制，选用官吏，军队现状，经济财政等方面弊端，实际上是在明确变法的任务和对象。上此书一年后全面推开的变法的几项内容，都在本札子中有伏笔。

2. 对变法的认识

王安石变法对北宋那样积贫积弱的局面是非常必要的，变法八项内容无非是增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振作人气人心，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由于北宋守旧意识根深蒂固，更由于王安石有济世之心，而无济世之法，操之过急，不得其要领，所以变法以失败告终。由于变法的失败，北宋错过了振兴图强的

良机，后来又陷入无休止的新旧党争、倾压，政治机体更加腐败，因而到了徽、钦二帝，整个王朝便被金国灭亡了。

但历史上盛行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意见，如“宋朝百年无事，如人元气尚完，然未免稍弱，介甫汲汲以理财为急，如庸医妄投丹药，而元气为之剥丧矣。”（张伯行语）如果说得有些道理，那主要是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对反对派大打出手，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党争，使北宋后期进入党争泥潭而无法自拔。

伯夷^①论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②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③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④。韩子因之，亦为之颂^⑤，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⑥。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⑦岂独太公哉！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文钞》，第149页）

注释：

① 伯夷，殷商末年孤竹君的长子，孤竹君遗命立其弟叔齐继位，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逃避，叔齐亦不继位而逃。司马迁认为武王伐纣，兄弟二人叩马而谏；武王灭商，二人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本文对司马迁所传伯夷之事持否定态度，表达了政治改革家勇于事功，不屑迂腐的进取精神。

② 分别见于《论语》的《公冶长》、《述而》、《季氏》和《微子》篇。

③ 分别见于《孟子》的《公孙丑上》、《离娄上》、《万章下》、《告子下》、《尽心下》。

④ 《史记·伯夷列传》载《采薇之歌》为：“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⑤ 韩愈《伯夷颂》称其“特立独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⑥ 事见《孟子·离娄上》。

⑦ 烈，功业。

分析：

1. 伯夷、叔齐文化在中国的影响

孔子在天下分崩离析的春秋末年，愤慨于周天子有名无实，大夫、陪臣执国政的现实，拉起伯夷、叔齐的旗号，树立忠君不二的典范，目的是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旧有的统治秩序。孟子对伯夷的论述，也与自己“暴君人人得以诛之”的新思想相矛盾；司马迁在《史记》里，又使伯夷反对武王伐纣的传说信史化；经过司马迁韩愈等人的鼓吹和宋代理学家发挥，伯夷、

叔齐之事成了三纲五常的有力论据,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死谓之不忠”实际上是中国最腐朽的文化,导致宋明如此多的昏君祸害国家而无如之何。因而王安石此文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2. 本文立论关键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引论,提出中心论点:伯夷、叔齐之事是“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也即以假为真、别有企图的事。中间两段是本论,论述伯夷、叔齐成为史实的过程,指出伯夷、叔齐之事的假。作者根据《孟子》的记载,伯夷和太公因为向往西伯昌治下的开明而投周,按逻辑合理推论,指出武王伐纣时,伯夷或者已死,或者没死而不反对伐纣。因而论定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是莫须有之事。第四段是结论,指出假如武王伐纣时,伯夷健在,他必然支持武王义举,那他的功劳不会低于太公。进一步强化了中心论点。

3. 本文理论创新精神

伯夷、叔齐之事经孔孟、司马迁和韩愈等人的鼓吹,到宋代时已成人人不疑的信史。王安石若无开拓创新精神,绝不至于拿定论千年的事实发难,并且阐明了全新意义的伯夷精神。本文结论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否定伯夷“叩马而谏”,否定了“君为臣纲”,指出暴君就应推翻,理论上承接了先秦时期“民贵君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

二、记叙文

桂州新城记^①

侬智高^②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无一人能守其州者,岂其材皆不足欤?盖夫城郭之不设,甲兵之不戒,虽有智勇,犹不能以胜一日之变也。唯天子亦以为任其罪者非独守吏,故特推恩褒广^③死节,而一切贷其失职。于是遂推选士大夫所论以为能者,付之经略,而今尚书工部郎中余公靖当广西焉。

寇平之明年,蛮越接和,乃大城^④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

以枚数之，至四百万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数之，至二十余万。凡所以守之具，无一求而有不给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为役亦大矣。盖公之信于民也久，而费之欲以卫其材，劳之欲以休其力，以故为是有大费与大劳，而人莫或以为勤^⑤也。

古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失，则夷狄横而窥中国。方是时，中国非无城郭也，卒于陵夷、毁顿、陷灭而不救。然则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为存也。及至喟然觉寤，兴起旧政，则城郭之修也，又尝不敢以为后^⑥。盖有其患而图之无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无其法，能以久存而无败者，皆未之闻也。故文王之兴也，有四夷之难，则城于朔方，而以南仲^⑦；宣王之起也，有诸侯之患，则城于东方，而以仲山甫^⑧。此二臣之德，协于其君，于为国之本末与其所先后，可谓知之矣。虑之以悄悄之劳，而发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续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国以全安者，盖其君臣如此，而守卫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当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补弊立废之时，镇抚一方，修扞其民，其勤于今，与周之有南仲、仲山甫盖等矣，是宜有纪也。故其将吏相与谋而来取文，将刻之城隅，而以告后之人焉。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文钞》，第127～128页）

注释：

① 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本文记述余靖在广西路安抚使、知桂州任上，重筑桂州城的政绩。

② 依智高，北宋广源州人，庆历初据犹州反，高潮时占据邕州、横州、桂州、龚州、浔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端州、昭州、宾州等十二州。

③ 推恩褒广：广泛嘉奖，推广封赏。

④ 大规模修筑桂州新城。

⑤ 勤,辛苦。

⑥ 此句意为,在重修旧政的同时,也不敢忽视修城。

⑦ 事见《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⑧ 事见《诗·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中山甫,城彼东方”。

分析:

1. 现实意义

王安石此文,含蓄地告诉读者,北宋王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失”,导致了依智高之乱;平乱之后,首先要修旧政,即改善民族关系。其次才是修筑毁于战火的城池。间接地肯定朝政有道对于国家安危的重大意义。另外,本文精华在于“盖有其患而图之无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无其法,能以久存而无败者,皆未之闻也”的论述,作者认为要想在捍卫统一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图之之心、战守之具、战守之人和驭人之法四者皆宜。作者强调防御工事和保持警觉同等重要,勇敢善战和武器装备必须兼备。这些都是有借鉴价值的。

2. 王记特点

王安石作“记”,结构上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记”,即描述所记对象,如本文的一、二两段;二是“议”,即所记对象意义的阐发,如本文后两段,从描述对象提炼、抽象一般原理,供人借鉴。王记的两部分,通常是记少议多,表现在文章风格上,就是长于议论。

余姚县海塘^①记

自云柯^②而南,至于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县事谢君为之也。始堤之成,谢君以书属予记其成之始,曰:“使来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③。”谢君者,阳夏人也,字师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学称天下,而连世为贵人,至君遂以文学世^④其家。其为县,不以材自负而忽其民之急。方作堤

时，岁丁亥十一月也，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灾，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劝趋之，而忘其役之劳，遂不逾时，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见于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犹自以为未也，又思有以告后之人，令嗣续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长虑却顾^⑤图民之灾，如此其至，其不可以无传。而后之君子考其传，得其所以为，其亦不可以无思。

而异时予尝以事至余姚，而君过予，与予从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閤大隐密，圣人之所以独鼓万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盖有所难知也。其治政教令施为之详，凡与人共，而尤丁宁以急者，其易知较然者也。通途川，治田桑，为之堤防沟洫^⑥渠川以御水旱之灾，而兴学校，属其民人相与习礼乐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宁以急，而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为，而其所谓能者，务出奇为声威，以惊世震俗，至或尽其力以事刀笔簿书之间而已，而反以谓古所为尤丁宁以急者，吾不暇以为，吾曾为之，而曾不足以为之。万有一人为之，且不足以名于世而见谓材。嘻！其可叹也。夫为天下国家且百年，而胜残去杀^⑦之效，则犹未也，其不出于此乎？”予良以其言为然。既而闻君之为其县，至则为桥于江，治学^⑧者以教养县人之子弟，既而又有堤之役，于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为之书其堤事，因并书其言终始而存之以告后之人。庆历八年七月日记。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文钞》，第130～131页）

注释：

- ① 余姚，今浙东余姚市。海塘，海边堤岸，防海潮侵袭农田。
- ② 云柯，当为余姚一带地名。
- ③ 卒任：终于任期。隳：毁坏。
- ④ 世：继承，光大。谢景初博学能文，为黄庭坚岳丈。

⑤ 却顾：反复考虑。

⑥ 浚：音快，田间水渠。

⑦ 胜残去杀，语见《论语·子路》，意为化残暴为仁善，最后废除死刑。

⑧ 治学：办学，兴学。

分析：

1. 本文与王安石变法

此文写于庆历八年，当时王安石正在鄞县为知县。《宋史》本传载：“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与本文主人公谢景初在余姚县所为如出一辙，作者与主人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且余姚与鄞县皆在浙东，二县相邻。本文所写主人公大兴水利交通，大开学校育人之门的实践，与作者本人在鄞县的实践一起成为王安石日后变法的参照。

2. 本文线索

本文线索有两条，一是大兴水利，二是大兴学校。谢景初有理论也有实践，理论上他认为“通途川，治田桑，为之堤防沟浚渠川以御水旱之灾，而兴学校，属其民人相与习礼乐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宁以急，而较然易知者也。”实践上他在余姚任上的政绩，也都集中在水利和学校两方面。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使全文脉络清晰，同时也表现了谢景初的言行一致。

3. 本文精华

本文精华在于作者所宣扬的“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传统美德。作者抨击了那些“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为，而其所谓能者，务出奇为声威，以惊世震俗，至或尽其力以事刀笔簿书之间而已”当官为己不为民的丑恶现象，一是光打雷不下雨，只要名声不要实效；二是报喜不报忧，用公文欺上瞒下。作者大力提倡谢景初“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灾，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劝勉之，而忘其役之劳，遂不逾时，以有成功”的实干惠民精神。这两方面都是广有现实意义的。

第五章 苏 洵

苏洵年岁小于欧阳修，而与王安石、曾巩相当。他虽然在仕途上无大作为，但散文长于政论、史论，诗歌也有可称之作。

第一节 苏洵的人品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少年时喜好交游，27岁方在夫人程氏勉励下发愤读书。《宋史·苏洵传》说他“年二十七始发奋读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着儿子轼、辙赴京应礼部试，将其所作《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呈献给翰林院，深得翰林学士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称赏，欧阳修在其上书朝廷的《荐布衣苏洵状》中高度评价苏洵的文章：“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閎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仁宗皇帝破格任命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宋代开国以来的第一部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入《宋史·文苑传》，有《嘉祐集》传世。

《宋史》本传载：“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

竞效苏氏为文章。”嘉佑二年苏洵与子苏轼、苏辙同中进士，又都名列前茅，一时之间父子三人各动京师，文章盛传于世。从此，苏门古文成为封建时代举子文章的楷模。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录了当时的俗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氏文章在宋代的巨大影响。

关于苏洵的生平，有欧阳修所撰《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详细介绍了苏洵的身世和成年后发奋读书、果于应试，描述了苏氏父子以文名轰动京城的情状，述评了苏洵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程氏相夫教子的事迹和苏洵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宋史》本传赖以写成的主要参考资料。除此之外，曾巩的《苏明允哀辞》所记也较详细：

明允姓苏氏，讳洵，眉州眉山人也。始举进士，又举茂材异等，皆不中。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

嘉祐初，始与其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既而明允召试舍人院，不至，特用为秘书省校书郎。顷之，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以贤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见于当时，而其名益重

于天下。

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礼书，未报。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

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者一百卷，更定《谥法》三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明允为人，聪明辨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躐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

此文也是《宋史》本传的重要根据之一，准确介绍了苏洵奋斗的艰辛历程，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才能和并不平凡的一生。

第二节 苏洵的文品诗品

一、苏洵散文思想品格

1. 政论文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其散文创作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而“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仁宗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苏洵的政论文开出了振作良方。一是“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他在《审势论》一文中指出北宋“政弱”导致“势弱”，目前是扭转颓势的良机，“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

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然后举战国时的齐国为例，“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说明弱政易强，即“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不为强敌积威所劫，变绢银养患为不赂而胜之。苏洵的《六国论》以历史上六国靠割让土地苟且偷安而不免于亡为教训，指出北宋每年输辽与西夏巨额绢银之非，“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字字句句，仿佛都在说北宋君臣。苏洵此文的写作目的，就是为北宋寻找一条战胜四邻的道路，同时也描绘发奋图强与否的两种结局，“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从而激励宋人弃弱图强，振兴国势。

三是任骁勇之将而驭之有方。北宋鉴于五代武夫专横、篡弑不断的教训，转而任用文人为帅，导致武力柔弱，受制于外侮。苏洵针对这种情况，在《御将》一文中以人类驯养动物喻证用将之道，“六畜，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蹄，牛亦能触。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杀之；杀之不能，驱之而后已。蹄者可驭以羁绁，触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废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天下无

骐驎，终无以服乘邪。”人类不因牛马能伤人而杀之，却因其能跑多力而用之，因而帝王绝对不能因为武夫性情刚烈而不让他们领兵打仗，“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贤将，就是既智勇双全又忠诚不二的人；才将，就是能打胜仗但不够忠诚的人。苏洵认为得贤将而用之固然好，如不得贤将而用才将，也比用败将好。这真是医治北宋顽症的良药。

四是变弱外强内为实边虚中。北宋为了避免边将造反，选取天下精锐为禁军，驻都城汴梁；而边防驻军多老弱，这是北宋对外作战败多胜少的又一原因。针对这一情况，苏洵在《重远》一文中提出“天下之势，远近如一”的论断。他认为，对于北宋而言，首先应该重视北部边防，“河朔、陕右，二寇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其次是“广南、川峡，货财之源，而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二者的关系是，靠河朔、陕右庇护中原，靠广南、川峡为河朔、陕右提供财力支持。他不仅认为不能守中虚外，而且认为不能只重北部边防，而忽视南部后方基地建设，“曩者北胡骄恣，西寇悖叛，河朔、陕右尤所加恤，……呜呼！知河朔、陕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轻，是欲富其仓而芜其田，仓不可得而富也。”这种分析不仅符合经济重心南移的现实，而且北南并重战略的正确性也为靖康之变前后的历史教训所验证。尤为可贵的是，苏洵鉴于“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地者，吏不肖也”的教训，还提出了加强南部后方基地建设的途径，改善吏治，造福百姓，收取人心，加强城池。

2. 军事论文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审敌》中,他揭露北宋每年输辽夏绢银的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认为,作战要想取胜,必须满足几个条件。一是正义在我,哀兵必胜。“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心术》)二是持续作战,心力不衰,“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心术》)三是要利用敌将的弱点,“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法制》)四是研究克敌制胜的战术,包括分兵与合军,强弱配置与示敌,奇正的配合与变化,用间与反间的技巧等,苏洵每论都有独到见解。如《攻守》论攻守三道,“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故

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是也。”颇有理论概括性和实际应用性，道人人意中或有、人人笔下皆无之理，新人耳目。

3. 史学论文

苏洵好论史，《嘉祐集》中有历史人物和事件评论多篇，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真知灼见。一是举荐贤才功莫大焉。如《管仲论》论述管仲功过，针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的历史事实，指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管仲死时没有安排好继任人选，导致齐国大乱、霸权全失。据此，告诉读者齐国称霸，只能归功于鲍叔，因为他举荐了管仲；而齐国大乱却要管仲负责，因为他没有安排好身后的事。观点振聋发聩，论证丝丝入理。

二是帝王政治素质决定胜败兴亡。苏洵论楚汉相争文有多篇，而论其胜败原因主要从项羽、刘邦身上着眼。如《项籍》首先提出开国之君必须具备三方面素质，“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取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虑，取天下之量，三者缺一不可。取天下之才，在明取舍之机；取天下之虑，在高瞻远瞩；取天下之量，在能忍人所不能忍。接着分析项羽“虑”和“量”的欠缺和失误，“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

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而《高帝》一文论刘邦取胜之必然，治国之必安，在于“明于大而暗于小”，同样入木三分：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

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氏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请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

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菫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

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给，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如此见解，虽北宋贤相如赵普、哲人如二程、名士如陈抟所不能道；表现了作者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今天看来也惊心动魄。

三是阐明为臣之要。如《子贡》论大臣“智”与“信”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见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则举而弃乎信。吾则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继也。”然后通过分析历史事件说明缺一不可，“子贡之以乱齐、灭吴、存鲁也，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于此，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吾闻之：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在齐将伐鲁的情况下为鲁国谋，至齐国说权臣田完伐鲁不如伐吴，伐吴利于取代齐王，但是田完担心伐鲁之事举国皆知，不好收回成命；子贡于是又赴吴国，说服吴王先行伐齐，使田完水到渠成与吴开战，而保存了鲁国。苏洵认为像子贡这样一味用“智”、毫无信义可讲的政治行为，是一锤子买卖；万一被双方识破则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苏洵以信义为基础的政治智慧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4. 奏章与书信

《上仁宗皇帝书》向皇帝直陈十事，第一件是实施利益驱动战略，“执其大利之权，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第二件是改革任子之弊，“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将复任其孙，孙又任其子；是不学而得者，常无穷也。夫得之也易，则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第三件是完善官吏考课制度，“盖天下之官，皆有所属之长；有功有罪，其长皆得以举刺。如必人人而课之于朝廷，则其长为将安用。惟其大吏无所属，而莫为之长也，则课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课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齐；其数少，故可以尽其能否而不谬。”第四件是减弱大吏对县令的控制权，“奈何使州县之吏，趋走于太守之庭，不啻若仆妾，唯唯不给？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于曲随谄事，助以为虐。其能中立而不挠者，固已难矣！”第五件是恢复武举，选育将帅，“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第六件是推心置腹，善待贡士。他批评“今两制知举，不免用封弥誊录，既奏而下御史，亲往莅之，凜凜如鞫大狱，使不知谁人之辞，又何其甚也”等待人不信的做法，提议“臣愚以为如此之类，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负；若其犹有所欺也，则亦天下之不才无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诛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闻朝廷之风；亦必有倜傥非常之才，为陛下用也。”第七件事是公卿要员不可让进士一蹴而就，也不可任期过长，“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为两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举而归之，如有所负。如此则虽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

意恣行者，人亦望风畏之，不敢按。”第八件事是示敌国以深不可测，“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发，使吾常有所恃而无所怯耳。”第九件事是精兵简政，薄赋轻刑，“糜散帑廩，以赏无用冗杂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第十件事是尊重大臣，疏远宦官。刀锯之余必无忠良；纵有区区之小节，不过闾閻扫洒之勤，无益于事。惟能务绝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谟易以入，则天下无事矣。”此文实际上是一位正直臣子为皇帝设计的兴国大计。

苏洵有不少请求达官贵人提携的干谒书信，和文官谈文，与武官谈武，不厌其烦地向达官贵人们介绍自己的身世、学业、抱负、志向，希望对方能提拔重用自己。如对韩琦，在《上韩枢密书》谈自己的军事特长，“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后来韩琦位至丞相，苏洵又投《上韩丞相书》，谈自己急于做官的心情，“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应格者，虽屠沽不得不与。何者？虽欲爱惜而无由也。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覆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真是委婉曲折，直如乞求，可见寒士做官之难。尤其是《上欧阳内翰书》前后写了五封，在第一封书信中，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学见解，评论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散文大家的创作特色，“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纤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这些话虽然出现在干谒文字中，但至为公允。

有些书信与官员们平等讨论政事、文学。这些书信，没有摇尾

乞怜的干谒背景,写得更潇洒自如些。如《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写于仁宗驾崩、韩琦为山陵使主国丧时,主题是谏勿厚葬,“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在位四十余年,而宫室游观无所增加,帑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称颂,以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这里语言一出秉公之心,更能体现苏洵散文真面目。

《与梅圣俞书》流露了他耻于应试干谒的心情,“自离京师,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见遗,以其不肖之文犹有可者,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昨适有病,遂以此辞。然恐无以答朝廷之恩,因为《上皇帝书》一通以进,盖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字里行间,表达当时中下层文人奔走仕途的无奈与辛酸,可见苏洵年轻时在京城的干谒生活是多么地违心和痛苦!

5. 文学散文

文学散文就是脱离了功名和公务、自然状态下的散文创作。苏洵的文学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送石昌言使北引》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不辱使命,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文学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学识性强,如《名二子说》讲说苏轼、苏辙起名的由来,“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

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辙乎，吾知免矣。”他为苏轼起名曰“轼”，是希望他惠中秀外；为苏辙起名为“辙”，是希望他善处祸福。非学富五车者不知此。二是流露毫无做作的真情，如《祭亡妻程氏文》：

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浪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呜呼死矣，不可再得！

苏洵的成功一半应归功于程氏这个贤内助，《宋史·苏轼传》中说：“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苏洵一心交友与取功名，程氏承担起主持家务和教育幼子的重任。据此文知程氏对于苏家还有规劝苏洵发奋苦读之功，所以苏洵面对早逝的妻子，怎能不肝肠寸断呢？三是可读性强，富有情趣。如《老翁井铭》叙述苏家墓地的灵秀之处，“丁酉岁，余卜葬亡妻，得武阳安镇之山。山上所从来甚高大壮伟，其末分而为两股，回转环抱，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而北附右股之下蓄为大井，可以日饮百余家。卜者曰吉，是在葬书为神之居。盖水之行常与山俱，山止而泉冽，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皆蓄于此而不去，是以可葬无害。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因为作亭于其上，又甃石以御水潦之暴，而往往优游其间，酌泉而饮之，以庶几得见所谓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闵其老于荒榛岩石之间，千岁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后得传于无穷。”秀丽的山水，美丽的传说，让人生留连不去之心。

二、苏洵散文艺术品格

苏洵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创作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各种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这些理论应用到自己的散文创作,造就了鲜明的特色。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苏文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纤徐婉转见长。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

一是有战国策士之风。苏洵学杂纵横,取法纵横文,其文章自然具有纵横之风。读苏洵之文,无不惊叹其纵横驰骤,气势磅礴,恣肆酣畅,雄辩滔滔,活现战国策士风神。张方平夸其文“如大川之滔滔”,肯定了苏洵文章的这一突出特点。《六国论》为历代称颂之佳作。文章深刻揭示六国之亡的历史教训,开门见山地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切中时弊,鞭辟入里;文雄词隽,慷慨淋漓。深得战国纵横辞说之精神。难怪茅坤在《唐宋八大家古文钞》中评说道:“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横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又如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送轼、辙二子赴京应试,途经长安时作《上王长安书》,开头一段这样写道:

天下无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贵,士甚贱。从士而逆数之,至于天子,其积也甚厚,其为变也甚难。是故天子之尊至于不可指,而

士之卑至于可杀。

王长安即王拱辰，时官左丞，出判长安府。苏洵父子由成都经阆中，从褒斜谷出川，取道长安出关中。此书有如一篇赴京宣言，以居安思危之心，操“士贵王贱”之心，论当今“世衰道丧”之病。认为“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而喻天子之“势”为“瓦缶”，士之“权”为“千金之璧”。这与《战国策·齐策四》所载策士颜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观点和辞气一脉相承。作者分明以“贤士”自居，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放言无惮，气盛文伟。所以朱熹称“老苏文亦雄健”，“有战国文气象”。

二是既庄重谨严，又曲折多变。苏洵散文在结构安排上，往往是围绕一个中心先叙事，后议论，再抒情。这种结构方式，脉络分明，层次清楚，使人一目了然。如《张益州画像记》，记的是益州太守张方平因政绩卓著，百姓为其画像之事。四川当时处于比“未乱”和“既乱”更难处理的“将乱”状态，而张方平采取“约之以礼，驱之以法”的措施使蜀境大安。苏洵在文中并不罗列张方平的政绩，而是借自己与百姓的对话，就弹乱、治蜀和留像三层充分发表议论，从更深层次表明张方平“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的内心，最后用诗的形式颂扬张方平的政绩，对在叙事和议论中不便插入的张方平的政绩作了形象的反映。《谢相府启》则先以“朝廷之士”与“山林之士”作对比，一方面“朝廷之士进而不知休”，另一方面“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从而表明自己的态度：虽有意仕宦，却又不愿屈而就之。况且年岁已老，已无太多需求，“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将复何为。”接着叙述自己声名闻于朝野，但朝廷仍未信其可用。最后借孔子、孟子往事来表达自己的“不为矫”“不为卑”之心，意思层层深入，反复叙说自己的心志，看似言多词杂，各为片段，实则首尾呼应，浑然一体。《木假山记》则先假设树木的种种不幸遭遇，再描述家中所蓄的木假山三峰，借物发慨。第一段叙

述,第二段有感,第三段有敬,末尾再次就可感可敬二层发出唱叹,强调突出主题。文章虽短,但结构谨严,一气呵成。

与周密谨严的结构特点相适应,苏洵散文在行文上又力求婉转,曲折多变。《送石昌言为北使引》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从与石昌言自小相交写起,先是“甚狎”,一折。后苏洵读书未成而废,而石昌言“甚恨”,又一折。及十年后,苏洵“摧折复学”,石昌言又“甚喜”,再一折。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去描述自己与石昌言的深厚交情,而是通过石昌言的三次态度变化来表现他对自己的殷切希望。这三个转折使得文章波澜起伏,曲折多姿,寄寓了无穷的感慨。文章第二部分才转入正题,写送石昌言出使北国,先发之以感慨:“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再转写以前出使的人害怕北虏虚张声势,“吾知其无能为也”。最后希望石昌言要敢于“折冲口舌之间”,不辱使命。《木假山记》比《送石昌言使北引》更短,仅三百余字,却写得峰回路转,感慨良深。文章题目写的是木假山,一开始却不从正面入手,而先说木在生长过程中“或蘖而殇,或拱而夭”等种种不幸遭遇,层层推进,从侧面写木假山的来之不易。然后转入思考木假山之所以能“存乎其间”,“其理似不偶然也”,与上文一气贯注。最后再描绘木假山的状貌,写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二峰“庄栗刻峭,凜乎不可犯”,虽着墨不多,但神态尽出。作为一篇借物抒慨的文章,行文既处处体物,曲折有致,又层层有感,言近旨远。作者对木假山由爱到感至敬的情感实则也是苏洵人格追求的体现。木假山的遭遇正寄寓了苏洵的一生坎坷。又如《彭州圆觉禅院记》,第一层以因乐而居与不乐不居作对比,指出“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之人其心不能役其形,是自欺之人。第二层从反面历述唐以来僧徒们多自叛其师的行为“是不可一日立于天下”。第三层再正面立论,嘉许僧宝聪“不以叛其师悦乎”。全文以论始,以记结,层层深入,条理分明,细读方知其用心良苦。

三、苏洵诗歌品评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也就是说其诗寓意深刻，意味隽永。其《欧阳永叔白兔》属于状物诗，“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织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飏动槁叶，群鼠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曷曷。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通过白兔被捉、驯养和思念原野、向望入月的情节，寄托了诗人到京城谋求仕途出路的复杂心情，含义是隽永的。

《忆山送人》是一首长诗，此诗主体部分写诗人早年行走天下，包括进京谋官和送子入京应试路途所经名山大川，先写登四川境内的岷山和峨嵋山，继写出三峡游荆襄所见奇景，接着写游中岳嵩山和西岳华山，再写庐山和去庐山感受。最后写在蜀地为官的颖川人吴君要东返故土，诗人送别他。

苏洵的《颜书》悼念唐代忠烈颜真卿，高度评价他的书法。盛中唐之交名臣颜真卿死后，被封“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他不仅是一流书法家，而且是一位反对分裂、保卫国家统一的英烈，为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羗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果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鲵。

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大抵天下心，人人

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予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歧。

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带羈，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

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后斤斧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全诗四个诗节。第一个诗节写得到颜真卿书法绝不推辞的因由，第二个诗节写对颜公的钦慕，第三个诗节写对颜体字的鉴赏与喜爱，第四节诗节写由爱颜本人而学颜书有进步。此诗表达了苏洵对前代义士的敬重，表现了他渴望以颜真卿为师的心情。

苏洵在京中为官时，写了《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其一“十年尝作犍为令，四脉尝闻愍俗诗。共叹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谏致戎麾。会稽特欲荣公子，冯翊犹将试望之。船系河堤无几日，南公应已愴来迟。”当时从汴梁出发到江南任职的官员，一般都是由汴水东南行至楚州，然后由淮扬运河南入长江，再由长江西行。诗中“船系河堤”，即汴河河堤。其二“台省留身凡几岁，江湖得郡喜今行。卧听晓鼓朝眠稳，行人淮流乡味生。细雨满村莼菜长，高风吹旆彩船行。到家应有壶觞劳。倚赖比邻不畏卿。”据诗意可知，吴待制是南方人，与苏洵家乡眉山相去不远，所以诗中有“倚赖比邻不畏卿”句。

第三节 苏洵散文名篇精鉴

一、论说文

审 势 论^①

治天下者定所尚^②，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③。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

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感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

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①在上，诸侯无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②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駸駸^③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④，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系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人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

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

淫情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⑧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 80～81 页）

注释：

- ① 审势：即审时度势。本文讨论的是如何使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强大起来。
- ② 尚：推崇。所尚，即治国的基本原则。
- ③ 三代圣人：夏之大禹，商之汤，周之文武二王。
- ④ 成康之治：指周成王、周康王朝强盛时代。
- ⑤ 指东周时期周王放任五霸管理天下，齐桓公等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 ⑥ 趺趺，渐进貌。
- ⑦ 本：指儒家的仁政德治。
- ⑧ 见《礼记·表记》。

分析：

1. 主要观点

本文主题是使积弱已久的宋王朝强大起来，而关键是弄清国势不振的原因，即审时度势。作者认为，每一朝代必有治理天下的一般原则，并善于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势作适当调整，处弱者用威，处强者用惠，以免或屈或折。宋朝有可强之势反有太弱之实，盖因习于用惠而怯于用威。方数千里，拥兵百万，天子一呼百应；却官吏怠惰，职废不举，多贓数赦，冗兵骄狂，将帅无能，羌胡凌压。其弱在治政而不在国势。然政弱远较势弱易治。故希望执掌天下者

留意用威：一号令，一赏罚，一举动，一出于威。

2. 两面开合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变弱为强，而变弱为强必须弃惠用威。所以，全文设置了三组互相对立的概念，强弱、威惠、屈折。强势而济之以惠，弱势要济之以威。强势不知兼用恩惠则折，弱势不知振之以威则屈。这样，正反两面相得益彰，以正面说明弱宋用威政的必要性，以反面说明续行惠政的恶果，加强了文章说服力。

3. 本文精华

本文精华在于论北宋积弱症结和医治症结的方法，可谓字字如珠，句句如玉。尤其是“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和“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数句，可谓金玉良言。

4. 论证方法

有喻证法，如“譬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喻证治国必先审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喻证北宋用威的势在必行。类比法，以齐威王治齐弱极而强，与北宋弱极可强类比，证明北宋以威致强的可行性。

御 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

六畜^①，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蹄，牛亦能触。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杀之；杀之不能，驱之而后已。蹄者可驭以羁绁^②，触者可拘以楅衡^③，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废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

天下无骐驎^④，终无以服乘耶。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⑤，顾其才何如耳。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饌，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

近之论者或曰：将之所以毕智竭虑，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辞者，冀赏耳。为国家者，不如勿先赏以邀其成功。或曰：赏所以使人，不先赏，人不为我用。是皆一隅之说，非通论也。将之才固有大小，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之制御之术，以称其志。一隅之说不可用也。夫养骐驎者，丰其刍粒，洁其羁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彼骐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岂以一饱而废其志哉？至于养鹰则不然，获一雉，饲以一雀；获一兔，饲以一鼠。彼知不尽力于击搏，则其势无所得食，故然后为我用。才大者，骐驎也，不先赏之，是养骐驎者饥之而责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鹰也，先赏之，是养鹰者饱之而求其击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昔者，汉高祖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当是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厥后追项籍垓下，与信约期而不至，损数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屣。项氏未灭，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极富贵矣。何则？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之徒则不然，拔一城，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否

则，终岁不迁也。项氏已灭，天下已定，樊哙、滕公、灌婴之徒，计百战之功，而后爵之通侯。夫岂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虽不先赏，不怨；而先赏之，则彼将泰然自满，而不复以立功为事故也。噫，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⑥，当此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则曰：“汉王不夺我齐也。”故齐不捐，则韩信不怀。韩信不怀，则天下非汉之有。呜呼！高帝可谓知大计矣。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作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 119 页）

注释：

- ① 六畜：牛、羊、马、豕、鸡、犬。
- ② 羈继(xiè)：马络头和缰绳。
- ③ 楅衡(bì)：缚在牛角上防其触人的横木。
- ④ 骐驎：良马名，能日行千里。
- ⑤ 廉隅：棱角。细谨：细小之处。
- ⑥ 蒯通、武涉：楚汉相争时说客，曾先后劝韩信背弃刘邦自立。

分析：

1. 本文意义

北宋是一个武备不力、对外软弱的王朝，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国者鉴于五代武夫篡弑不断、朝代更叠频繁的状况，采取了抑制武夫、任用文人统兵为将的国策。这在宋初收到极好效果，但行之既久走向另一个极端，带来了武威不张、外侮不断的严重问题。到了苏洵生活的年代，这一问题非常突出，宋廷对外屡战屡败，不得不每年向辽、夏输送大量绢银，使宋王朝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苏洵此文，提出起用才将、振兴武备的建议，反映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英雄所见。起用才将，是对宋初国策的否定，但它却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北宋未能及时重用武将，所以才在积贫积弱中亡于金人。

2. 现实意义

驾驭部下之术,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使到了现在,任何人都会遇到如何善待有棱角共事者的问题。如果不愿与有棱角者共事,则身边不会有性格互补的人;如果容不得某一方面超过自己的人,则只能是武大郎开店只要侏儒;如果没有驾驭性格不合或不服自己者的权术,则只能步步向别人退让或诸事不举。所以,驾驭“才将”不仅是历史旧话题,而且是当今欲成就功业者的必修课之一。

3. 论说艺术

作为一篇议论文,本文论证方式丰富多样。一是采用类比法,人类对待马牛“防其伤人,用其所长”策略得当,结果野兽驯化后为人所用,说明对待能打胜仗而不够忠诚的武夫,只要恩威并用、驭之有术,就能发挥其军事才能,成为国之干城。二是喻证法,以骐驎比才干杰出、志向高远的将才,以鹰比喻志小才庸的将领,说明对待才志双高者必须先赏重宠,对待志小才庸者要后赏严责。三是对比法,把武夫分为才将和贤将,把驾驭方法分为先赏与后赏,在对比中说明驭将要领。

二、记叙文

张益州画像记^①(节选)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②,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歛,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

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③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④之民，而以砧斧令^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⑥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145～146页）

注释：

① 张方平，字安道。曾任益州知州，所以苏洵称他张益州。本文记述张安道安定益州的政绩。

② 《宋史·张方平传》载：“以侍讲学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依智高在南诏，将入寇，摄守亟调兵筑城，日夜不得息，民大惊扰。朝廷闻之，发陝西步骑兵仗，络绎往戍蜀。诏趣方平行，许以便宜从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归，他役尽罢。适上元张灯，城门三夕不闭，得邛部川译

人始造此语者，梟首境上，而流其余党，蜀人遂安。”

③ 矜：居功自傲。

④ 重足：叠足而立；屏息，不敢大声出气。形容非常恐惧。

⑤ 砧斧：刑具。以砧斧令，靠刑法来驱使。

⑥ 皆：指那些听到苏洵演讲的人。

分析：

1. 张方平爱民思想

张方平滑州任职期满，就要转任益州知州时，益州谣言四起，代理主官对此处置不当，引发益州境内惊扰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一方面增兵益州，一方面催促张方平迅速到任，筹措良策平息事态。张方平首先镇之以静，停止了军队调动，撤销了战备命令，以官府的安定带动了全民的安定；后来又抓到了谣言的制造者，并将其斩首示众，成功地稳定了益州。他之所以有此成功，得益于他的相信百姓、爱护百姓的民本思想，“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这是中国古代为官之道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

2. 本文艺术特点

本文题目是《张益州画像记》，全文由益州百姓要为张方平画像为起点，侧重表现张方平爱民思想的巨大反响。因而正面记述张方平平乱的文字不多，大量篇幅用于记录苏洵本人与益州百姓的对话，通过对话，尤其是苏洵的话表现张方平的爱民思想。因此，本文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叙议结合、以议为主。通过议论表现张方平的爱民惠民思想。

苏氏族谱亭记

匹夫而化乡人者，吾闻其语矣。国有君，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诉于其门；乡有庠，里有学，而学道者赴于其家。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父兄辄相与恐曰：“吾夫子无乃闻之！”呜呼！彼独何修而得

此哉？意者其积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

今吾族人犹有服者^①，不过百人，而岁时蜡社^②，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稍远者至不相往来，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乃作《苏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讣^③，冠、娶妻必告^④，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⑤也。”

岁正月，相与拜奠于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顾少者而叹曰：“是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自吾少时见有不义者，则众相与疾之，如见怪物焉，栗焉而不宁。其后少衰也，犹相与笑之。今也则相与安之耳。是起于某人也。夫某人者，是乡之望人也，而大乱吾俗焉。是故其诱人也速，其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遗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费田^⑥，而欺其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为其诸孤子之所讼也，而礼义之节废；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笃于声色，而父子杂处，谨哗不严也，而闺门之政乱；自斯人之渎^⑦财无厌，惟富者之为贤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时所谓大惭而不容者也。今无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犹且为之。’其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货力，足以摇动府县；其矫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仿佛于斯人之一节者，愿无过吾门也。^⑧”

予闻之惧，而请书焉。老人曰：“书其事而阙其姓名，使他人观之，则不知其为谁；而夫人之观之，则面热内惭，汗出而食不下也。且无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记之。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149页）

注释：

① 旧时丧服制度，按与死者关系的亲疏，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五等。凡在这五等内的近族人,称为“有服者”。

② 蜡(zhà):蜡祭,年终合祭百神;社:即社日,古代春秋两次祭祀土神,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

③ 讣:报丧。

④ 冠(guàn):古代男子十二岁举行加冠礼,表示成人。

⑤ 诮(qiào)让:责备。

⑥ 货田:财货与土地。

⑦ 渎:通“黷”,贪污。

⑧ 二句意为,只要行为接近“某人”六种恶行其一者,就不承认他为同族。

分析:

1. 思想价值

本文表现了中华民族向善畏恶、防微杜渐的传统美德。在苏洵的家族中,原本存在着“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的优良风气,但仅仅因为出了一个名为乡之望人、实则州之大盗的家伙,“其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货力,足以摇动府县;其矫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这样一个人没有受到应有惩治,以致群起效尤,而乡风族风日益败坏,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苏辙创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刻石,警戒后人,“使他人观之,则不知其为谁;而夫人之观之,则面热内惭,汗出而食不下也”。这从一个角度告诉今人,反腐倡廉,防微杜渐,必须从严惩首恶做起;如果带头为非者得不到及时严厉的打击,那么就无法控制恶劣风气的蔓延。

2. 艺术精华

本文一篇记叙文,记述了苏氏族谱亭的建造和刻石意图、经过,刻石意图的表述是全文的重点。“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顾少者而叹”,刻石意图是通过族中长者对全族男丁的一番话揭示的。长者的话揭露了败坏族风恶人的五种恶行,一是“逐其兄之遗孤子”而占其兄之家业;二是“多取先人之货田”,即分家时多占田产;三是“以妾加其妻”,爱色而弃德;四是“笃于声色”,影响子弟;五是“渎财无厌”,为富不仁。这些内容通过人物语言叙述出来,减弱了作品的说理色彩。

第六章

曾 巩

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虽然成就不及欧苏,但他诗文兼长,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俱有建树,值得今人认真研究。

第一节 曾巩的人品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

曾巩嘉祐二年中进士后“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后任越州通判,“州旧取酒场钱给募牙前,钱不足,赋诸乡户,期七年止;期尽,募者志于多人,犹责赋如初。巩访得其状,立罢之。”遇灾荒年,“度常平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这是曾巩年轻时为官地方的两大政绩。

因为在越州通判任上政绩卓著,曾巩不久被提拔为齐州知州。他在齐州知州任上,首先整顿治安,“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拥资雄里中,子高横纵,贼良民,污妇女,服器上僭,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几察其出

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其次明察秋毫，除弊兴利，“河北发民浚河，调及它路，齐当给夫二万。县初按籍三丁出夫一，巩括其隐漏，至于九而取一，省费数倍。又弛无名渡钱，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自长清抵博州，以达于魏，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体现了其务实惠民的理政风格。

转任洪州知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他以爱民为本，妥善处置救灾事宜，使大灾之中民有所依；别的州官借供应军队之机，变本加厉地向市民摊派，而曾巩治理下的洪州军队已过市民还不知道。转福州知州任，“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馀众溃复合，阴相结附，旁连数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憎恐。巩以计罗致之，继自归者二百辈。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赋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之弊。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他平息盗贼，根除贿赂求僧官之弊，使福州弊绝风清。此后，曾巩还曾担任明州、亳州和沧州知州，而当时比他资历浅的后生纷纷为京官师，而曾巩却长期在州郡做主官。“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但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合，曾巩未能发挥其理财特长。

曾巩在家庭关系上也是孝弟的模范，“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他作为长兄，待继

母如亲母，帮助继母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长大成人，并全力促成他们的婚嫁。在文学创作上，“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时鲜能过也。”在政治上，他反对过激的变法，“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评论王安石长短可谓一针见血。为人平和的曾巩不屑于与新党发生直接冲突，在京不久便请求外任。

曾巩一生，为官清慎，治理地方颇有干才。其思想属儒学体系，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和主宰世界。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也不主张死守成法，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南齐书》、《梁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以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

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曾巩的成品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1. 议论性散文议论天下大事

曾巩的《本朝政要策》共五十篇，是在宋仁宗皇祐初撰写的。这时的曾巩已过而立之年，虽尚未进入仕途，但他直面社会，耳闻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贪官污吏的暴行和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常忧虑国事，忧怜百姓，不在其位而“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毫无顾忌地以洋洋万二千余言，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政见，足见其积极用世之心。《本朝政要策》首先关注的是边疆安全，其中《南蛮》、《契丹》二文要求朝臣面临外族的侵扰，决不能“不谋威略，一欲怀之以利”，必须加强武备，立足于战，防止“陷郡县，杀官吏，执士民，将吏依壁自固，虏辄掠垆野，收子女之俘，掳金帛之积而去，自邳而北，千里萧然”的悲剧重演。曾巩认为

强兵是当务之急，他写了《训兵》、《添兵》、《兵器》、《城垒》、《边防》等强兵之文。

其次关注的是粮食储备，在《边籴》、《常平仓》、《平仓》、《义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朝廷提出增加粮食储备的建议：“岁熟增价以籴，岁歉减价以粜，用赈灾民”（《常平仓》），“岁丰稔谷贱，命高其价以籴之”（《边籴》），“使岁穰谷不贱出，岁凶民不病食”（《平仓》），“使岁穰输其余，岁凶受而食之”（《义仓》）。这种“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的思想，体现了他以农业支持边防、以边防保卫农业的思想。

再次是关注水利，为此他写下了《水灾》、《汴水》、《水利》和《黄河》等文章，阐述自己对水利的看法。在《水灾》中，他回顾了北宋治河失败、水灾为害天下的教训：“太宗淳化之岁，尝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门外皆浮罍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人多压死，物价踊贵，于是流移者众，而陈颖宋亳之间，盗亦稍稍而起。”在《黄河》中他又提到：“盛宋之隆，河数为败。兴国之间，房村之决为甚”。在曾巩看来，要解决水患，首先要政明，政明才能治河。其次要有适当的治理的方法。他认为宜以疏导入海为法，不能动辄堵塞。

《救灾议》是作者的救灾专论，是有实用价值的长篇论说文，写于在京中为官时。作者针对“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的难题，指出有司的“常行之法”难以应对此“非常之变”。作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的解决办法：

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令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费，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

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

这实际上就是今日所说“救贫不如救生”。曾巩对比了有司的天天发、月月给的常行之法与自己的“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之法，指出“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赈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峙之实，所实费者，钱五巨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病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可谓苦心孤诣，用心良苦之法。此文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

2. 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证切题而又生动

曾巩的记叙文立意“必本于六经”。如《墨池记》记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遗迹，并针对王羲之学书展开了三层议论：一是王羲之的书法才技是“以精力自致”，强调学习专心致志；二是后人不及，是后人所下功夫不够；三是把学书之理引申至人的品行修养，“欲深造道德者”也应苦学。而曾巩此文的“重德”立意源于儒家“三不朽”思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中立德为上，因而曾巩《墨池记》议论归之于立德。《菜园院佛殿记》是曾巩应可栖和尚之请为菜园院佛殿建成写的一篇记。文中将佛徒与世儒进行对比：佛徒“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而世儒“习圣人之道，

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通过对比，得出“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的结论，反映了作者对宋代儒者务虚不务实的担心。

曾巩记叙文长于议论事理。如《思政堂记》全文四个段落：首段叙思政堂由来及作记之缘由。次段先述思政堂修建经过，再述思政堂景观，后言思政堂所思：“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第三段由“思政”二字生发开去，先议“行”之难，难在“无穷”、“无常”、“无方”。“无穷”，因事物是复杂的；“无常”，因事物是变化的；“无方”，因没有一成不变百试不爽的方法。次议“思”之易，易在“因之”、“循之”，即只要顺着事物的变化规律，按“理”办事，“则事者虽无穷而易应，虽善惑而易治也”。一难一易，因“思”而生，这就突出了“思”之重要，也符合儒家“行成于思”之义。后议“政”之要领，“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所谓“正己”，就是要求自己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然后才能教化别人。末段介绍王君，先言其学问渊博、精深，“于书无所不读，而尤深于《春秋》。”接着叙述王君为政勤慎，“施用素学，以修其政”。全文有叙有议，叙议结合，使“思政”题旨得到了充分生发。《宜黄县县学记》叙事周详，议论精辟。先叙三代建立学校及其成效；次说后代的废学及其后果；再言宜黄县立学；最后勉励学子努力学习。在每段结尾，作者或用反问句，或用感叹句，既使文章过渡自然，又很好地强化了文章的主旨。

《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越州知州赵公以得力措施救灾的事迹，“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廩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

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粜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如此周到的救灾措施在封建社会可谓凤毛麟角。

3. 书序多有散文精品

曾巩为他人作品集作序，常常体现“知人论世”的精神，对作家作品表达鲜明的爱憎。在《〈李白诗集〉后序》中，曾巩对李白这样一位杰出诗人非常钦佩，特别是他飘逸的风神，宏放的志气，脱俗的气质。正由于此，曾巩对李白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对李白无辜被罪，“长流夜郎”，曾巩虽没直接表达他的不平之鸣，但那凝重沉痛的语言里隐含着的同情。在《先大夫集后序》中，曾巩爱祖父的才华，他说“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而“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为文闳深隽美”。他高度称赞祖父“勇言当世得失”，“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的坚定品格。在《〈张文叔文集〉序》中，曾巩不仅赞文叔文风之正，又赞其人品之高，“余读其书，知文叔虽久穷，而讲道益明，属文益工，其辞精深雅贍，有过人者。……又知文叔自进为甚强，自待为甚重，皆可喜也。”

另外一些书序则侧重于评论作品内容。《〈范贯之奏议集〉序》评价了范氏奏议的久远价值，“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世，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在《强几圣文集序》中，他评价了作者文风的严谨：“几圣为属稿草，必声比字属，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远近多称诵之。及为他文，若志铭序记、策问学士大夫，则简古典则，不少贬以就俗。”颇

中肯綮。

总之，曾巩散文内容丰富。当西昆体盛行时，他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为北宋诗文革新作出了贡献。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是对他恰当评价。

第三节 曾巩的诗品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

1. 农事诗

作为一个为官清廉、颇有政绩的地方官，曾巩体恤民情、关心农事，所到之处“民用不扰”、“人皆以为利”，身体力行地奉行孔孟“仁政”、“爱民”的主张，力求使“民乐”，使“民无困”。所以他写很多农家农事诗。著名五言长诗《追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诗中描述了当时严重的旱灾：“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陂湖蹙埃壘，禾黍死硯确。”灾民到了“计须卖强壮，势不存尪弱”的地步。灾情如此严重，而官府却麻木不仁，“众期必见省，理在非可略。谓须倒廩赈，诂止追租阁。”老百姓渴求救助，满以为官府会减免租税，开仓放粮，但“奈何呻吟诉，卒受鞭捶却。宁论救憔悴，反与争合龠”。统治者不顾民众苦情，还逼交租税。以致“饥羸求分寸，斯须死笞缚”。作者一针见血指出：“公卿饱天禄，耳目知民瘼。忍令疮痍内，每肆诛求虐。”诗人不得不忧愤地呼吁：“暴吏礼宜除，浮费义可削。”表达了同情农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思想感情。因为爱民，所以他对空议救灾而无实际行动的官府深恶痛绝，他的《楚泽》诗写道：“楚泽荒凉白雾根，盈虚无处问乾坤。虫虫旱气连年有，寂寂遗人几户存？盗贼恐多从此始，经纶空健与谁论？”

诸公日议云台上，忍使忧民独至尊。”经过连年的虫灾旱灾，楚泽地区已经到了十不存一的境地，而且遍地盗贼，而此时朝廷还在对如何救灾议而不决。诗人对农民的苦难满怀忧虑，对官吏空谈不作为表示谴责和否定。

曾巩的农事诗表达与民共忧乐的思想情感，久旱不雨百姓忧心如焚他也忧心如焚，久旱逢甘霖百姓高兴万分他也高兴万分。《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其一写道：“连章天上乞身闲，笑入吴船拥节还。一夜风雷驱旱魃，始知霖雨出人间。”一夜风雨驱走了旱情，使他笑入吴船还家，喜雨之情形于色。其二“旌旗东下路尘开，六月风云席上回。正恐一方人喝死，直将霖雨过江来。”喜雨解除了渴死百姓的忧虑，真是救命的雨。《酬介甫还自舅家书所感》诗云：“旱气满原野，子行归旧庐。吁天高未动，望岁了何如。荒土欲生火，涸溪容过车。民期得霖雨，吾岂灌园蔬。”百姓盼甘霖未至，诗人就不忍心独自灌园浇菜。七律《喜雨》是他与农民同忧乐的最好的见证：

偶徇一官偷禄计，便怀千里长人忧。桑间举箔蚕初茧，陇上挥镰麦已秋。更喜风雷生北极，顿驱云雨出灵湫。从今菽粟非虚祷，会见瓯窭果满篝。

为风调雨顺、民生有望而喜。古代农民一旦遭受旱灾，便会颗粒无收，而甘霖一至，必将五谷丰登。所以曾巩对“雨”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甚至能准确地记着久旱得雨的日期，如《去年久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复旱得雨亦六月十三日也》诗题，便是明证。

2. 咏史诗

曾巩诗中有不少咏史之作，借凭吊古人来抒发现实人生的诸多感慨。这些咏史诗慷慨悲壮，深沉凝重。《咏史》：“仲尼一旅人，吴楚据南面。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用疑问的口气，表达对孔

子立言立德的肯定。《垓下》：“三杰同归汉道兴，拔山余力尔徒矜。泫然垓下真儿女，不悟当从一范增。”对项羽不能任用贤才表示痛惜。《孔明》：“称吴称魏已纷纷，渭水西边独汉臣。平日将军不三顾，寻常田里带经人。”表达了高才须高用的理想。

曾巩的咏史长诗尤值一提的是《明妃曲》二首和《咏虞姬》。《明妃曲》艺术上运用对比的手法。“明妃未出汉宫时，秀色倾人人不知。何况一身寸汉地，驱令万里嫁胡儿。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虽然只因“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而远嫁匈奴，但“长安美人夸富贵，未央宫殿竞光阴。岂知泯泯沈烟雾，独有明妃传至今。”昭君青史留名与长安宫人死后无闻，表达了重视身后名的思想。此诗用平实清健的语言，抒写了对女主人公远嫁匈奴、勾通“塞路乡国”流芳百世的敬重。《楚霸王》：“鸿门玉斗纷如雪，一万降兵夜流血。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刚强必死仁义王，阴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指出项羽的悲剧，悲在失道寡助。《虞姬》：“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花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哀怨徘徊愁不语，恰如初听楚歌时。”香魂为英雄飞逝，义无反顾地牺牲了年青的生命。诗人发自肺腑地感慨：“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邱土。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留下深沉的思索。

3. 风物诗

他的节令诗反映了北宋市井的繁华，如《上元》诗写出了宋代元宵节的热闹，“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风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栏送目劳。自笑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捻霜毛。”《寒食》诗则表现了民间饮酒唱歌的习俗，“一麾飘泊在天涯，寒食园林不见花。唯有市亭酤酒客，但歌声到日西斜。”《出郊》则是一幅清明节前安祥和平安图，“葛叶催耕二月时，斜桥曲岸马行迟。家家卖酒清明近，红白花开一两枝。”表

现了北宋人民的生活乐趣。

他的咏物诗多咏茶，如《寄献新茶》、《方推官寄新茶》、《尝新茶》、《蹇礪话翁寄新茶二首》等，无不表现了宋代民间茶文化。首先种处和摘时有讲究，“种处地灵偏得日，摘时春早未闻雷。”（《寄献新茶》）这时摘的茶称“上春”茶。其次，采叶的长度，“麦粒收来品绝伦，葵花制出样争新。”（《尝新茶》）以葵花籽大小为宜。其三，饮茶功效，明目醒衰，“一杯永日醒双眼，草木英华信有神。”（《尝新茶》）“肯分方胯醒衰思，应恐慵眠过一春。”（《蹇礪翁寄新茶》）茶之外，风雪、水果，都在他诗中出现。能于平凡中见新意与真意，比如咏雪，“太守不辞留客醉，丰年佳兆可先知。”（《喜雪二首》）“况值白羊新酒熟，可能相就庆丰年。”（《再赋喜雪》）从“瑞雪兆丰年”诗意中表达“民本”思想。《荔枝四首》盛赞荔枝的色、香、味之后，末尾写道：“解笑诗人夸博物，只知红颗味酸甜。”富有生活情趣。

4. 山水诗

曾巩对大自然充满喜爱之情，“欲将志义斯千载，只合溪山过一生。”（《题宝月大师法喜堂》）他要充分地享受大自然给人的清新之感，陶醉于天地自然的宁静和生机，或山林觅幽，或茅舍闲坐，自得其乐。同时也把自然景物当作喜爱的诗材。《茅亭闲坐》诗描画闲适静逸的山林幽居：“草萌被远径，鸟语变乔林。”一股欣喜怜爱山水之情溢于言表。他自然景物观察细致入微，常能敏感地捕捉到自然界十分细小的变化，写花开，“山茶花开春未归，春归正值花盛时”（《山茶花》）；写草绿，“草根已变绿，冰雪尚满颜”（《至西湖》）；写古树，“古杉苍苍横斗文，其干十围荫蔽野”（《七星杉》）；写瀑布，“飞泉一支天上来，寒影沉沉泻龙穴”（《瀑布泉》）。有的几乎一句一景，如“一番雨熟林间杏，四面风开水上花。”（《水西亭书事》）前写杏，后写风；“芳草连门三径远，朝云临幌数峰青。”（《伯常少留别业寄诗索酒因以奉报》）前写草，后写云。

曾巩用七言绝句写山水，大多优美流畅，运用典雅优美的辞

句,构筑了一幅幅诗趣盎然的画境,弥足珍贵。《西楼》诗云:“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这首诗写了海天一角雷雨将至的壮观景象,尤其是三、四两句,生动传神地描绘了一幅“闲卧看雨”的悠闲意境,诗情画意,呼之欲出,实为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夜出过利涉门》写道:“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翠飞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这首诗写了红灯笼照着桥水,明月在水中,人在画船上的诗情画意。妙在三、四句,着重从视觉入手来表现,悠远境界。《城南》一诗尤其写得好:“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描写了暮春时节大雨过后的山野景象,笔调流畅优美,读来琅琅上口,令人赏心悦目。

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后人曾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第四节 曾巩散文名作精鉴

一、议论文

与王介甫第二书

巩顿首,介甫足下: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①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②,而至于迁善而远罪^③,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④。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

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

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其厚者，徐徐乎其薄^⑤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

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⑥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

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⑧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⑨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⑩，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⑪。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

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⑫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

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南丰文钞》，第 42～43 页）

注释：

① 指王安石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采取贩茶自由、国家抽税办法，堵住了地方官吏借榷茶发财之路，受到诽谤。

② 意为，先教后治，就可以使人无伤痛地自愿接受治理。

③ 迁善：向善；远罪：不犯罪。

④ 意为，时间长了，人们就能看清是非功过，即使想隐瞒也隐瞒不了。

⑤ 厚：指教化礼治；薄：指纠劾刑罚。意为，对教化礼治抓得紧一些，对纠察刑罚放得缓一些。

⑥ 遽：仓促，急迫；责善：要求人向善。

⑦ 潜诉告讦：控诉和攻击。

⑧ 俟之之道：指刑治苛政。

⑨ 意为，干坏事的人离开此地到他地继续为恶，自然不如教化他在此地弃恶从善为好。

⑩ 意为，自己的政绩，也要从告讦者言路是否通畅来看。

⑪ 意为，至于地方官员的个人利害，却从来不注意。

⑫ 相晓者：劝告王安石的人。

分析：

1. 本文背景

曾巩与王安石原为好友，他曾把王安石的诗文推荐给欧阳修看，并为王安石说了很多好话。但在这封信中，批评王安石奉法太急，去恶太速，偏听偏信，刚愎自用，引起怨愤毁谤，祸由己招。曾巩与人通信向来心平气和，独此信规劝王安石时锋芒毕露，说明二人出现重大分歧。王安石对曾巩此信也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所为并不错，而曾巩是不信朋友、反信朋友的敌人。此后，曾王二人便不再深交，王安石主持变法没有提携过曾巩，曾巩也不再批评王安石，当然也就没被卷入新旧党争。

2. 此文所见二人政见和性格的不同

王安石主张大刀阔斧的改革，坚信“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实际情况需要怎样做就毫不犹豫地怎样做，不必考虑客观容许程度；而曾巩则主张渐进稳妥地推行政治主张，先行教化，等人们思想转变后再全面推开，以减少阻力，保证成功。王安石性格执拗偏狭，看准了的事便一往无前、执意不回，也不允许别人持反对意见，否则他就要大打出手；而曾巩性格比较温和谨慎，对反对意见也不急不躁，认真斟酌其合理之处，以取得“己之用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事半功倍的效果。

救 灾 议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于上，使者旁午^①天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请发仓廩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败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焉，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闲民不复得转移执事^②，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则百姓何以赡其后？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赈之未可以罢。自今至于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馀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通，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通，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也。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于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

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谓甚也。今秋气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籩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无聊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耰于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社之将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销之于未萌也？

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③，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令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资，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赈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偁^④之实，所实费者，钱五巨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岁聚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于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

于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于流转死亡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已哉？天下之民，闻国家厝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于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然后玉辂^⑤徐动，就阳而郊；荒夷殊陬^⑥，奉币来享；疆内安辑，里无嚣声，岂不适变于可为之时，消患于无形之内乎？此所谓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桴鼓之警，则虽欲为之，将不及矣。

或谓方今钱粟恐不足以办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余则取，不足则与，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⑦盖百姓富实而国独贫，与百姓饿殍而上独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贫而患不安”^⑧，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⑨，足以备水旱之灾，然后谓之王政之成。唐水汤旱而民无捐瘠者^⑩，以是故也。今国家仓库之积，固不独为公家之费而已，凡以为民也，虽仓无余粟，库无余财，至于救灾补败，尚不可以已，况今仓库之积，尚可以用，独安可以过忧将来之不足，而立视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肤，割发宜及体。”先王之于救灾，发肤尚无所爱，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军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余州军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粟粟常价斗增一二十钱，非独足以利农，其于增粟一百万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钱，吾权一时之事，有以为之耳。以实钱给其常价，以茶茷^⑪香药之类佐其虚估，不过捐茶茷香药之类，为钱数巨万贯，而其费已足。茶茷香药之类，与百姓之命孰为可惜，不待议而可知者也。夫费钱五巨万贯，又捐茶茷香药之类，为钱数巨万贯，而足以救一时之患，为天下之计，利害轻重，又非难明者也。

顾吾之有司能越拘挛之见，破常行之法，与否则已，此时事之急也，故述斯议焉。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 166~167 页)

注释:

- ① 旁午:交错,纷繁。
- ② 《周礼·天官·大宰》:“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意为无固定职业的人要经常变换工作。
- ③ 方纸之诏:古代书写诏令时用方幅笺以示严重。
- ④ 储待(zhì):储备。
- ⑤ 玉辂:皇帝专车,以玉为饰。
- ⑥ 殊陬:偏远的地方。
- ⑦ 《论语·颜渊》中有若语。
- ⑧ 《论语·季氏》中孔子语。
- ⑨ 《礼记·王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 ⑩ 唐水汤旱:唐尧时九年水灾,而商汤时七年旱灾。
- ⑪ 荈(chuǎn):晚采的茶。

分析:

1. 写作背景

据作者《瀛州兴造记》:“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坏城郭屋室,瀛州为甚。”按《宋史》本传,曾巩不曾任瀛州为官,此文写于熙宁初他在朝中为官时。本传载:“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一,加巩史馆修撰,专典之,不以大臣监总,既而不克成。会官制行,拜中书舍人。”此时作者虽为京官,但他有长期主政州郡的实践经验,故能对瀛州地震水灾提出切实可行的救灾方案。

2. 本文历史意义

宋代官员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任子,因父亲为高官,照顾一个或数个儿子做低级别官;二是科举,读书人中了进士,可做县令、县尉或主簿。但无论任子还是科举为官,事先都得不到行政培训,做官之初都对如何救灾茫然无知。

而曾巩此时已在越州、齐州、明州等地为官数任,实践出真知,他在此文中所提“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方案,即对灾民一次性发放救灾粮与自救款,改变天天发、月月放的常规救灾模式,的确是一种“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的救灾良方。因为这个方案立足于调动一家一户灾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使他们各自为战,利用政府的救灾钱粮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地抢救灾毁房屋、家园、农田,安排生计,比政府官员像救世主那样恩赐放饭,所放越多越久灾民积极性、自救性越弱有天壤之别。其二,封建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给官员以极大权力,使官员扮演救世主角色,而官员一旦腐败起来,利用救灾大发国难财,那么朝廷的救灾就会流于形式,老百姓就享受不至应有的救灾利益,而曾巩的救灾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弱了中低层官员对救灾钱粮的控制,钱又是贷给灾民的,有利用经济规律救灾的属性,无疑在封建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

3. 本文逻辑论证

本文论证严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第一段提出问题,指出朝廷的常行之法事倍功半,不能“救其患、塞其求”。第二段分析问题,先认定河北自然灾害的性质是“非常之变”,顺理成章地推出必须有“非常之恩”,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振之”。然后分析朝廷的常行之法的效率低下,使灾民“日待二升之糜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焉,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闲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不仅事倍功半,而且非常消极。接着展望这种救灾方式带来一连串无法解决的问题,费用大,历史久,妨碍灾民生产自救,窒息灾民创造性和生存活力,甚至会引发灾民骚乱。第三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面论述“非常之恩”——一次性救济的事半功倍,“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而且费用少、时间短,“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第四段探讨实行“非常之恩”的钱粮来源问题,在从思想上明确救灾如救火、安定灾民高于一切道理的同时,也为朝廷设想了“非常之恩”所用钱粮的筹措途径,主要是以茶叶香药的折价作为加价在非灾区购买

粮食，而运销于灾区。这样，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谁还不愿意采用“非常之恩”救灾方案呢？

二、记叙文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荆及康狼^①，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门，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其后曰夷水，《水经》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酈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埭^②，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州饮者^③无所取，令孙永^④曼叔率民田渠下者^⑤，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埭，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⑥，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

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酈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

夫水莫大于四渎^⑦，而河盖数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又王莽时而绝，况于众流之细，其通塞岂得如常？而后世欲行水溉田

者，往往务蹶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

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瑰唐公^⑧。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⑨，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⑩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竭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独长渠之利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熙宁六年，余为襄州，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予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上司农。八年，曼叔去开封，为汝阴，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八月丁丑曾巩记。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南丰文钞》，第 123～124 页）

注释：

- ① 荆山、康狼：皆汉水西岸、宜城附近二山山名。
- ② 竭：音饿，堤堰。
- ③ 州饮者：襄州靠长渠吃水的人。
- ④ 孙永，字曼叔。曾任宜城县令。
- ⑤ 田渠下者：在长渠两岸耕田的人。
- ⑥ 时其蓄泄：按时关闭、开放。
- ⑦ 四渎：古代中国四大江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
- ⑧ 张瑰，字唐公，曾任淮南转运使、知襄州事。
- ⑨ 沮止者不用：反对孙永修渠的意见一概不采纳。
- ⑩ 自夫二人：由孙永、张瑰二人。

分析:

1. 本文背景和意义

熙宁六年夏,曾巩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任齐州,改任襄州知州。赴任不久,襄州秋冬大旱不止,熙宁八年秋又大旱,而“独长渠之田无害”,引起他对水利的极大兴趣。在到任襄州之前,他曾在汴京东门会晤长渠的主持人孙永,获悉修渠始末,并接受孙永的委托监督长渠使用规则的执行,到任后对长渠的现状与历史作了重新的调查,深感“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写了这篇文章。联系曾巩的《广德湖记》、《序越州鉴湖图》等文章,可知作者一向关心水利、关心民瘼的赤子情怀。

2. 本文精华

孙永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他任宜城县令期间,力排众议,修成了长渠;数年后为官京城,仍不忘长渠使用,专门与为官襄州的曾巩晤面,交待长渠管理事宜,他是多么可亲可敬啊!孙永修渠时,张瑰作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存嫉妒之心,义无反顾地支持下属成此大功;曾巩作为后来的襄州知州,对前任属官交办的事不轻视、不推诿,乐于成人之美,完善他人事功,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学习。

越州赵公救灾记^①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廩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②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羨粟^③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廩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

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余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①。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瘞之。

法，廩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而事有非便文者^②，公一以自任，不以烦^③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于吴越，民饥谨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④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⑤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 138～139 页）

注释：

① 越州，今浙江绍兴。赵公，指北宋中期名臣赵抃。

- ② 吴越：今江浙一带。
- ③ 僦(jù)：雇用。
- ④ 羨粟：馀米。
- ⑤ 时：别作“恃”。
- ⑥ 非便文者：不合于法定手续但又非办不可的。
- ⑦ 烦：别本作“累”，推诿，烦累。
- ⑧ 岂弟：通恺悌，慈爱。
- ⑨ 荒政：救济饥荒的法令办法。

分析：

1. 主人公与背景

赵抃是北宋中期著名直臣循吏、正人君子。《宋史》本传述评其为人道：“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货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悻贫，盖不可胜数。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每诏二郡守，必以抃为言。要之，以惠利为本。晚学道有得，将终，与衲诀，词气不乱，安坐而没。宰相韩琦尝称抃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云。”

曾巩此文记述赵抃晚年主政越州妥善救灾的惠民之政。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载：“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公尽所以救荒之术，发廩劝分，而以定货先之，民从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虽饥而不怨。”《宋史·赵抃传》载：“乞归，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可与本文参阅。

2. 先进文化价值

赵抃能急民之所急，谋民之所欲谋，尽官职所能为，出个之所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虽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但思想境界与当代共产党人相当。“故事，岁廩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赵公为赈灾所备粮食，是朝廷规定数的16倍；“法，廩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赵公赈灾时间，超过朝廷规定期限两个

月。别人赈灾，是借机发财，而赵公赈灾，是赔家财而为，“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境界之高，叹为观止。

曾巩于赵公一生中，单选其“知越州”期间最光彩夺目的政绩大写特写，也反映了他对先进文化的情有独钟。赵公未雨绸缪，明于救灾，“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曾巩惠眼独具，深层次挖掘了赵公爱民之举之价值，“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表达了发扬光大赵公业绩的迫切愿望，“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赵、曾二人对于创造和保存民族优秀文化都功不可没。

3. 本文写人艺术

一是用准确的资料说明人和事的背景。如大灾中灾民人数“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反映了赵公救灾任务之重；赵公救灾内容，“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为粢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粢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表现了救灾劳动量之大。二是用精彩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思想性格，“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把赵公利为民所谋、为民谋利无微不至的思想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七章

苏轼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其散文创作既形象生动，又思想深刻；其诗歌创作才气横溢、自然天成，而意境优美、理趣盎然。在做人方面，集古代循吏、才子、仁人志士与文化名人于一身，值得重视。

第一节 苏轼的人品

苏轼(1037~1101)一生始终奉行“忠君爱民，社稷至上；不朋不党，独立不倚；用行舍藏，随遇而安”的人生价值观，他这种一秉忠正公允的政治取向，与北宋中期党争要求格格不入，所以他在党争剧烈的北宋中期吃尽苦头。

一、苏轼的忠君爱民观念

苏轼幼年在父母那里接受儒家忠君爱国教育，《宋史》本传说他“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则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范滂，东汉儒吏。任职期间对于那些行违孝悌、不轨仁义的事，一概严惩不贷。后来被诬为“朋党”，被捕后对簿公堂时说：“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后汉书·范滂传》）苏轼从范滂的所作所为吸取政治营养，奠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进士及第后叙述自己的出身时说，“某生于远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余训，教以

修己而治人。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谢制科启》）其父苏洵教导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民。这样的家庭影响，奠定了苏轼忠君爱民、社稷至上的思想基础，不善逢场作戏、不会随波逐流的性格。

苏轼嘉佑二年进士及第，嘉佑五年在福昌县主簿任上“秘阁”“试六论”，“复对制策，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时候的苏轼，内心深处对大宋君臣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说：“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苏轼进京应试本不自信，出场后做了最坏打算，准备收拾行装返乡。他认为若非欧阳修力排众议，自己很难中进士。于是，他强化了自己“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的宏愿。以“直臣”自许，在国家和百姓利益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这就是苏轼步入仕途后的基本政治态度。在签书凤翔府判官任上，“自到任以来，日夜厉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奖庇，曲加搜扬。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金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乌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竭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凤翔到任谢执政启》）既然签书凤翔府判官是“最深”的知遇，他当然要“自重”不已：日夜励精图治，只求为政无过失。他对自己所分管的政务的重要性津津乐道，充满自豪之情；对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感到痛心疾首。“惟有署置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二句，反映了他忠君与爱民观念的统一。

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变法。苏轼出于对宋王朝的忠心，认识到当时有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也有改变现状之意，但他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甚至以晁错为例，告诫人们出于使自己“昭著

不朽于后世”的私利的变法，会“功未成而有所夺，只以速天下之乱”（《策略三》）。苏轼主张的是在不改变宋王朝祖制前提下的渐进式改良，因而和王安石的激进变法主张发生了冲突。“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杭州召还乞郡状》）出于报答宋帝对他知遇之恩和实践自己“挺身而许国”的初衷，他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同样出于忠君爱民的考虑，“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因亦与司马光异论。”所以，忠君是苏轼行为的主要出发点。

苏轼忠君爱民，更集中地表现在晚年被贬海南后。一是连贬连上谢表，婉转说明自己的冤屈，表明痛改前非、再图效忠的心迹。在《至惠州谢表》中说：“伏念臣性褊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这种对皇帝赤诚相见、哀而无怨的话语，非忠心不二不能出之。二是在闲散困顿中不忘关心当地的国计民生。贬谪惠州时，“博罗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火后的县城“百姓千人，皆露宿沙滩”，无职无权的苏轼忧心如焚，亲自修书给所属州行政长官程正辅，利用私人关系为受灾百姓呼喊，催促官府救灾：“火后事极多，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假，自不当坐此。愿兄专牒此子，令修复公宇、仓库之类，及存抚被灾之民，弹压寇贼，则小民受赐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实价和买而行科配，则害民又甚于火矣。愿兄严切约束本州，或更关牒漕司，依实支破，或专委黄推官提举催促及觉察科配。”（《与程正辅》）苏轼像这样以犯官关心地方国计民生的事，还有向程正辅反映“乞支阜民粪土钱用修桥”、“本州诸军，多阙营房”、“飓风异常，公私屋倒二千余间”和“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矣”等下情和建议。

二、苏轼本人的人生观

苏轼为人处世主张不朋不党、独立不倚，在政治风浪中坚持独立人格，从不因利害屈从权势。在《屈原庙赋》中，他抨击秦汉以来为官随波逐流之风：“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屈原死后，少见政治独立不倚的臣下，人们习惯于随世浮沉、不问是非。这种现象让苏轼痛心。在《与杨元素》中，他猛烈地抨击了现实中的朋党恶行，“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熙宁变法时，许多人出于种种私心投靠王安石捞取好处；元祐毁法时，许多人不问是非一概附和司马光。苏轼对此深恶痛绝，在党争中独立不倚，做事一秉忠君爱民之心，从实际出发是是非非、好好恶恶，即使被捕入狱、被贬荒远，也在所不惜。在《思治论》中，他强调为官要先定行政准则：“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反对无原则地随波逐流，一味趋利避害的官场市侩。

欧阳修主张“君子之朋”，而苏轼则认为君子朋则必败。他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说：“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徼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按照这种观念，苏轼遇到政敌攻击时，总是想方设法离开是非紧要之地，而不是拉帮结派与政敌抗衡。苏轼认为报答君恩的最好办法是在朝政中独立不倚，“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

少报万一。”(《杭州召还乞郡状》)他不仅理论上这样说,而且行动上一直始终不渝。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对宋神宗还说:

所以不避烦渎,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抑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俛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

从中不难看出,苏轼入仕以来奉行的都是独立不倚的为官准则,从不结党营私;奉行独立不倚准则的他为此吃尽苦头,但他并不打算改弦更张;面对小人朋党的加害,苏轼从不放弃政治主张,而习惯于离开是非紧要之地以避祸。

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他有过思想斗争,如他回忆与王安石恩怨时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杭州召还乞郡状》)但他经过思想斗争总是选择不妥协。与司马光的斗争也是这样,他在《乞郡札子》中说:“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司马光主张废除王安石所行的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法,苏轼认为免役、差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既然免役行之既久,百姓已安此法,那就没有必要再恢复差役法引起社会动乱,因而与司马光力争。这种出以公心、独立不倚的精神,在党争剧烈的北宋中后期是难能可贵的。

三、苏轼人生态度的局部变化

苏轼奉行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和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处世准则，用行舍藏，随遇而安。

初贬黄州，为了适应“舍藏”的现实，尽快完成处世角色变化，他大行韬晦之计。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中对自己的“过恶”进行了反省：“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说自己如果不改就不配做人，固然有几分对往事的追悔，但主要目的是欺骗政敌。在《答李端叔书》中表示要与“制科人习气”彻底决裂：“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讻讻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由于先前妄论利害搀说得失对朝政没起一点作用，所以他要和“直臣”永远告别，只想做个普通人。于是他谢绝来往，闭门著书，“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黄州上文潞公书》）郑重其事地做起学问来。

谪居黄州的中期，一方面出于积蓄用尽而生计无着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对政治前途失望的驱使，更重要的是苏轼认识到黄州之贬不仅是因为自己政治上过于忠君而锋芒毕露，而且是因为政治

斗争太残酷、政敌太凶狠无情，于是他萌发了通过劳动自救与命运抗争的思想。在《答毕仲举书》中他指出，“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遇祸得福不完全由个人的巧拙来决定，因此想回避或追求都是力不从心的；二是是祸是福还要由当事人怎么看来决定，与外人怎么看关系不大。在此基础上，苏轼开始了劳动自救生涯，其《东坡八首·序》记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通过劳动谋生追求新的人生价值。

苏轼被贬海南期间随遇而安人生态度表现得更加突出。一是心胸开阔，豁达大度。他在惠州写给程正辅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这种把事情看透一层、转悲为喜化怨为恩以排解不快的思想方法，真令古今之人并叫绝。二是以乐观的眼光看生活，生活充满乐趣，“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悬三十仞，雷轰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得来书，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与陈季常》）到大自然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从儿子从政和为文有成中发现生活的美好，自然能获得愉快的心境。

由于苏轼一秉忠正独立的政治取向，与北宋中期党争对大臣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他的人生悲剧在党争剧烈的北宋中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苏轼的文品

苏轼是宋代散文成就最高的一人，他无论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都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成为宋代文学代表者。

一、苏轼的文学理论

苏轼论文有与欧阳修一致的地方，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在《谢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抨击宋初“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的文风，与欧阳修相同。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苏轼认为文章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达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度倅俞括》）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抒情性。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对文学的个

人性的认识就有其突破儒家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认为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要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欧阳修要进步。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谢欧阳内翰书》)。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自评文》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之类的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并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

二、苏轼散文思想品格

1. 非文学散文

史论和政论文。史论如《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教战守策》等,都是不可

多得的议论精品。往往就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短文波澜横生。《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这是苏文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神宗皇帝书》写于熙宁四年二月,当时王安石已全面推行变法,作者却在上书中要神宗只在意“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为什么呢?一因“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直言不讳地指出变法不切实际,徒乱国计,导致人心渐失。二因“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苏轼指斥变法坏了吏治风俗,“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三因“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苏轼含蓄指出王安石任用私人为谏官,使谏官失去监督政要的职能,“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会危害皇权。所以这封上书,实际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宣言书,表达了苏轼本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渐变缓改主张。《教战守策》则针对北宋武备不强,十战九败

的的颓败国势,指出:“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因而主张“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此策若能实施,则北宋振作有望,决不至于亡于靖康之难。

2. 文学散文

游记、亭台记、杂记和人物传记。苏轼这一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揉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意脉,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如《石钟山记》先对酈道元、李渤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入自己的游览探察过程,描写石钟山下“水石相搏,声若宏钟”的奇特景象,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全文以我为主,气脉流贯,叙事、写景、议论的衔接十分自然,而且最后的议论部分只是轻轻带过,不摆出一定要教训人的强硬姿态。而《放鹤亭记》则从云龙山人迁草堂、建亭缘由说到彭城的山势、亭的位置、季节与风景的变化,再说到主人的鹤与鹤飞的姿态,这才说到亭的命名。下面一转,从自己与宾佐僚吏的游览,发出一通感叹议论: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

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从鹤的典故说到人生情趣，又从卫懿公好鹤亡国的故事，翻转到隐士全真远祸生活的可羨，最后以山人一首高逸旷达的歌子收尾，给人以飘然远去之感。全文不过数百字，却摇曳多姿，文笔似闲散，意脉却流畅而完整。著名的《前赤壁赋》也是如此，在自夜及晨的时间流动中，贯穿了游览过程与情绪的变化，把写景、对答、引诗、议论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完全摆脱了过去赋体散文呆滞的形式与结构。在苏轼这一类文章中，表现作者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所以文章结构雷同的情况很少，总是随“意”变化。

苏轼杂记文一事一文，一物一文，一得一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如《传神记》杂议人物肖像画的精神所在，作者以前代画家所言、本朝画家实践和自己生活实际，说明画人关键在眼神和颧颊，“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顺济王庙新获石罨记》写一古代石质箭鏃的失而复得，短文情节有传奇色彩，而表现苏轼宝物与天下共之的思想。

苏轼的人物传记所记人物上至官吏，下至农夫道士无所不包。为达官贵人作传的有《陈公弼传》，陈公弼是苏轼的老乡，作为州县长吏，不愧干员。一是严于执法，力挫邪恶。在长沙知县任上，“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通权贵人，肆为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在雩都知县任上。“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易之。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愿自新。……巫覡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民讹言有绯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馀家。”在京东转运使任上，“潍州参军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号截道虎者，欧康及其女几死，吏不敢问。博平隶河北。公移

捕甚急，卒流之海岛，而劾吏故纵，坐免者数人，山东群盗为之屏息。徐州守陈昭素以酷闻，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发其事，徐人至今德之。”二是精明强干，明于治乱。“盗起京西，杀守令，富丞相荐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致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初不知公官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者十余人，劳其余而遣之，使甲以捕盗自赎。”在庐州知州任上，“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人为公惧，公益亲信之。士皆指心，誓为公死。”三是腹有良谋，善于治事。在宿州知州任上“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率常坏舟。公始作飞桥，无柱，至今沿汴皆飞桥。”在滑州知州任上，“会河溢鱼池埽，且决。公发禁兵捍之，庐于所当决。吏民涕泣更谏，公坚卧不动，水亦渐去。人比之王尊。是岁盗起宛句，执濮州通判井渊。上以为忧，问执政可用者？未及对。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党。”四是敢于负责，精通荒政。“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在凤翔知府任上，“仓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败为忧。岁饥，公发十二万石以贷。有司忧恐，公以身任之。是岁大熟，以新易陈，官民皆便之。”苏轼用众多典型事例，写活了一位循吏清官。

《率子廉传》为一个后为道士的农夫立传，“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七里，有

紫虚阁，故魏夫人坛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乐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见其所为。然颇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间，虽大风雨至不知，虎狼过其前，亦莫害也。”率牛卑微而可叹的一生，与陈公弼不可同日而语。

3. 文赋

苏轼有赋二十三篇，依其内容分五类：有的描写山水景物，如前后《赤壁赋》；有的状物，如《菜羹赋》、《黠鼠赋》；有的述评时事，如《复改科赋》、《延和殿奏新赋》；有的咏史吊古，如《昆阳城赋》、《屈原庙赋》。苏轼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后《赤壁赋》均作于元丰五年苏轼贬滴黄州期间游览赤壁（今黄冈县赤鼻矶）之时。此二赋尽管所写之地相同，江山形胜、清风明月殆无异样，但因时间相隔三月，而立足点有在舟与在岸之异，作者又采用了不同的写法，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内容而言：前赋重在展示作者复杂的心境和从苦闷中寻求解脱的思想历程；后赋则侧重景物描写和气氛渲染，于恍惚迷离中折射出作者超尘绝俗的心境。就结构而言：前赋灵活运用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熔叙事、写景、议论于一炉，后赋主要采用融情理于景事的手法；前赋以乐——悲——乐为感情发展的曲线，构成三个段落，后赋则沿着谋游、泛舟、攀崖、梦境与梦醒的顺序一路写来。就写景而言：前赋写的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字字秋色；后赋写的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山鸣谷应，风起石涌”，句句冬景。就意境而言：前赋气象宏阔，飘逸超远；后赋幽险凄清，迷离悄怆。前后《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扬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或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标志着北宋文赋创作达到高峰。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三、苏轼散文艺术品格

1. 表现力强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2. 表现手法多样

苏轼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

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逐渐减弱,内容上有的放矢,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和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理性的认识,又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

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鹤，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鹤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3. 语言形象生动，典雅优美

苏轼的散文语言不像韩愈那样拗险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以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如《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前面说到苏轼因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超越无限的宇宙时空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这种理性认识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而苏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找到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感受。

第三节 苏轼的诗品

苏轼有诗二千七百多首，他用诗歌表现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1. 时事政治诗

苏轼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所写有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

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都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应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苏轼对天灾人祸下的北宋农民，有着十指连心的关切。

苏轼针对封建社会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鹧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讽刺。

2. 个人抒情诗

表现仕途坎坷，抒写人生感悟。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化解仕途坎坷和苦难，从悲痛中振作旷达情怀；也善于用诗歌记录人生体验和体会，表现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中蕴含着的深刻道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澠池怀旧》)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第一首诗怀念苏轼兄弟出四川经关中至汴洛宦游的往事，抒发往事如烟，表现宦游天下无可奈何的情愫。第二首诗写政治灾难中由不幸想到万幸，用心灵排解法保持生存信念。

由于作者善于思考、巧于提炼，他从自然现象和平常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哲理。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慈湖夹阻风五首》：“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鼓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升华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普遍性的哲理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既脍炙人口又精警宜人；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这是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的原因。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然而当苏

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

3. 山水诗

描写山水景色，表现自然美感。苏轼的山水诗与其宦游天下的足迹同步，而伴随着人生感受的抒写。如著名的《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此诗依时间的推移，依次写出傍晚、深夜时分的江山景色，同时也表达倦于仕途、渴望归田的心情。有的山水诗表达对生活热爱，如《新城道中》：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里所写的都是寻常景象，但染上作者主观上的愉悦心情，一切都变得善解人意，谐趣而快乐。岭上的云像顶棉帽，枝头的太阳像只铜钲，大自然的面目居然有些幽默；野桃含笑，柳条摇曳，草木也是那样欢快自得；田头春耕正忙，人家传出芹笋的香味，人间犹如桃源。此外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一时黑云如墨，倏忽间又是碧水蓝天，大自然永远对人有美好的惠赐。通过对景物的动态描写，表达了作者欣喜的心境和恢宏的胸怀。

二、苏轼诗歌艺术品格

1. 自然天成，精妙清新

苏轼强调为诗“天工与清新”，要“取其意气所到”；强调艺术创作中灵感的作用，当灵感到来时，“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注重新颖微妙的趣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而形成形象与思想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诗歌佳作。系统的艺术观，深厚的艺术修养，加上超人的才华、深刻的思想，使苏轼的诗歌形成显著的特色，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苏轼继承了梅、苏、欧以来宋代诗人讲究意脉贯通的特点，诗篇的构成或以主体的情绪变化为脉络，或以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驶、景物移转为脉络，文理自然。他的诗比之前人更少些拘谨，流动感更强，往往在跌宕起伏中，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颖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见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2. 反映面宽，表现力强

苏轼是一位既能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在多方面开拓新路的诗人。他的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他学博才高，人生感受极其丰富，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

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

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颖》）；“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也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之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鼯”（《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笔法尖新，不落俗套。

3. 刚柔相济，雅俗共赏

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喜欢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代黄庭坚的诗风，模仿无不维妙维肖。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兼有不同艺术风格。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但有些作品也相当秀丽，做到了刚柔相济、雅俗共赏。

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第四节 苏轼散文名作精鉴

一、论说文

乞开杭州西湖状(节选)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①。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②。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合，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臣愚无知，窃谓西湖有不可废者五。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始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③，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一也。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记》云：“放水溉田，每减一

寸，可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溉五十顷。若蓄泄及时，则濒河千顷，可无凶岁。”今岁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费^①。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三也。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数万工开浚，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狼籍，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四也。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②。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功。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五也。

臣以待从，出膺宪寄^③，目睹西湖有必废之渐，有五不可废之忧，岂得苟安岁月，不任其责。辄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计二十五万馀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饥谨，特宽转运司上供额斛五十馀万石，出粳常平米亦数十万石，约敕诸路，不取五谷力胜税钱，东南之民，所活不可胜计。今又特赐本路度牒^④三百，而杭独得百道。臣谨以圣意增价召人入中，米减价出粳以济饥民，而增减耗折之余，尚得钱米约共一万馀贯石。臣辄以此钱米募民开湖，度可得十万工。自今月二十八日兴工，农民父老，纵观太息，以谓二圣既捐利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余弃，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岁，盖有泣下者。臣伏见民情如此，而钱米有限，所募未广，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来者不嗣，则前功复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则一举募民除去净尽，不复遗患矣。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第 131～132 页）

注释：

① 唐末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王“置都水营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凡七八千人”。

② 葑田，杂草丛生，盘根错节，谓之葑田。

③ 涸辙之鲋，旱路车辙存水里鲋鱼。

④ 不赀，不可计算。

⑤ 缗，穿线的绳。一缗千钱。

⑥ 意为，我以侍从近臣，出任杭州。

⑦ 度牒，僧尼出家的官方文书。宋时想出家的人需要出钱从官府买度牒，所以朝廷给度牒等于拨经费。

分析：

1. 本文要意

此文是元祐五年，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上的奏章。基本意思是要完成开掘西湖葑田。实际上上书前，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工程的费用来自朝廷给杭州的三百个度牒。现在他想继续二期工程，所以上书申请度牒百道。

2. 精华在苏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这次到杭州任知州，只因不同意完全废除新法，在朝中与司马光不合，害怕受到迫害而请求外放。苏轼这个人好就好在不因政治失意而荒废政事，到任杭州后，把满腔热情用在杭州西湖的治理上，在治理西湖中平息了内心的郁闷，实现了个人价值。

3. 这是一篇古代典范的行政上行文。其精彩之处在所说“西湖五不可废”的理由，以及西湖工程半途而废的可惜，使朝廷认识到不拨经费就说不过去。

《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①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②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是为固然而不知其功^③。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

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於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④。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⑤，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⑥。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第403～404页）

注释：

① 孔子意为，周文王死后，一切文化遗产都在我这里，如果上天不想文化遗产丧失，那么匡人就不能把我怎么样。后死者，孔子自谓。

② 孟子意为，孔子作《春秋》与他本人反驳杨、墨之说，与大禹功绩相等。

③ 意为，人们认为本来就该这样，而不知道这是孔孟积极作为的结果。

④ 意为，因骈文之旧，言论很肤浅，气格很卑弱。

⑤ 濯磨：洗涤磨砺，振作奋勉。

⑥ 指王安石为促进变法，献上自己所作《诗》、《书》、《周礼》三经的新解，作为科举的根据。

分析：

1. 苏轼的儒家真面目

在本文中，苏轼把儒家当作救世主加以推崇、把孔孟与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把历史上的治乱和朝代兴亡解释为儒家思想是否得到尊重导致，对儒家作了无以复加的评价。同时，他认为儒家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欧阳修，一脉单传，以把欧阳修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言外之意，苏轼又是欧阳修的传人，儒家面目昭然若揭。

2. 苏轼对北宋诗文革新的认识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这段论断被文学史多次引用，作为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生原因、变革对象、创新内容、成功原因和运动领袖述评的主要根据。

二、记叙文

黠鼠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嚅嚅声^①，声在囊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

方啮也，而遽^②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③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免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④，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忤。

（此文见《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注释：

- ① 嚙嚙嚙，鼠啃咬声音。
- ② 遽：突然。
- ③ 见使：受鼠的调动。
- ④ 虿：蝎子，毒蛇。

分析：

1. 状物寓意

本文描述一只狡猾的老鼠，被人封闭在皮袋中后，在袋中弄出响声吸引人开袋探视，而装死等待机会。人开袋后看见是只死鼠，就将它倒出来，黠鼠一接触地面就飞快地逃走了。受了骗的苏轼，经过思考，领悟了受骗黠鼠一事所蕴含的事理，人是万物之灵，但如果遇事掉以轻心，也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2. 描写和议论相辅相成

本文既有生动如画的描述，也有画龙点睛的精辟议论；从生动如画的描述中生发事理，靠事理阐发升华描述。没有生动如画的叙述，事理的阐发就

失去依据；没有事理的阐发，黠鼠生动如画的描述就失去灵气。

放鹤亭记^①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②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③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俟^④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⑤，卫武公作《抑戒》^⑥，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第 434 页）

注释:

- ① 此文创作于元丰元年,反映了苏轼在徐州为官期间的风貌。
- ② 张君,名师厚,字天骥,号云龙山人,以徐州城内的云龙山得号。放鹤亭因张师厚草堂迁址而建。
- ③ 山人,指云龙山人张师厚。
- ④ 傖:向。
- ⑤ 《酒诰》,周公恐康叔沉溺于殷地饮酒之风而告诫他的文诰。
- ⑥ 《抑戒》,基本内容是反对过分逸乐。《毛诗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分析:

1. 沧桑之变

北宋时徐州“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现在徐州城外只有几点孤零零的山尖,这是北宋以后黄河屡次决口黄沙沉埋所致。

2. 文化意义

本文写北宋隐逸文化和红尘文化的交融。张师厚代表的是隐逸文化,他“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傖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不关心社会人生,只关心个人舒适;苏轼代表的是红尘文化,他身为徐州知州,他领导百姓与洪水进行了殊死搏斗,“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可见当时人水之争何等惨烈。

第八章

苏 辙

苏辙在宋代的文学地位不及苏轼,其政治和文学作为约与曾巩相当。但他也是北宋诗文革新重要成员,北宋中期循吏和正人君子,在文学和为人方面颇多建树。

第一节 苏辙的人品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散文家,与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仁宗嘉祐二年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讟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政和二年,死于许。死后追

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一生，政治上相当保守。熙宁二年，父亲丧除，苏辙返朝，神宗已继位二年，“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采，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宋史》本传，下同）后来青苗法推行，“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这样苏辙就失去了和王安石合作的机会，被外放地方，先后担任河南推官、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签书南京判官、监筠州盐酒税、知绩溪县。

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苏辙入朝为官。他帮助司马光驱逐新党最力，“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讎，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但在“复差役”和“改科举”等问题上与司马光等人意见相左，未能得到更大重用。

苏辙一生，参议朝廷军政建树平平。《宋史》本传记载他对几件大事的主张，一是哲宗初年议西夏请割兰州、米脂等五砦，他以

“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和“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为由持绥靖态度，促使宋廷对西夏又一次妥协退让；二是对是否让黄河回归故道，苏辙以“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为由，诱导吕公著维持现状；三是朝廷命辙量事裁减元丰所定吏额，苏辙决策“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这不失为良法。四是苏辙在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任上，西夏入境杀人三日而退，边将主张“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苏辙以“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为由，反对“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即反对宋军反击过境，为宣仁后所采纳。由此可知，苏辙治国才具有限，所持政见以求稳怕乱为宗。

《宋史》本传记苏辙事迹不多，倒是他不同时期所上奏章占了绝大篇幅。第一封奏章是他应制举后上仁宗皇帝书，书中直言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有人以为苏辙出言不逊，要取消他的资格，仁宗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置苏辙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三年后再任大名推官。第二封奏章是他在户部侍郎任上。上章陈述理财之要，主张集中财权，由户部主宰出纳；由主户、工二部共同管理三监，“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此书很有务实精神和调度能力。第三封奏章是元祐中期为反对“调停”而上，当时有人主张任用一些新党分子来平息他们的抵触情绪，苏辙

认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参用邪正“必将戕害正人”，被宣仁后采纳。第四封是绍圣初，上书哲宗弹劾新党李清臣利用廷试进士命题为邪说，实际上是反对新党翻案，结果与哲宗本意相左，被贬知汝州。从此苏辙被一贬再贬，直到老死。

苏辙著有《栞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栞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第二节 苏辙的成品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气”充沛文章自然光彩夺目，而“养气”既在于加强内在修养，但更重要的是充实生活阅历。他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就说明了这一点。

1. 论说文

苏辙散文创作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代表作《新论》三篇。在上篇中，他先否定了两种偏执之见，“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一切守旧，他不同意；更张变法，他也不同意。他主张先“立为治之地”，也就是抓根本，“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北宋必须补的“不足”是什么，苏辙认为是“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因而“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

在中篇中，把北宋“为治之地”具体化。首先明确北宋“不跻于

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的症结所在：

凡今世之所恃以为安者，惟无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余，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堕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其次，明确解决问题的办法途径。他所明确北宋“为治之地”，就是“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强调强力、果敢和无私，起弱为强，变犹豫为果决，去私心党争存天下为公，的确是北宋中期图强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下篇中，他引文武、孔孟治国理政事实，说明“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则不可得而知。”进一步强调果敢、强力和无私的重要性。

如果说《新论》有些空洞不切实用，那么《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辙最长的政论文，所论治国之道就切实多了。该书以理财为治国之先。他指出理财的重要性，“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并提出理财的长久之计“去事之所以害财者”，即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减少官吏员额，裁减多余的军队，压缩不必要的费用，的确是解决北宋入不敷出的良方。然后为去“三冗”设计了许多可行之法，比如减少“冗兵”之法：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

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廩给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捐，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禁军与土兵两相对比，禁军一人用土兵三人之费，而作战能力三人不敌一土兵之勇，那么裁减禁军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裁减的办法是禁军不再输入新兵，任其自然减员，十年之后禁军就不存在了，这是非常切于实用的。

《唐宋八大家文钞·颖滨文钞》中有“论”“历代论”“古史论”七卷，大多是历史论文。有的一篇论一个朝代的成败得失；有的一篇论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长短。《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颇有说服力。短小精悍而振聋发聩的如《汉文帝》：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

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湍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此文内容精华在于对以柔克刚哲学思想治国的阐述上，对晁错削藩理论的拨反上；形式上应用多种论证方法，尤以引证、喻证、对比证明为成功。

2. 记叙文

包括亭台记和人物传记。苏辙的亭台记精于记而广于议。例如《黄州快哉亭记》重在表现贬谪生涯中徜徉于山水间的快乐，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恣肆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吴氏浩然堂记》通过“浩然”二字含义的阐发，表现了作者“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的修身养性见解。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精论广议风格。但也有以描述为主、稍加议论的，如《武昌九曲亭记》：

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坡陀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溪。依山临壑，隐蔽松栌，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

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首段概写苏轼居齐安三年，乐于上武昌诸山与僧人游览山水胜景，乐而忘忧的情景；次段写九曲亭修建过程，具体表现九曲亭上下山水的优美宜人；末段抒写苏轼“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的旷达情怀。记叙笔墨明显多于议论。

苏辙的人物传记多以墓志和杂记的形式出现。他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为苏轼和欧阳修立传，记事详尽，评论得当，是《宋史》苏轼传和欧阳修传的依据材料之一。苏辙还长于为小人物作传，把平凡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如《龙井辩才法师塔碑》记僧人辩才传扬佛法的一生，辩才“徐氏，名元净，字无象，杭之于潜人。”“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荤血，每见讲堂坐，辄叹曰：‘吾愿登此，说法度人。’”年十六，落发受具足戒。十八，就学于

天竺慈云师。……年二十五，恩赐紫衣及辩才号，盖代诏为众讲说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吕公湊请师住大悲宝阁院。师严设纪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十年后，沈公遭为杭州知州，请辩才住持上天竺寺院，“师至，吴越人争以檀施归之，遂凿山增室，几至万础，重楼杰观，冠于浙西，学者数倍其故。”通过辩才生平事迹的记述，讴歌了他“平生修西方净业，未尝以须臾废行”的精神。《亡姊王夫人墓志铭》写堂姐勤劳善良的一生：

幼敏而静，四岁而知丝纩，十岁而知馈膳，父母以为能。既长，奉已以法，不妄言矣。二十而归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贤之。舅秘书丞兼，没于耀州，贫不能归，夫人劝其家尽所有以归葬。未几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给，人不堪其忧，夫人处之，哀而不伤。被服饮食，虽妾必修，与亲族交，虽贫不傲，虽富不屈；训导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过，未尝见声色，曰：“使尔自悟则善，勉强从我无益也。”春秋祠事，必亲视涤濯，执庖爨，夜以达旦，以此终其身。

“生而知礼传弗烦，老而知义穷益坚”，如此要强自立，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传统美德。

第三节 苏辙的诗品

苏辙的诗歌理论，主张内容充实，风格朴实。其散文《诗病五事》是论诗专文，标榜“义理”，侧重内容论诗。他评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也就是说李诗内容不合义理。他称赞杜甫的战乱诗善于纪事，“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而批评白居易“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

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批评韩愈诗句直露，“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由此可见，苏辙提倡的是写实、含蓄、平易诗风。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显得逊色。

一、苏辙归隐颍川前的诗大都与仕途历程相关，或咏物写景，或表达对国事的看法，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

1. 官场应酬诗，与亲朋酬唱应和之作

苏辙年轻时迎来送往，酬唱应和，留下了不少诗作。如《送高安罗令审礼》：“一邑忧劳水旱中，牛刀闲暇似无功。政成仍喜新蚕熟，归去还将旧橐空。清白久闻夸父老，沉埋谁为诉诸公。谪居长恨交游少，怅望肩輿又欲东。”罗审礼到高安县做知县，苏辙勉励他继续保持两袖清风的为官风貌，以高超的理政之才在小县做出大名堂。《送戴朝议归蜀中》在送戴朝议归蜀时，心中也萌发了思乡之情，“岷山招我早归来，剑阁横空未易回。北叟忽惊鶗鴂晚，西辕欲及海棠开。避仇赋客亲耕耒，因乱诗翁著酒杯。但爱江山无一事，为言父老莫相猜。”诗中称戴朝议为“北叟”“诗翁”，大概他是苏辙的一位致仕的同乡，所以送别时引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当然，苏辙诗歌往来最多的是胞兄苏轼，如《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其三：“谪官似我无归计，落第怜渠有屈声。握手天涯同一笑，倚门岁晚不胜情。黄岗俯仰成陈迹，白首蹉跎畏后生。归去且安南巷乐，莫看歌舞醉长檠。”豁达中渗透些许无奈，兄弟情深尤为可敬。

2. 为官地风物描写

苏辙游宦所至数州，有许多诗歌写当地风物民情。如《绩溪二咏》其一《豁然亭》：“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经秋卧病闻斤响，此日登临负酒船。径请诸君作佳句，壁间题我此诗先。”苏辙做过绩溪县令，此诗写他坐

船至绩溪城外豁然亭，南看县城北望山岭所见所感。秋雨过后，江山明洁如洗，县城千家屋瓦碧蓝，山上青松青翠如烟。高兴之余，苏辙吩咐随从，每人都要赋诗，题写于豁然亭。其二《翠眉亭》：“淮安双岭曲弯弯，眉势低临户牖间。斜拥千畦铺渌水，稍分八字放遥山。愁霏宿雨峰峦湿，笑卷晴云草木闲。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翠眉亭在绩溪县浅山与平原相交处，它背靠远山，紧邻农田，置身亭中，前有千畦稻田渌水，后有草木峰峦，让诗人想起了蜀中家乡。

3. 表现艺术鉴赏活动

北宋是一个艺术高度发达的王朝，绘画方面大家如云，佳作珍品叠见；文人士大夫以珍藏艺术佳品为荣，官员私交场合以鉴赏艺术作品为尚。苏辙不少诗对此有反映，如《韩干三马》：“老马侧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丝。心知后马有争意，两耳微起如立锥。中马直视翘右足，眼光已动心先驰。仆夫旋作奔伏想，右手正控黄金羁。雄姿骏发最后马，回身奋鬣真权奇。圉人顿辔屹山立，未听决骤争雄雌。物生先后亦偶耳，有心何者能忘之。画师韩干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此诗描写唐代画家韩干作品《三马图》，侧重挖掘画马的内心世界，所以诗末称赞韩干画马画心腹，这是很高的评价。《书郭熙横卷》咏本朝画家的山水横幅，“凤阁鸾台十二屏，屏上郭熙题姓名。崩崖断壑人不到，枯松野葛相欹倾。黄散给舍多肉食，食罢起爱飞泉清。皆言古人不复见，不知北门待诏白发垂冠纓。袖中短轴才半幅，惨淡百里山川横。岩头古寺拥云木，沙尾渔舟浮晚晴。遥山可见不知处，落霞断雁俱微明。十年江海兴不浅，满帆风雨通宵行。投篙楫杙便止宿，买鱼沽酒相逢迎。归来朝中亦何有，包裹观阙重围城。日高困睡心有适，梦中时作东南征。眼前欲拟要真物，拂拭东绢付与汾阳生。”此诗歌咏的是两幅作品，一幅是屏风画，一幅是短轴，都出自郭熙一人之手。前者简

略而后者详尽,详尽者可当作山水诗来读。

4. 记录仕途生涯

苏辙曾出使辽国,《春日寄内》描写幽燕奇寒,“春到燕山冰亦消,归骖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华发,初试东风脱敝貂。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苏辙此次使辽,可能是前年冬天成行,一直到春节尚未完成使命,而忍不住给家人寄诗。前六句写辽国大地回春,自己使命将终;后二句告诉家人不久回乡,到家赏梅。《渡桑干》写于使辽返宋过桑干河时,但忆及赴辽初渡桑干情景,“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穹庐雪落我未到,到时坚白如磬陀。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旆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去时天寒地冻,回时风和冰开;去时心存畏惧,回时如释重负。尽管在辽国生活诸多不便,好在离开时辽人显露了和平意愿。此诗相当于一则使辽日记。

二、晚年退居颍川后,比较专注于家庭和个人生活,写了不少抒写个人感受的诗篇;同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了解加深,写出了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诗

1. 反映家居生活,抒写个人感受

晚年的苏辙生活有几个乐趣,一是衷情于对草木的欣赏,《白菊》诗写他对花卉的关注:“白菊长先黄菊开,年年九日泛新醅。犹存古历标花候,不奈时人信手栽。得势从教盈九畹,俯眉聊复引三杯。愈风明目须真物,能使神农为尔回。”先写白菊的早开,后写白菊的药用价值,流露出对白菊的喜爱之情。二是喜爱酿酒饮酒,如《九日家酿未熟》:“平生不喜饮,九日犹一酌。今年失家酿,节到真寂寞。床头泻余樽,畦菊吐微萼。洗盏对妻孥,肴蔬随厚薄。兴来

欲径醉，量尽还自却。傍人叹身健，省已知脾弱。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绰约。养生要慈俭，已老惭矍铄。燕居渐忘我，杜门奚不乐。风曲日已干，浊醪可徐作。”九月九日重阳节，秋酒未成，但旧酿尚存，年迈的苏辙亲自清洗酒具，吩咐妻子准备酒菜，然后在花圃小酌。他有自知之明，喝到酒量便不再饮，但心里盘算着怎样酿酒。三是喜欢独坐赏景，《南斋独坐》写道：“独坐南斋久，忘家似出家。香烟秣作穗，茶面结成花。细竹才通径，长松初有槎。往还真断绝，一一数归鸦。”他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品赏着眼前田园美景，自得其乐，感到心满意足。

2. 表现农村风物和农民生活，反映颍川现实生活

晚年的苏辙虽不一定参加农业劳动，但因为全家靠种地生存，他对农事有着独特的关心。冬天遇到下雪，他为小麦丰收有望而欢欣，“一腊不虚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压麦中尘。余润想犹在，苦寒将及春。殷勤欲尽酒，扶养病衰人。”（《腊中三雪》）春夏喜逢甘霖，他想到稍解农夫农妇忧愁，“一早经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晓未收。气爽暂令多病喜，来迟未解老农忧。力耕仅足公家取，遗秉休违寡妇求。时向林间数新竹，箨龙腾上欲迎秋。”（《喜雨·五月十九日夏至》）也想到农民温饱暂时有了保证，“夏田已报七分熟，秋稼方忧十日干。好雨徐来不仓卒，天公似欲救艰难。魃张鹰犬无遗力，社近鸡豚趁早寒。老病随人幸一饱，炉香无语只长叹。”（《喜雨》）

隐居颍川时期的苏辙，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他的《秋旅》诗反映了北宋农民所受剥削之重，“雨晴秋稼如云屯，豆没鸡兔禾没人。老农欢笑语行路，十年俭薄无今晨。无风无雨更一月，藜羹黍饭供四邻。天公似许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论。穷边逃卒到处满，烧场入室才逡巡。县符星火杂鞭箠，解衣乞与犹怒嗔。我愿人心似天意，爱惜老弱怜孤贫。古来尧舜知有否，诗书到此皆空文。”前六句写难遇的丰收年景，接着两句承上启下过渡到人祸

扰民,接着四句具体写乱兵如匪、官府如虎地祸害百姓,最后四句为人民鼓与呼,思想情感与杜甫“三吏三别”如出一辙。

第四节 苏辙散文名作精鉴

一、议论文

民政策四^①

管子治齐,始变周法。使兵民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而士乡十五。制鄙以为五属,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之政。国中之士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农不知战,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卫农,农以资兵。发兵征行,暴露战斗,而农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沾体涂足,而士卒不知其劳。当是之时,桓公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剌^②零支,斩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诸侯,筑夷仪,城楚丘,徜徉四方,国无罢敝之民,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君为之倡谋,使秦人莫不执兵以事战伐,而不得反顾而为农;阴诱六国之民,使专力以耕关中之田,而无战攻守御之役。二者更相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应;我能外战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战而后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谋也。

自管仲死,其遗谋旧策,后世无复能用,而独其分兵与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废。何者?其事诚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农夫竭力以辟天下之地,饷^③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战斗之患。此人之情谁不可者?然当今天下之事,与管仲、商鞅之时则已大异矣。古者霸王在上,仓廩丰实,百姓富足,地利已尽,而民未乏困。当此之时,谓之人有馀。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遍,而蓬蒿藜

莠，实尽其利。人不得以为食，禽兽之所蕃息。当此之时，谓之地有馀。古之圣人，人有馀，则务在于使人，是以天下之人虽其甚蕃，而举无废功；地有馀，则务在于辟地，是以天下之地，虽其甚宽，而举无遗力。今也海内之田，病于有馀，而上之人务在于使人，不已过哉！

臣观京师之兵，不下数十百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千人为辈，而江、淮漕运之卒，不可胜计。此亦已侈于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为少减，是谓逆天而违人。昔齐桓之世，人力可谓有馀矣，而十五乡之士不过三万，车不过八百乘。何者？惧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当厚兵之处，不过京师与西边、北边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远国，或数千里，以为远人险。彼，未可以尽知其情也，故使关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镇服其乱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远，遂莫之变。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乡，安其水土而习其险易，而特病其不知战。故今世之患在不教乡兵，而专任屯戍之士为抗贼之备。且天下治平，非缘边之郡，则山林匹夫之盗，及其未集而诛之，可以无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盗，则其为变，故亦非戍兵数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无备之处，乃当厚其士兵以代之耳。

闻之古者良将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乐战。今之为兵之人，夫岂皆乐乎为兵哉？或者饥馑困蹶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无赖既入而不能以自脱。盖其间常有思归者矣。故臣欲罢其思归之士，以减屯戍之兵，虽使去者太半，臣以为处者犹可以足于事也。盖古者有馀则使之以宽，而不足则使之以约。苟必待其有馀，而后能办天下之事，则无为贵智矣。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颖滨文钞》，第 257～258 页）

注释：

① 策：是古代进士考试文体之一，有对策和射策两种类型。

② 剋:击,砍。

③ 醖:音居,聚敛。

分析:

1. 知识准确

本文准确地阐明了中国古代兵制变化。周朝时兵民为一,平时散在民间种田,战时从武库领取武器,集中整训为兵;春秋时期的齐国,实行兵民分离,兵平时不种田,只管作战保卫民众,民众不管打仗,只负责种田养活军队;战国时期的秦国,实行全民皆兵,人人有从军打仗的义务。

2. 针对性强

北宋兵民分离,国家养有大量常备军,这些常备军耗费国家大量财富,却战斗力极差,因此苏辙提出“乃当厚其士兵以代之”,即大幅度削减禁军,加强边防地区团练武装。这样,既充实了农业劳动力,又减少了养兵的费用。可以说,是针对北宋实际的治本之策。

上枢密韩太尉^①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②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

人^③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④，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⑤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⑥，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 76 页)

注释：

① 韩琦，北宋名臣，嘉祐元年任枢密使，掌全国军事。太尉，汉代官名，相当于宋的枢密使。

② 邻里乡党：古代以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③ 欧阳修门人，指曾巩、梅尧臣、苏舜钦等。

④ 方叔、召虎：西周功臣，建有征讨大功。

⑤ 苏辙嘉祐元年随父兄至京，目的是参加科举。

⑥ 赐归待选：苏辙嘉祐二年中进士，又应制科，因直言皇帝过失，被列下等，仅授商州推官，不就而回。赐归待选，是一种好听的说法。

分析：

1. 本文文学理论价值

本文是苏辙重要的文论篇目。它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的著名观点。强调文学作品是作者内在修养和精神气质的外化，指出生活充实、修养深厚，写出的文章自然有血有肉，真实感人，要

求作家面向大自然和社会生活,加强个人修养,充实生活积累,显然是唯物主义的文学观。

2. 本文艺术造诣

一是措辞巧妙。苏辙本来是想见韩琦一面,但他又不想太低三下四,因而以“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为借口,把要见韩琦的理由说得光明正大、义正辞严。二是理论结合事实,阐述胸臆充分,说服力强。为了强调“养气”,他引孟子名言,述司马迁周游天下的壮举;为了让韩琦答应接见他,苏辙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出蜀进京一路所见名山大川和非常人物,并告知对方见了韩琦即可圆满了却心愿。使韩琦不好意思不答应他的请求。

二、记叙文

巢谷传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老为里校师。谷幼传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旧学,蓄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

闻西边多骁勇,骑射击刺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杰。有韩存宝者,尤与之善。谷教之兵书,二人相与为金石交^①。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朝廷稍奇之。会泸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乃命存宝出兵讨之^②。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囊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③,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予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

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绍圣初,予以罪谪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讳与予

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④，欲徒步访吾兄弟。闻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遗予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复昔日元修也。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则善，然自此至儋数千里，复当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留之不可，阅其橐中，无数十钱，予方乏困，亦强资遣之。船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橐装以逃，获^⑤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昔赵襄子厄于晋阳，知伯率韩魏决水围之。城不沉者三版，县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及襄子用张孟谈计，三家之围解，行赏群臣，以恭为先。谈曰：“晋阳之难，惟恭无功，曷为先之？”襄子曰：“晋阳之难，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礼，吾是以先之。”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宝，后遇予兄弟。予方杂居南夷，与之起居出入，盖将终焉，虽知其贤，尚何以发之？闻谷有子蒙在泾原军中，故为作传，异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见之循州，改名谷云。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颖溪文钞》，第 316～317 页）

注释：

① 金石交：坚贞的友谊。

② 熙宁十年，南方少数民族首领乞弟举兵反宋，《宋史·蛮夷四》载，“诏泾原路副总管韩存宝击之，存宝召乞弟犄角，讨荡五十六村，十三围蛮乞降。”

③ 元丰三年，乞弟再叛，韩存宝率军击之，误信乞弟诈降。朝廷按存宝，诛之。

④ 诵言：公开宣讲。

⑤ 获:窃贼被抓获。

分析:

1. 背景与主题

此文作于元符二年,当时苏辙被贬循州。在朋友皆绝、亲戚无助的境遇中,苏辙接待了不远万里从蜀中前来探望他的巢谷,而且巢谷在前往海南看望胞兄苏轼的路上,客死新州,怎不叫他感激涕零呢?于是苏辙写了本文,哀悼这位患难知己。文章的主题是患难知己价值千金,巢谷之情天高海深。

2. 巢谷形象分析

巢谷是个信义君子,他接受韩存宝死前嘱托,身怀数百金不远万里送到存宝的遗孀孤儿手中;后来又同情苏氏兄弟遭遇,不顾年迈体弱,步行数千里前往循州、海南看望二苏。过去人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巢谷就是这样一位能让任何人满足的知己朋友。巢谷对别人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但对他自己却有不够负责之处,主要是弃文学武的决定有些草率,结果文不成武不就,因而一生无大建树。实在让人惋惜。

东轩^①记

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②泛滥,蔑^③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湄^④,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⑤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圯缺^⑥,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⑦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簞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⑧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窶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

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縻，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

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油污，睎^⑨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⑩，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此文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第 324～325 页）

注释：

- ① 东轩：苏辙主管筠州（今江西高安县）盐酒税务时自建的住室。
- ② 筠水：即今锦江，赣江支流。
- ③ 蔑：消灭。
- ④ 潄：水边。
- ⑤ 部使者：盐酒归户部，应指户部派往筠州的监察人员。
- ⑥ 二句意为，才有功夫完成对所借使者府的修葺。
- ⑦ 莫：通暮，黄昏。
- ⑧ 抱关击柝：守门打更的小吏。抱关：门卒；击柝：敲击梆子。
- ⑨ 睎：希望。
- ⑩ 乘田：管理畜养；委吏：管理粮仓。皆为小官。

分析:

1. 文化价值

苏辙此文使人得以窥见北宋州酒税监公务与业余生活的全貌。酒税监总共三人,苏辙上任时前两位因故被罢免,所以他只得一人干三人的活计,“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原来酒税监还要亲自站柜台售酒盐,收猪、鱼肉税款,一人干三人活计当然很累,“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连到东轩的空儿都没有,更不要说在那里去“宴休”了。

2. 思想意义

本文在记述忙于公务、不得到“东轩”宴休原因时,提出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矛盾、或者说沉于事务与学习提高矛盾的问题。苏辙把正人君子的人生追求分为高低两个阶段,“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认为只知沉酣势利、醉心物质享受是低级阶段,而循理求道、追求精神充裕才是高级阶段。这不仅体现了当时君子学无止境的精神要求,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防止“穷得只剩下钱了”悲剧不断重演的借鉴意义。

3. 本文精于记而广于议的艺术特点

全文四段,首段记述东轩的由来,突出“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的遗憾。第二段以自己现今“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縻,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的经历,解惑早年对颜渊在箪食瓢饮时为何不谋职自救的疑问,得出忙于物质追求“害于学”的结论。第三段进一步指出“沉酣势利”是低级追求,学习和精神追求可以“易穷饿而不怨”,才是人生的高尚追求;像孔子那样“乘田委吏”和“推行大道”两不误非一般人所能及。末段联系自己,表明希望有朝一日脱离尘务、归隐田园、潜心学习的良好愿望。很明显,记叙少而精、议论广而深是本文的重要特点。

后 记

《唐宋八大家人品·文品·诗品》一书,是作者应聘到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后给广大读者的一份见面礼,也反映了本人多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科研的特长和积累。在写作过程中,此书得到中文系副主任周桂峰、教材采供中心主任孙伟等同志的亲切关心;在出版过程中得到河海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杜文渊先生的精心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以更加完美的面目与读者相见。

赵维平

2006年10月于淮阴师范学院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

□□ = 248

SS□ = 11775559

□□□□ = 2006.11

[illegible]

